

ISSN 1016-0566

#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NEWSLETTER FOR  
MODERN CHINESE HISTORY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九十年九月出版

◎ 第 32 期 ◎



# 「近代中國的婦女、國家與社會(1600~1950)」 國際學術研討會



「近代中國的婦女、國家與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式中李遠哲院長致詞



中研院近史所主辦之「近代中國的婦女、國家與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目錄 第三十二期 中華民國九十年九月出版

---

<b>學術會議</b>	「漫畫中的歷史・歷史中的漫畫」學術座談會報導... 任育德	1
	「現代中國史學與歷史思想研討會」會議報導..... 彭明輝	5
	「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一六〇〇迄今」 會議報導..... 張哲嘉	15
	「清代檔案與臺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紀要..... 林蘭芳	26
	從婦女看歷史：「近代中國的婦女、國家與社會 (1600-1950)」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 許慧琦	33
<b>學術演講</b>	「秩序問題」與明清江南社會..... 岸本美緒	50
<b>學人簡介</b>	劉崇鉉教授傳(1897-1990)..... 蘇雲峰	59
<b>研究概況</b>	藝術史與文化史的交界：關於視覺文化研究..... 王正華	76
	「中國的物質與文化」研究計畫簡介..... 巫仁恕	90
<b>史料與檔案</b>	帳摺與水牌——傳統商販擴大信用之拓銷工具..... 王爾敏	97
	抗戰時期救護總隊外籍醫護人員名單考證..... 張建侑	102
	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近年來進行檔案數位化工作概要.. 莊樹華	108
<b>新書評介</b>	評介近年海峽兩岸有關高等院校史的研究成果 ——以臺灣蘇雲峰與大陸黃延復對清華大學 校史的研究為例..... 區志堅	115
	十八世紀在近現代中國史的樞紐位置..... 胡明輝	126
	評介王汎森撰《傅斯年：史學與政治之間的一生》... 潘光哲	136
	Liberalism, History, and the Chinese Tradition..... Peter Zarrow	145
<b>大事紀要</b>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2001.3-2001.9)..... 李怡嬋輯	165
<b>來函</b>	陳長文律師致李遠哲院長函.....	175
	李念祖律師致溫哈熊將軍函.....	177

---

封面設計：黃憲鐘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委員會□

主任委員 呂芳上

編輯委員 黃克武 熊秉真 楊翠華 羅久蓉

張壽安 沈松僑 余敏玲 張哲嘉

呂妙芬 王正華 萬麗鵲

執行編輯 沈松僑

助理編輯 李怡嬅

---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sub>半年刊</sub> 第32期

編輯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臺北市南港區

電話：(02)27898208

郵撥帳號：1034172-5

印刷者 辰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定價 新臺幣100元

中華民國九十年九月出版

---

GPN 2007500014

ISSN 1016-0566



學術會議

## 「漫畫中的歷史・歷史中的漫畫」 學術座談會報導

任育德\*

在傳統文字史料之外，漫畫、廣告、圖像等作為新的史料，及其所反映的社會風情、心態、通俗文化等，也逐漸受到歷史學界的注意與採用。文物圖像史的研究，也是史學界近幾年新開闢的研究方向。事實上，從文物圖像切入的歷史研究，在中國史中有著深厚的潛力。以近代史研究為例，如香港科技大學洪長泰教授針對抗戰時期的通俗文化，即撰有專書 *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China, 1937-1945*(1996)，作出深入的研究。又，從 2000 年到 2001 年初，臺灣各界為了引發軒然大波的日本漫畫《臺灣論》，沸沸揚揚，鬧得不可開交，或許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應了圖像承載訊息的作用。不過，站在歷史學者的立場，從不同的角度切入來反省、討論問題，比起介入紛爭本身更具深層意義。針對新穎的歷史研究課題進行引介與探討，並開拓新的研究方向，係中國近代史學會陸續舉辦座談會的初衷。緣此，由中國近代史學會主辦、中正文教基金會贊助之「漫畫中的歷史・歷史中的漫畫」學術座談會，乃於本年 4 月 30 日假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大會議室舉行。座談會共分兩場，設 6 位引言人。本次座談會出席情形極為踴躍，與會的近代史研究學者及研究生共達 120 人，盛況空前，致使原定場地從近史所中型會議室，臨時更換至歐美所大會議室。欲一覽本次座談會完整論文及會議記錄的讀者，可參閱《近代中國》雙月刊 143 期（90 年 6 月 25 日出版）。

第一場的主題，是圖像與歷史的對話和教學上的應用實例，由張玉法院士擔任主席。中研院史語所王明珂研究員於〈事實、述事與展演：口述、

---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圖像與文獻的社會記憶意義》一文，結合歷史學與人類學的方法論指出，口述、圖像、文獻與文字均同樣是陳述過去的媒介，得以建構、改變或爭論社會記憶，從而影響社會現實，乃至造成一些歷史事實。社會記憶與人們所處的現世環境是密切相關的。作者以中國西南羌族部落追認祖先起源，從大禹到基督的改變為例，說明劣勢者傾向於攀附、模仿、接受外來的歷史，而優勢群體則藉由社會記憶誇耀利於本群體的過去的情況。政治大學新聞系蘇衡副教授的〈漫畫的世界——文本、解讀、想像〉一文，認為漫畫此一文本係整合文字與圖像，兼具了文化與商品的雙重特性；因此，在解讀漫畫陳述的意涵時，研究者也必須注意到行銷管道助長漫畫流行的正向性，在漫畫進入讀者的生活空間後，刺激了讀者的消費欲望及建構美好生活的概念。今日在臺灣的青少年之間，閱讀漫畫已經是一種習見的文化活動，並且形成青少年的次文化。因此，研究閱讀行為應從經濟、消費面著手，並觀察讀者參與行為與活動的多重意義。中正大學歷史系張秀蓉助理教授在〈漫畫在歷史教學中的運用——《凡爾賽玫瑰》中的法國大革命背景〉一文，則是從個人的歷史教學經驗出發，將歷史漫畫作為輔助工具或教材，透過歷史漫畫來認識教學主題——法國大革命的社會、國際背景。作者指出這種教學方式可以讓學生對上課過程更有參與感，較容易理解教師所希望揭示的主題，同時也演示了歷史材料的活用可能性。在「可以用」的前提之後，「怎麼用」而且「用得巧妙」，則是教師們在實際教學上需要再三思量的。

討論時間中，與會學者也抒發己見。如國防大學王榮川教授即以閱讀連環漫畫吸收歷史知識的經驗為例，為歷史漫畫與歷史教育的相關性作進一步的詮釋。臺北商專李貴豐副教授則以個人教學經驗，提出在有限的圖像之外，如何讓學生清楚的認知到歷史真實，是教學過程中很重要的一環。中研院近史所沈松僑副研究員針對跨國界流通的漫畫源起時期所具有的歷史情境、現代性意義，及其流通到各國後所衍生的差異有所探詢。近史所張瑞德研究員則以美國學界的研究成果為例，指出讀者出生背景、族群、年齡層、性別、階級的差異，都可能影響其對漫畫的解讀，因此針對漫畫讀者的研究，應該要加強進行。

第二場的主題，是圖像漫畫中所展現的中國近代史，由呂實強教授擔任主席。中研院近史所王爾敏兼任研究員在〈圖畫史頁所見之廣州口岸與洋行、夷商、買辦〉一文，既從歷史地圖中所展現的廣州洋行圖像，論述

十三行在清代朝貢體制下作為商品交易場所的重要意義；也運用相當豐富的洋行行商、洋商、買辦的畫像，介紹彼時行商、洋商的日常生活與交遊，並指出行商與洋商從交易中彼此得利，洋行出身的買辦更因而吸收了新觀念，運用在清末民生工商業近代化的過程中，扮演了先驅者角色。臺北師範學院陳逢申講師〈抗戰中的漫畫·漫畫中的抗戰〉一文，鉅細靡遺地考察了抗戰期間的中國漫畫。指出，抗戰前的中國漫畫以上海為基地，匯集一批青年漫畫家，題材偏重在城市平民娛樂。但是，隨著時局日益緊張，也逐漸出現了一些主題嚴肅的民族主義漫畫。抗戰的爆發，更刺激了漫畫家們組成「漫畫界救亡協會」，組織宣傳隊配合國民政府的宣傳活動，並於1939年5月成立了「中華全國漫畫作家協會」，並出版相關刊物。抗戰漫畫的題材，包括了描繪日軍侵略罪行、國軍英勇抗敵、戰爭加諸人民的痛苦、社會百態、控訴漢奸行徑、批判政府腐敗等。可說是戰爭讓漫畫家走出都市的書房，步入實際的生活，從而拓展了畫作的題材、形式與思想深度。不過，不可否認的是，漫畫仍然面臨了流通範圍有限，難以深入鄉村的問題。此外，大多數的漫畫題材往往過於嚴肅，欠缺流暢的藝術性、漫畫技法生疏，容易使得漫畫流於熟練度不足之弊。而國共鬥爭更使得漫畫難以逃脫意識形態的窠臼，成為單調、刻板的宣傳工具，在藝術層面上喪失了獨立性。中研院近史所黃自進副研究員於〈漫畫《臺灣論》的思想背景〉一文，針對話題性漫畫《臺灣論》，從二次大戰結束後日本的經濟、政治發展歷史，探究漫畫作者小林善紀的思想背景與淵源。他認為，日本於戰敗之後，在美國佔領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將軍所指定的和平憲法規範之下放棄武力，全心致力經濟發展，原以為可以在1990年代初期成為世界性強國，不料，1990年代日本經濟卻陷入一蹶不振的困境。日本人對於經濟頹敗之原因百思不得其解，日本精英便亟欲突破美國建立的政經體制，謀求自主。小林的思想背景雖然駁雜，基本上乃是將右派的各家說法予以消化重述，藉著臺灣部分精英之口，肯定日本戰前的侵略行為，藉以打破重建戰前固有倫理與政經體制的障礙。所以，小林對於臺灣的論述只是一種手段而已，真正的論述主體仍然是日本。

隨後的討論時間中，日本在戰爭中的角色成為討論主題。呂士朋、朱志騫、呂實強幾位在抗戰中成長的史學先進先後敘述了個人經驗，指出後人不可以對日本作為挑起戰爭的侵略者角色視若無睹。張瑞德研究員則以為中國抗戰漫畫中所呈現的外國形象，尤其是用非人化的方式描繪日本人

此一現象值得注意，這與日本長久欺負中國有關。那麼，日本人又是怎樣描繪中國人的形象？此外，抗戰漫畫不將漢奸視爲人，似乎也超越以往以血統、文化定義民族的情形，是相當特殊而值得注意的現象。成功大學歷史學系陳梅卿教授則指出，閱讀《臺灣論》的讀者雖多，卻並非所有人都贊同小林的觀點，閱讀角度也各有差異；因此，在臺灣以外，日本輿論的反應也是值得注意的。日本學界中具有批判意識的人士，也已經發出對小林的批判之聲，並結集出版爲《超越「臺灣論」》<sup>1</sup>一書，反映了他們對小林所訴求之價值的質疑。華盛頓西雅圖大學梁侃教授則針對漫畫的特性有所陳述。他認爲，漫畫在抗戰中作爲鼓動大眾的工具(agitator)，明顯具有爲政治服務的作用。不過，漫畫畢竟是從西方世界經日本轉介而傳入中國的，因此在表現手法上各有異同；中國的漫畫比較講求讓讀者一目瞭然，但相對也較缺乏幽默感。

本次會議，從各篇引言的內容來看，是以「圖像中所呈現的歷史」爲一大主題。然而，歷史學者所處理的文物圖像，是否足以傳遞「過去的歷史事實」，曾引發國內學界的討論。<sup>2</sup>歷史學者處理圖像資料的態度，或許在歷史事實的層面之外，也可從另外一種面向思考。誠如王明珂教授所指出：「『事實』只是圖像資料表面所呈現的價值；由『述事』與『展演』層面，我們能由圖像中發覺更重要的知識，即使其中缺乏『真實』。」<sup>3</sup>從虛中見實，所見到的則是人爲有意建構的歷史知識，足以讓我們省思歷史的本質究竟爲何。其次，解讀文物圖像——「如何看」——的問題，涉及科際間的方法論交流，史學界如能多加借鑑其他學科已發展出的方法（諸如讀者反應、凝視之下的權力關係等），再善用史學研究者對於史料與社會背景的熟稔，與其他學科的學者合作，進行跨領域研究，似乎也是研究典範形成的必要作爲。

<sup>1</sup> 日文原名《「小林よしのり『臺灣論』」を越えて——臺灣への新視座》，2001年出版。

<sup>2</sup> 見《古今論衡》第二期（1999年）中，詹素娟與張隆志對於《番社采風圖》所作討論的相關文章。

<sup>3</sup> 王明珂，〈史料的社會意義：事實、述事與展演〉，《近代中國》，期143（2001年6月），頁9。



# 「現代中國史學與歷史思想研討會」 會議報導

彭明輝\*

2001年5月23-27日，一項名為「現代中國史學與歷史思想研討會」(Workshop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cal Thinking)的學術會議在德國海德堡大學(University of Heidelberg)舉行。這個研討會是由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Harvard University, USA)柯保安教授(Paul A. Cohen)、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黃進興教授、北京大學歷史系劉桂生教授、紐西蘭歐塔果大學歷史系(Institute for History, University of Otago, New Zealand)孟羅尼教授(Brian Moloughney)、荷蘭萊登大學漢學系(Sinological Institute, Leiden University, Netherlands)施耐德教授(Axel Schneider)和德國海德堡大學漢學系(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Germany)魏格林教授(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等人所發起，實際的會議負責單位是海德堡大學漢學系，行政處理及名義上的主持人是魏格林教授，但會議組織及邀稿的實際執行者為施耐德教授。這項學術會議獲得歐洲科學基金會(the 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臺灣蔣經國學術交流基金會、德國學術基金會(the 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的支持。

「現代中國史學與歷史思想研討會」名為在海德堡大學召開，實際開會地點是在距離海德堡 25 英里的歐伯福洛肯巴哈(Oberflockenbach)，一個山邊的德國農村。由於 Oberflockenbach 位置偏僻，從海德堡或法蘭克福機場均無大眾交通運輸可以直達，必須乘坐會議主辦單位所安排的交通車，與會學者有類上山練功，無處可逃，加上這座小村子只有一家雜貨店、兩家小旅館（其中一家附設啤酒花園 Beer Garden），與會學者既無處逍遙，只好乖乖開會。所幸開會地點風景頗為幽美，眾山環抱，草原青青，山坡上牛群散落覓食，會議中心四周，雜花生樹，風景如畫，稍解閉關練

---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功之苦。

這次會議是延續 1995 年 3 月 29 至 4 月 2 日海德堡大學漢學系主辦的「中國史學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比較的觀點」(International Symposium: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而來。惟前次會議主題包括中國古代史學，這次會議純粹討論中國現代史學。主辦單位在 2000 年 6 月即設立網站公開徵稿，再召開籌備會議，由徵稿大綱中選擇適當論文，邀請與會學者。就實際所發表的論文來看，內容頗為駁雜，包括歷史解釋、歷史敘述、歷史文本書寫、歷史改寫權等面向，甚至電影、圖像和城市史亦列入討論，和一般觀念中的史學史或史學思想略有所異。會議論文總計 25 篇，從《清史稿》的編纂、章太炎的史學、章學誠研究的回顧、內藤湖南的中國史學史研究、國學運動、陳寅恪的史學、林彪事件的平反、臺灣的族群到電影中的現代中國與臺灣苦難敘述，可以說為現代中國史學與歷史思想找尋最大公約數，而非一般所認知的史學史或史學思想與方法，反而有點「史無定法」的意味。

正式會議於 5 月 24 日開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黃進興、陳熙遠教授和筆者三個臺灣來的與會者於 5 月 23 日早晨抵達。開往 Oberflockenbach 會議地點的第一班專車下午四點才開，於是黃進興教授建議在海德堡大學附近逛逛，同行者有中山大學桑兵教授和波士頓大學傅士卓(Joseph Fewsmith)教授。可能因為電影《學生王子》的影響，海德堡已成德國旅遊的重要景點，各地慕名而來的觀光客閒步街頭，日本團和臺灣團亦不在少。對從事研究和教學工作的我們來說，因為讀過金耀基先生的《海德堡語絲》，最有興趣的還是看看韋伯故居和前往哲學家之道散步。韋伯故居因尚未購得旅遊地圖，索驥無由，只得先行尋覓哲學家的足跡。走過奈卡河(Neckar)上的古橋，在河的另一岸，哲學家之道就在眼前。由於是日陽光普照，而且踏上哲學家之道已是近午，天氣頗為炎熱，走在哲學家之道上揮汗如雨，黃進興教授引述金耀基先生《海德堡語絲》上的話：「每次走在哲學家之道上就像談戀愛」，然後加了一個小小的批注：「戀愛果然千辛萬苦」。沿山坡而上，約二十分鐘抵達橫行之路，視野頗為開闊，奈卡河環城迤邐而下，對面山上的古堡赫然在目，那裡是海德堡最重要的景點，我們決定會議結束後再走訪。走在哲學家之道上，風趣的黃進興教授頻頻說回去要寫一篇〈《海德堡語絲》糾謬〉，看來哲學家之道並沒有讓他有戀愛的感覺。

海德堡大學位於 Oberflockenbach 的會議中心住房無多，部分與會學者須住到村子裡的小旅館，臺灣來的黃進興和陳熙遠教授住在會議中心，筆者則被安排在村子裡一家附設啤酒花園的家庭式旅館（部分與會學者住到另一家旅館）。反正這座小小的村子也玩不出什麼花樣，主辦單位不怕學者不乖乖開會，只是住在村子旅館的人要步行 15 分鐘，才能走到開會地點。

會議進行的方式與一般學術會議有點不太一樣，四天正式議程中，每天早上第一場是主題演講，然後早上和下午各有一場論文發表，但說是論文發表又有點不太對，因為論文發表人並不上臺，而由評論人對各篇論文直接進行評述，然後是作者的簡短回應，接著是討論。為了使與會者比較能進入討論的情況，主辦單位要求論文發表人在 2001 年 2 月底前需將論文 E-mail 給大會，大會再將論文傳給與會學者。理論上與會學者在前往開會之前應已經讀過所有的會議論文，但實際上論文約於 4 月下旬始陸續用 E-mail 傳給各與會學者，有的論文更遲至 5 月才寄達。可能因為與會學者被關在山上，主辦單位的議程安排非常緊湊，不僅白天開會，晚上也開會（只有 5 月 24 日晚上安排古海德堡大學之旅），有人笑稱是上夜間部。會議分為四種形式進行：一、主題演講：演講人提供書面論文並宣讀，不設評論人，但設主持人 1-2 人，演講之後隨即進行討論。二、評論與回應 (comment and reaction)：設主持人 1 人、評論人 1 人；論文發表人提供書面論文後，並不在會議中宣讀，由評論人對該場的 3-4 篇論文做摘要敘述後進行評論，然後在原會場進行自由討論；討論結束後，接著是個別論文的小討論會 (individual sessions on the papers)，分別在不同的場地進行。個別論文的小討論會基本上為單篇論文，但也有少數場次是 2 篇論文一起進行；上午和下午的論文評論和個別論文小討論會結束之後，在下午進行全體綜合討論 (plenary session)。全體綜合討論的進行方式，係由各場次個別論文小討論會指定一人做該場次的討論內容摘要，各場次的討論內容摘要報告結束後，再進行自由發言討論。三、晚間議程：發表 3 篇論文，主題為陳寅恪，設主持人 1 人、評論人 2 人，論文發表人做 15 分鐘的論文宣讀，評論人對每篇論文做 10 分鐘評論，然後開放與會者自由討論。四、晚間談話：設主持人 1 人、評論人 1 人，演講人不提供書面論文，演講後評論人進行評論，然後開放與會者自由討論。從議程安排來看，這次會議基本上比較重視與會學者的討論，而論文評論人的摘要敘述和評論尤為討

論是否成功的關鍵。大會所安排的 6 位評論人表現均極為稱職，他們是：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黃進興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葉文心教授、澳洲新南威爾大學沙培德(Peter Zarrow)教授、德國海德堡大學魏格林教授、美國科羅拉多學院齊慕實(Timothy Cheek)教授、美國紐約州立大學韓子琦教授。他們稱職的表現，為大會增色不少，亦博得與會者的一致讚賞。而從評論人的背景來看，並不特別強調是否為資深學者，而以對該場論文是否當行為考慮，筆者認為這是值得稱許，亦值得學術會議組織者參考的。

會議雖名為「現代中國史學與歷史思想研討會」，但論題頗為廣泛，筆者並非熟悉所有論文主題與內容，為免引述失義，茲將議程表列於後(因實際議程略有變動，這裡所列為實際會議進行之議程，與會議網站所列略有出入)，有興趣的讀者亦可在荷蘭萊登大學漢學系施耐德教授為這次會議所設計的網站(<http://www.let.leidenuniv.nl/AxelSchneider/hg/index.htm>)，找到會議論文提要：

**(一)Thursday, May 24, 2001**

**Panel I: Between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Historical Thinking and the Quest for Identity**

Time	Session type	Chair, Panelists, Commentators
09:00-10:00	Keynote speech	Benjamin Elman: “‘Universal Science’ Versus ‘Chinese Science’: The Changing Identity of Natural Studies in China, 1850-1930”
10:20-11:20	Comment	Chair: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Commentator: Huang Chin-hsing Papers commented: Jiang Dachun: 〈從人類歷史的存在看其普遍性和特殊性〉 Peter Zarrow: “Radical Confucianism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p>Qu Lindong: 〈繼承傳統與走向近代：章太炎史學思想的時代意義〉</p> <p>Achim Mittag: “The Excitement about Enlightenment—On the Notion of ‘Enlightenment’ (qimeng) in Chinese Twentieth-Century Historiography”</p>
11:20-12:20	Individual sessions	<p>a) Chair: Joshua Fogel Panelist: Jiang Dachun</p> <p>b) Chair: Wang Young-tsu Panelist: Peter Zarrow, Qu Lindong</p> <p>c) Chair: Thomas Schaping Panelist: Achim Mittag</p>
14:00-15:00	Comment	<p>Commentator: Yeh Wen-hsin</p> <p>Papers commented:</p> <p>Hon Tze-ki: “National Essence, National Learning, and Culture: A Comparison of Historical Writings in <i>Guocui xuebao</i>, <i>Guoxue jikan</i>, and <i>Xueheng</i>”</p> <p>Lauren Pfister: “The Construction and Remodelling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ical Traditions in Feng Youlan’s Four Histories of Chinese Philosophy”</p> <p>Edward Wang: “China and Its Other in Historical Narratives”</p>
15:00-16:00	Individual sessions	<p>a) Chair: Axel Schneider Panelist: Hon Tze-ki</p> <p>b) Chair: Huang Chin-hsing Panelist: Lauren Pfister</p> <p>c) Chair: Joseph Fewsmith Panelist: Edward Wang</p>

16:30-18:00	Plenary session	
20:00-22:00		Reception at the Bel Etage of the Old University in Heidelberg

## (二)Friday, May 25, 2001

## Panel II: The Writing of History — Forms and Methods of Historiography

Time	Session type	Chair, Panelists, Commentators
09:00-10:00	Keynote speech	Brian Moloughney: "Derivation, Intertextuality and Authority: Narrative and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Coherence"
10:20-11:20	Comment	Chair: Benjamin Elman Commentator: Peter Zarrow Papers commented: Wang Young-tsu: "Discovery or Invention: Modern Interpretations of Zhang Xuecheng (1738-1801)" Chen Hsi-yuan: "Final Chapter Unfinished: The <i>Qingshi Gao</i> and the Making of the Official Memory of the Last Chinese Dynasty" William C. Kirby: "Reflections on Official Histories in 20 <sup>th</sup> Century China"
11:20-12:20	Individual sessions	a) Chair: Timothy Cheek Panelist: Wang Young-tsu b) Chair: Michael Rudolf Panelist: Chen Hsi-yuan c) Chair: Paul A. Cohen Panelist: William C. Kirby
14:00-15:00	Comment	Chair: Huang Chin-hsing Commentator: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izk Papers commented: Joshua Fogel: "Naito Konan and Chinese

		<p style="text-align: center;"><b>Historiography”</b></p> <p>Sang Bing: 〈近代中國學術如何轉承——以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為中心的探討〉</p> <p>Li Hongyan: 〈中國近代史學中的德國資源〉</p> <p>Axel Schneider: “Methodology and the Question of Transcendence: Liang Ch’i-ch’ao and Neo-Kantianism”</p>
15:00-16:00	Individual sessions	<p>a) Chair: Lauren Pfister Panelist: Joshua Fogel</p> <p>b) Chair: Brian Moloughney Panelist: Sang Bing</p> <p>c) Chair: Timothy Cheek Panelist: Li Hongyan, Axel Schneider</p>
16:30-18:00	Plenary session	
20:00-21:30	Evening Talk	<p>Jörn Rüsen: “Mourning in History = Mourning by History. Ideas of a new element in transcultural historical thinking”</p> <p>Commentator: Georg Iggers</p>

**(三) Saturday, May 26, 2001**

Panel III: The Making of Cultural Memory—Historiography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Individual and Communicative Memory

<b>Time</b>	<b>Session type</b>	<b>Chair, Panelists, Commentators</b>
09:00-10:00	Keynote speech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Trauma and Memory: The Case of the Great Famin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59-1961)”
10:20-11:20	Comment	Chair: Thomas Schaping Commentator: Timothy Cheek Papers commented:

		<p>Mary Farquhar and Chris Berry: "Speaking Bitterness: History, Media and Nation in 20<sup>th</sup> Century China"</p> <p>Liu Xin: "The History-Memory Complex in Contemporary China"</p> <p>Edward Krebs: "The Old in the Newest New China: Publications on Private Memories as Sources for Unofficial History"</p> <p>Michael Schoenhals and Niu Xiaohan: "Official and Unofficial History vs. the Memories of Actual Participants in the December 1966 'Abduction' of Marshal Peng Dehuai"</p>
11:20-12:20	Individual sessions	<p>a) Chair: Huang Chin-hsing Panelist: Chris Berry and Mary Farquhar, John Fitzgerald</p> <p>b) Chair: William C. Kirby Panelist: Liu Xin, Edward Krebs</p> <p>c) Chair: Joseph Fewsmith Panelist: Michael Schoenhals and Niu Xiaohan</p>
14:00-15:00	Comment	<p>Chair: William C. Kirby Commentator: Hon Tze-ki Papers commented:</p> <p>Soren Clausen: "Contemporary Chinese City Historiography: The Case of Harbin"</p> <p>Qiu Jin: "History, State and Memory: Searching the Past in the Light of the Presen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 <p>Michael Rudolph: "The Emergence of the Concept of 'Ethnic Group' in Taiwan and</p>



		the Role of Taiwan's Austronesian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aiwanese Identity" Pang Ming-fui: 〈臺灣地區的歷史教學與歷史教科書〉
15:00-16:00	Individual sessions	a) Chair: Brian Moloughney Panelist: Soren Clausen b) Chair: Benjamin Elman Panelist: Qiu Jin c) Chair: Axel Schneider Panelist: Michael Rudolph, Pang Ming-fui
16:30-18:00	Plenary session	
20:00-21:30	Evening session on Chen Yinque	Chair: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Papers presented: Liu Mengxi: 〈史家的「古典」與「今情」——陳寅恪與《柳如是別傳》〉 Axel Schneider: "Reconciling history with the nation? — Historicity, national particularity, and the question of universals" Yeh Wen-hsin: "The use of memory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Chen Yinke and <i>Liu Rushi biezhuàn</i> " Commentator: Liu Guisheng, Joseph Fewsmith

## (四) Sunday, May 27, 2001

Time	Session type	Chair, Panelists, Commentators
09:00-10:00	Keynote speech	Paul A. Cohen: "National Humilia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Problem of Imperviousness and Forgetting"
10:20-12:20	Concluding Plenary session	Chairs: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Axel Schneider

在會議的總結討論中，荷蘭萊登大學漢學系施耐德教授提議組織一份期刊，以延續此次會議的研討結果，期刊為半年刊，名稱暫訂為《史學：東方與西方》(*Historiography: East and West*)，獲得與會學者的一致支持，第1期將於2001年底出刊。

「現代中國史學與歷史思想研討會」基本上是一個封閉式的小型學術會議，與會者均為論文發表人、討論主持人、評論人、主題演講人，並不對外開放，而且開會地點位於山邊小村，人跡罕至，與會者乃能專心開會，有如上山練功，至於成果如何，亦惟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此次會議若有什麼些微缺憾的話，大概是食宿接待略差，而且因議程過於緊湊，與會學者私下交流機會太少，無暇煮酒論學，稍嫌美中不足。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1 年出版之論文集

### 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論文選集

994 頁 平裝 1000 元

二十世紀在中國歷史上，無論就近代國家的形成、各式主義的興起與衰落、中西的相互認識，以及大眾文化的演變等，都與世界的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本論文選集是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於民國八十九年一月所主辦的「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成果選編而成。全書共有中文論文十六篇，英文論文八篇。各文作者分別就政治、經濟、外交、社會、文化、思想的角度，廣泛省察二十世紀中國與世界的互動關係，並審視相關的研究理論與方法，作為邁向二十一世紀的參考。

# 「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 一六〇〇迄今」會議報導

張哲嘉\*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思想史組主辦的「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一六〇〇迄今」學術研討會，經過一年多的醞釀議題與籌備，於近日正式舉行。由於有意發表論文的學者相當踴躍，決定分兩階段進行。其中第一階段於 90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1 日，假近史所檔案館中型會議室舉行，邀請王爾敏、陳祖恩、梅爾清(Tobie Meyer-Fong)、張哲嘉、潘朝陽、劉紀蕙、曾藍瑩、李貴豐等人宣讀論文；第二階段則於 9 月 5 日至 6 日，邀請黃克武、周慧玲、Robert Eskildsen、呂紹理、王正華、朱靜華、許綺玲、黃麗生等人宣讀論文。前後兩場共 16 位學者，分別從歷史、科學史、地理學、藝術史、比較文學，乃至博物館學等多種學科的觀點，探討近代中國視覺表述的各種可能方式，及其所顯現之不同面向的文化構圖。

從 89 年 3 月起到會議開幕，爲了協助同仁對相關議題的思考與定位，主辦單位舉辦了一系列共五場的演講活動；這些演講的主題，基本上環繞著從不同角度研究視覺的方法及其問題意識對處理中國近代歷史可能的啓發。第一、二次演講的主題是針對研究方法，請到輔大比較文學所的劉紀蕙教授和師大美術系的王正華教授，分別演講〈視覺圖像的徵狀式閱讀：兼談三十年代中國文化論述中的法西斯妄想以及壓抑〉以及〈藝術史的圖像研究：歷史、方法與實例討論〉。後三次則著重特定圖像的解讀，分別請到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的司徒琳(Lynn Struve)教授演講“European Pictorial Books on 16<sup>th</sup>-18<sup>th</sup> Century China”，古地圖收藏家、南天書局負責人魏德文先生主講〈以蒐集古地圖看臺灣〉以及康乃爾大學的高佳龍(Sherman Cochran)教授主講“Where do Advertising Images Come From? Historical Origins of Chinese Mass Culture”。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此次會議的主旨，顧名思義，是希望邀約學者以圖像、物件等視覺史料為中心，從新文化史的研究取向，探討近代中國的文化表述。從材料的角度而言，視覺史料與文字史料有顯著的差異；它們不僅有不同的創造者，也有不同的接受者，更有截然不同的議題。視覺表達能在某種程度內突破文字的限制性，給予讀者更強的震撼，從而顯示文字史料所不易展現的歷史面向。

第一階段會議的第一篇論文，是近史所兼任研究員王爾敏先生的〈《點石齋畫報》所展現之近代歷史脈絡〉。開宗明義就點破作為一種圖像史料，《點石齋畫報》從動機、取材、繪圖、出版，到傳播，如何把出版業、中外交流、繪畫以及大眾教育等各式各樣的歷史議題連結起來，這些史料又如何幫助我們掌握僅憑文字史料不易了解的上海社會變遷。作者指出：《點石齋畫報》是晚清極具代表性的圖像史料，對於再現上海的社會面貌，以及清末國人對於外國事物的認識，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其重要性可歸納為：（一）它代表了中國近代出版技術史的一項革命。雖然石印機印刷技術早在鴉片戰前已由傳教士運用於印刷中文傳教小冊子，惟其廣泛運用於商業性的印刷業，則始於光緒四年(1878)上海創立的點石齋印書局。該局用石印技術取代雕版，使得成本降低，得以大量銷售。（二）該畫報前後共聘用了吳友如等二十餘位畫家，其共同畫風則為以中國工筆白描，傳載時事人物、中西建築景觀。既是純粹中國畫風，復又繼承明清以來版畫風格，可資作為說明中國繪畫與大眾傳播如何結合之極佳的個案研究。（三）《點石齋畫報》除了圖畫以外，所附的圖說價值尤高，不但是當時中國人認識西洋事物的重要窗口，更是現代史家了解當時社會的有力憑藉，經考證後可知確足以代表當年之真實紀錄。其精要可貴之處，蓋有助於吾人認識上海地方之社會變遷、西洋新事物之介紹、中外要人之活動、華人節慶風俗之描繪，以及租界西洋人生活之記述。

雖非刻意呼應，會議的第二篇論文就具體例示了上述最後一點的圖像史料功能，以照片來補文字史料不足，甚至於無法呈現的地方，只不過其主題並非西洋，而是租界的東洋人。專研近代中日關係史的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陳祖恩，即以〈撩開封閉社會的神祕面紗：圖片中的上海日本人居留民〉一文探討這樣的問題。明治維新後，一些日本人抱著「舉旗闖海外」的志向來到上海，最初寄生在歐美租界。甲午戰後，日本成為租界俱樂部的一員，並且自1915年起超越英國，成為上海外國居

留民人數的首位。和其他各國租界極為不同的是，日本人居留民社會強烈排外、異常封閉。雖然處於上海這個國際大都會，卻幾乎沒有任何與異文化的交流；他們的語言、食、衣、住、行、宗教、醫療等，無不日本化。其生活實況對同住上海的中國人來說，是朦朧而不清晰的。有關的文字記載雖非完全闕如，但比起圖像資料卻遠較遜色。後者包括了 1916 年起出版的《上海寫真帳》等十多種寫真集、漫畫、明信片，以及未出版的油畫等。這些圖像資料揭露了上海日本人居留民社會的形形色色。作者並特別選出了早期日本人居留民的職業、生活風俗，居留民社會的形成及其特點，日本居留民「土著派」的生活風情，日本人居留民中的「俱樂部」文化，以及戰時體制下的日本人居留民生活等五個課題，來呈現這些僅憑文字難以縷述的生活實景。

圖像不僅能記錄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也可以用以描繪人間仙境的夢想。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系梅爾清教授的〈畫出揚州夢：往昔與今日的旅遊形象〉(Picturing the Yangzhou Dream: Images of Tourism, Past and Present)正好說明了這一點。這篇論文以近現代揚州有關旅遊的圖像和物質文化為題材，探討視覺表現與文化實踐的關係。位居大運河與長江交會口的揚州，是明清南來北往旅人的輻輳之地。揚州的繁華再加上鹽商與皇室的特殊關係，使得 18 世紀成為揚州的黃金時代，幾處特殊的勝景和著名園林便在此時崛起。這些名勝在當時的導遊書中以圖像的形式出現，有名的畫作中也常見到它們的蹤跡。甚至於，有一種賭戲是根據其中一本旅遊書的圖畫而設計，讓無緣親身涉足揚州的玩家，也可以在家中虛擬旅遊一番。那些名勝景點體現了揚州城的理想形象——亦即所謂的「揚州夢」。當我們廣泛瀏覽了圖畫導遊書、賭戲，以及繪畫等史料，將可以探索盛清時代由文獻、圖像，以及物質文明所共同構築的揚州夢。後來，使揚州繁華的許多因素隨著歷史的發展慢慢消失。如太平天國的戰爭破壞、大運河的淤塞難行，都使得揚州逐漸褪盡往日風華。20 世紀初南北交通幹線津浦鐵路的過其門而不入，更讓揚州顯得破落。然而，近年來由於刺激旅遊、發展經濟的風潮，揚州的官員和企業家又開始從詩歌、歷史和傳奇中尋求美麗的視覺形象與辭彙，來吸引觀光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們再度訴求揚州在黃金時代的種種回憶，把流傳已久的想像和現代發展的物件聯繫起來。現代的導遊書、紀念品等宣傳物，也重新以圖像方式喚起今日的揚州夢。

風景與地理一向是圖畫表現大地兩個最主要的課題。梅爾清處理了風景等圖像如何呈現地方的歷史與文化資產；近史所助研究員張哲嘉的〈明代方志中的地圖〉則試圖探討後者，其所運用的素材則是地圖這種史家早已熟知並廣為運用的圖像史料。作者試圖討論的問題是：中國地圖史的研究焦點，向來集中於圖法的進步，以及對少數名圖精密度的禮讚。從某方面看，這種觀點是從現代地圖學的價值出發，擇定古地圖的菁英，再以所揀選的偉人或名圖為座標軸，勾勒出中國地圖史變遷的梗概。其一體的反面，則是漠視了「落後」、卻佔大多數的其他地圖。本文希望能針對此研究取向提出若干反省；所要研究的對象，正是在傳統地圖中數量最夥、史家最熟悉，但卻因過分簡略而被忽視的方志地圖。本文以受西方圖法影響前的明代方志為對象，並與洋圖比較後，指出：方志地圖的視點是從中心向四面眺望，而非如洋圖，站在某一特定角度對全境作解剖式的觀察。在很多方面，方志圖甚至刻意忽略輕易可見的特徵，而要把各具個性的地理區，都在象徵中國傳統秩序的方框中，顯得千篇一律但各得其所。本文希望說明傳統地圖自有其試圖強調的文化價值；如果地圖是引導人們了解空間的工具，學者必須掌握古人的價值觀，才能看到他們心目中的世界，以及希望讀者看到的地方。

土地的視覺表現方式並不限於描繪於紙帛的虛擬圖畫，實體的建築群以及景觀配置當然也能影響身居其間之人們的視覺感，可說是繪於大地的圖畫。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潘朝陽教授的〈土地崇拜的空間示意與景觀詮釋：以苗栗地區土地公祠為例〉就是探討這樣的主題。本文以苗栗市地區為目標，依據人文地理學的空間詮釋方式，討論土地崇拜的空間形式和景觀意義。作者認為：臺灣土地崇拜最明顯的特徵，是以土地公祠的形式，營建出聚落「中心－四方」的空間標誌。早在甲骨文中，「社稷」之「社」就是指土地崇拜之空間形式及景觀呈現；當時，「中心－四方」神聖空間的理想型態即已出現。發展到漢代，理論更形具體，把五方五色的空間觀和中心－四方之社稷崇拜結合起來。這種土地崇祀的傳統，也隨著漢人渡海移墾而具現於臺灣。在此，「社」基本上是以土地公祠的景觀出現；鄉村常見的土地公祠是「四方」之神聖化標誌，而以村莊的大廟標誌「中心」。街鎮空間結構之向度和層次較為複雜，其「中心－四方」的空間基本理想型態，也隨之多重化。「社」原本蘊涵著承載萬物、生產長養、坤陰后土以及社區守護等等文化、社會上的意義，因此自古就是漢人社區的基本單

位。臺灣的土地崇拜亦擔負著相同的功能，而由土地公祠呈現此種文化、社會內容。惟由於當代宗教傳統隨現代化而急遽改變，實不能毫無保留地假設傳統的功能或象徵迄今依然不變，其意義尚待進一步實證考察確認。

土地的空間關係固宜用景觀配置來詮釋，要表現空間中活生生的人們，則仍以寫生較為有力。美國南加州大學藝術史系／東亞系曾藍瑩教授的〈窮鄉僻壤與販夫走卒：趙望雲連載於《大公報》的旅行寫生通信〉，所探討的對象為名畫家趙望雲(1906-1977)於1933-1934年間在天津《大公報》上連載的兩組寫生通信——《農村旅行寫生集》和《塞上寫生集》。這兩組寫生通信透過視覺圖像，報導他深入冀南農村和長城沿線的所見所聞，在刊登期間即已引起轟動，見報之後又得馮玉祥和韻，以圖詩相配的方式結集出版，更延長其後續的影響力。本文討論了畫家如何以圖像描摹窮鄉僻壤與販夫走卒，也針對畫家與報社的特約關係和寫生通信，探討了邊緣的地區與邊緣的人群，何以能夠傳達《大公報》所意圖主導的意識形態。透過趙望雲「旅行以見證，寫生以紀實，通信以報導」的活動，作者論證：對三〇年代的讀者來說，這些寫生通信實無異於當代歷史的書寫；而且由於《大公報》可觀的發行人數，這些寫生畫在與社會溝通的過程中，壟斷了人們對於農村與邊塞的認識，並且型塑了讀者對這些地方的集體記憶。

同樣是探討大眾傳媒中的插畫，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劉紀蕙教授的〈前衛、頹廢與國家形式化：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進步刊物插圖所呈現的視覺矛盾〉一文，則討論到新畫風與國家形式化的關係。1925到1927年間處於轉型期的創造社及其刊物《創造月刊》，逐漸由早期的浪漫個人主義，轉向注重群體與社會的革命論述與創作，其中郭沫若尤具代表性。小說家兼插畫家葉靈鳳常為《創造月刊》作畫，此時他的插畫中經常出現深具未來派風格的圖像。他在創造社與魯迅激烈辯論之際，曾以未來派的畫風譏嘲魯迅為「陰陽臉的老人」。圖中抽象橢圓形與大砲圖像，穿插著箭頭般的銳角三角形及攻擊性的文字，正是典型的未來派前衛作風，與創造社當時充滿革命與行動的語言相呼應。「前衛」此語所蘊涵的軍事行動以及探索前進的激情，也提供了他們必要的思考工具。後來，隨著蔣光赤(慈)於1926年在《創造月刊》連載〈十月革命與俄羅斯文學〉，文學革命與革命文學的論述全面展開。前衛藝術與前衛文字中的行動主義、對立立場，以及以戰爭淨化世界的修辭更是十分清楚。當這篇文章發表時，正好

與葉靈鳳具頹廢唯美風格的〈醇酒與婦人〉畫作並列，革命與頹廢形成了奇異的對照。其實，由於葉靈鳳的插畫工作，此類頹廢唯美的圖像不時穿插其間。然而，就其背後牽扯的脈絡以及創作心態而言，不難看出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發生的前衛、未來、黴黴(Dadaism)等現代主義運動，實與頹廢有其內在牽連。本論文試圖深究二〇年代中後期郭沫若所謂的「時代精神」與文字中的革命能量如何形成；並透過《創造月刊》等刊物中前衛與頹廢的並存，窺探當時前衛動力如何與未來派、黴黴主義摧毀障礙的行動決心，以及頹廢派的死亡毀滅魅惑之間，有其互為表裡的辯證關係。

最後一篇論文是臺北商專、臺灣藝術學院李貴豐教授所宣讀的〈明清之際「文房雅器」風格側論：木雕素面筆筒實物舉隅〉。本文討論筆筒這種傳統士人必備的文房用具與文化的互動關係。和一般藝術研究者相對注重竹雕筆筒的趨勢不同，作者刻意選擇較富「人為」文化寓意的木雕筆筒，討論其造型之線條及其所隱含的文化意象。另外，也和尊重「書畫雕刻」的潮流相對，作者著眼於素面筆筒的切面與構形線條。以文物為史料，可以發現文物之材料與工藝、工藝與美術、美術與人文之間，都存有可供探索的空間。以本文所探討的木雕筆筒來說，筆筒的內外器壁、器壁夾層、口緣與底足之造型、線條，乃至材質與歲月的痕跡，全都足以透露出豐富的文化意義。由上述這些點切入，可以清楚解讀出當時人自覺或不自覺的「接物」態度。作者強調，製作筆筒時一方面求其實用性，同時也可見觀賞性或玩賞性亦同時發展；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兩者間始終保持著互動關係。

\*

\*

\*

第二階段會議的第一篇論文，是近史所副研究員黃克武所發表的〈笑看眾生雲雨情：論中國近代春宮畫中的幽默感〉。自明朝中葉以來，中國社會中即流傳著大量有關情色活動的藝術作品；其創作素材繁複多元，但絕大多數是藉木刻版畫、水墨圖或彩繪畫形式作主題式的呈現，這些繪畫一般稱為春宮畫。以往關於中國春宮畫較重要的學術論述，如高羅佩



(Robert van Gulik)、費俠莉(Charlotte Furth)、栗山茂久等學者，或環繞著價值判斷，或著重分析其社會、文化脈絡。作者則認為，中國近代春宮畫雖有不少雅俗共賞的作品，但其中一些也反映出品味的階級差異。作者另外也比較了不同文化的春宮畫，並發現相對於日本，中國的春宮畫具有溫和、平靜的特色。再者，西方的春宮畫大量使用透視法，描繪人體以寫實為主，這與中國春宮畫著重線條式的身體表達有著顯著的不同。最後，西方春宮畫中有三種幽默式的表達，是中國春宮畫中十分少見的：第一種是與政治、宗教諷刺結合的春宮畫；第二種是屎尿幽默；最後是「變態」的春宮畫。作者認為，上述三種幽默主題在中國春宮畫中的缺席，雖然契合中國春宮畫所表現出的溫和、淡泊以及與自然融合為一的理想，但也使得中國近代文化論域喪失了多元、歧異、衝突與征服所可能帶來的另類美感，同時也限制了人們對身體奧秘的發掘與想像。

中央大學英美與文學研究所的周慧玲教授，同樣關心視覺與性別建構的議題。她以〈性別想像、視覺再現與中國現代性：二十世紀上半中國攝影圖像中的表演行為與性別論述初探〉一文，把研究的客體從繪畫轉到了照片。作者首先指出：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攝影手札》，從「被攝影者」與「觀看者」的位置討論攝影，是一種新的書寫可能。巴特認為，攝影（尤其是肖像攝影）帶來一種「反身自觀」的新文化行為。針對被攝影者面對鏡頭時所產生的一系列「非自我客體」的表演劇碼的分析，使得對攝影的討論，不再侷限於攝影的靜態思考，而是放在「攝影動作」本身。作者在這篇論文中，對各種研究方法加以整合利用，並對《良友畫報》裏的一篇名為〈小家庭學〉的攝影報導作個案研究，藉以探討 20 世紀上半葉關於中國攝影圖像與性別意涵的建構與表述，還有攝影所帶來的「看的文化」，及其意圖傳達的「性別」訊息。此外，該文也討論到這些訊息如何與其他視覺文化的性別表述進行對話、辯證與協商。作者的研究顯示，在 20 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攝影、電影與戲劇是參與現代性別概念建構的重要視覺文化；三者之間往往互為彼此所「表演」的「歷史事件」與「虛擬演出」，也以對方作為「歷史事件」與「虛擬演出」的最終表演結果。在重建彼此關於中國「現代女性」論述的同時，三者同時也在協商與表述各自的觀點。中國「現代女性」的歷史面貌，也是這三種虛擬與歷史表演的反覆、交涉和協商的結果。

美國 Smith College 教授 Robert Eskildsen 的研究，則與前一階段會議

中地圖的研究有若干呼應之處。他的〈1870年代有關臺灣漢蕃沿邊外國對差異與契約的觀點〉(Foreign Views of Difference and Engagement along Taiwan's Sino-aboriginal Boundary in the 1870s)一文，所要探討的問題有二：首先，是1870年代的外國人（主要是美國人與日本人）如何看待漢蕃邊界；其次，是想從外國人的觀點中，解讀當時的漢蕃關係。爲了回答這兩個問題，Eskildsen先從解讀當時外國人所繪製的臺灣地圖入手，對這些地圖中的漢蕃邊界做出比較，進而與他們在其他書面資料中對相關邊界的解釋相對照。透過這種比較，Eskildsen發現在外國人眼中的漢蕃邊界是一個「接觸面」(contact zone)。他認爲要了解這個「接觸面」，與其從當時政治中心（例如北京或東京）的觀點切入，還不如從政治邊緣（臺灣）的觀點著手。作者列舉出美國人李仙得(Charles LeGendre)與日本《東京日日新聞》記者岸田吟香所繪製的地圖，指出圖中看似自然疆界的界線，其實都是配合強權政治勢力擴張考量的結果。該文的結論是外國人所繪製的地圖往往誇大漢蕃邊界，以西方外交觀念中對「邊境」的理解，將臺灣一分爲二，藉以合理化自己殖民臺灣東部的企圖。反之，臺灣南部的區域地圖，其重點則是從對「疆界」的強調，變成爲殖民者提供有用的統治資料。有關臺灣南部的文字記載，也透露了漢蕃之間高度互動的訊息；而漢蕃沿著邊界的互動情況，正可以用來解釋中國邊緣地區「接觸面」運作的模式。

政治大學歷史系的呂紹理教授也同樣使用地圖、照片等圖像資料，重建臺灣早期的視覺形象。作者的〈日治時期臺灣的旅遊活動與地理景象的建構〉一文指出，旅遊是一種轉置時空的活動；在旅遊中，人們逐漸脫離自身原有的生活脈絡，進入到另一種不同的生活情境。旅遊的過程，事實上就是不同生活時空脈絡切換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們一方面脫離既有的生活經驗以尋求新生活的刺激，但卻也在同時尋求自身既有生活經驗的認同。在日治時期，「旅遊」是臺灣社會領導階層最喜愛的休閒活動之一，也成爲戰後休閒生活中重要的項目。作者在本文中，使用了旅遊手冊、風景明信片、照片等材料，探討日治時期所建構之臺灣地理景觀的特徵，以及型塑臺灣人認知自身土地的社會條件。作者發現，日治時期臺灣的旅遊活動表現出「制度化」的趨勢，縱貫鐵道的通車爲旅遊的制度化奠定了基礎，旅館的出現則爲旅人提供旅遊活動的基地，而旅遊手冊的出版則爲制度化的旅遊活動勾勒出行動的藍圖，同時也塑造出一種臺灣地理人文景觀的固定形象。此形象的認知，最初原本是爲日本或域外的旅客提供的指

南，但在其他社會條件的配合下，這種形象也漸漸成為臺灣人認知自身土地特質的主要內容。

政大歷史系的朱靜華教授，則討論到另一個角度的視覺材料與形象建構的問題。她以故宮這個藝術重鎮為題，探討其主權象徵性的來龍去脈。她的〈作為文化表徵的故宮博物院：中國藝術史典律的形成〉(The Palace Museum as Representation of Culture: The Formation of Canons of Chinese Art History)一文指出，以往大部分的相關論著都認為故宮是中華民國成立以來國家主義的象徵，卻鮮少分析這個象徵本身的意義。近年來，在新穎的博物館研究方法的刺激之下，已有不少西方學者表示有興趣進一步探究故宮的意義，但至今他們仍很少發表專門討論故宮的專文，也極少論及故宮內部的收藏。本文所分析的方向，是要解釋故宮為何及如何成為「文化的表徵」，及其作為文化表徵所蘊涵的意義。作者在本文中從兩個方向檢視故宮。首先，是分三個歷史階段，討論故宮之「國格的啓示」(manifestation of nationhood)。在第一個階段（1920年代），故宮所呈顯的，是一種掌控的形象(image of control)；第二個階段（中日戰爭期間），故宮被當作是存活的表率(spirit of survival)；在第三個階段（國民黨政府遷臺以後），故宮則成為政權合法性的象徵(symbol of legitimacy)。其次，在故宮的收藏方面，作者藉著對故宮收藏的討論，勾勒出故宮如何影響到中國藝術史典律的形成，與故宮如何成為文化表徵這兩者之間的關聯。作者仍按前述三個歷史階段，以三個例子（古物陳列所、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以及赴美五大城市巡迴展），分別敘述了故宮收藏品如何成為中國藝術史的典律，以及這些收藏品如何進一步成為文化的表徵。作者發現，故宮如何展示其收藏品，與故宮在某階段所扮演的文化及政治角色，有著直接的關係。

如果說文物的陳列足以成為一個國家文化的表徵，那麼萬國博覽會就是最容易凸顯出這個國家在世界各國間所具特色的地方。近史所助研究員王正華的〈呈現「中國」：1904年美國聖路易萬國博覽會中的大清國〉，即是探討中國在這樣盛大的國際場合中，選擇以什麼樣的方式呈現自我。清廷於1904年耗費鉅資，首次由官方派遣特使團參加美國聖路易城舉行的萬國博覽會。作者認為，清廷在當時財政拮据的情況下，仍積極參與此次博覽會，可視為是1895年後中國重商主義興起的一環，更是庚子事變後慈禧振興工商、推展新政的一部分。清廷參加此次博覽會的成效，可分幾方面討論。首先，在外交方面，中國特使在當地媒體與社交活動的能見

度較以往大幅提高，可說是一次成功的外交活動。不過，商業方面的利益則似乎不是清廷的主要考量。作者指出，在此次博覽會中，「中國館」並未能清楚標示出民族國家框架所定義的「中國」；這既顯示了晚清中國面對現代／西方的困境，也透露出中國當時既無反身關照後對自己文化傳統的定義，又缺乏學習西方後對於展演文化的熟練操作。然而，清廷所展出之美籍畫家柯姑娘所繪製的慈禧肖像，卻比傳統的肖像畫更具視覺展示性，並且也顯示出中國帝后肖像之運用與意義較以往已有重大變化。作者發現，在聖路易博覽會中的「中國」，並未呈現出民族國家式的同質性與統合性，而是呈現了異常複雜的景象，並顯示了多重的歷史意義。中國此次參展所呈現的形象，並未合唱著現代性的和諧之聲，而是交相混雜，難以定義。

與國家相比，近代的個人形象則較常以攝影或圖畫來呈現。輔仁大學法文系許綺玲教授的〈魯迅寫攝影〉就同時觸及了攝影、版畫，與個人形象在這些媒介間的轉變。作者先從魯迅提倡的版畫藝術談起，探討版畫與攝影的區別。再由攝影畫報的讀者，談到魯迅所謂的不知反身自觀的「看客」。接著更從魯迅〈論照相之類〉一文，解讀魯迅筆下「以照相描寫自身的中國人」、魯迅本人及其與他人合照的照片。首先，在版畫與攝影的區別方面，作者認為魯迅較關心版畫，曾為此付出不少心力，並認為版畫的複製容易，能成為流傳較廣的藝術作品；同時，魯迅並不把攝影視為藝術作品。其次，在「看客」方面，作者認為，當時攝影畫報中的「看客」對魯迅曾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尤其在著名的「幻燈片事件」中，這些「看客」就在有限的框界之內，不斷地自我強調其在現場，使觀看者不得不直視歷歷在目的擾人細節。最後，作者討論了魯迅的〈論照相之類〉一文，認為魯迅對中國人在相片中的自我描寫，顯示了兩種文化意涵：一是相片中人的自以為是，二是後人所看見的。關於魯迅本人的照片與合照，雖然最初的目的只是私人領域的用途，但後來都被神聖化了，任何有關他的照片都已被公共領域所注目及論述，不再屬於私人收藏了。

會議最後一篇論文，是臺灣海洋大學黃麗生教授的〈近代內蒙古人民的生活圖像〉。作者指出，內蒙古在地形上是一個以高原為主的地區；由於這種遼闊卻貧乏的地理特質，使這裏的居民必須不斷的遷移，也使得高原上的民族必須一再競逐征戰，爭奪有限的資源，以便在脆弱的生態環境下求生存。在大自然的強力制約下，內蒙古的居民必須以最少的需求與最

大的意志和韌力，來順應自然以求生存，並以此呈現了特殊的人文特質。內蒙古在 15 世紀，就有了自己的城市；在遊牧生活之外，也因漢人的加入，而帶來了農工商業；在宗教方面，則有西藏佛教的傳入，因而形成了內蒙古多元而並存、殊異而相容的生活特質。隨著時代的變遷，現代事物也陸續加入上述生活特質之中，因而使得城市與農村、草原之間產生了重大的差距，也形成了傳統與現代俱存的強烈對比。作者發現，藉著這些形貌，連接過去的歷史與現代的變遷，讓有著特殊時空背景的人民生活影像，也有機會呈現其鮮活的一面，並表現其生命存在的意義。

\*                         \*                         \*

除了上述論文以外，第一階段會議的綜合討論時段，還特別邀請曾藍瑩教授講述藝術史處理視覺課題的角度。曾藍瑩表示，傳統的藝術史研究講究的是藝術品的風格與象徵，重視的是作品或作者想表達的意義。近年來藝術史研究所關心的重點逐漸改變，開始與文化史學者共同注意到物質文化與視覺問題。他們不只是探查真實與否，更有興趣知道視覺如何「再現」(represent)歷史。所詢問的問題包括視覺效果的表演性質如何、是從什麼角度出發。後者更牽涉到權力、宰制，以及研究對象是在什麼樣的社經脈絡下出現等問題。質諸這次會議所發表的論文，有多篇已經以這樣的新方法展現。不論是媒體插畫、寫真、地圖、地理景觀，還是文物，在在足以顯示視覺研究的開拓性。

在會議最終，進行綜合討論時，多位學者表示，視覺史料的價值並不只是作為文字史料的附庸，其本身更能傳達許多文字所無法傳達的訊息。而且其價值不僅在於提供豐富的史料，更在能夠牽引出許多方法論上新的思惟。從其複雜的生產脈絡為起點，這些圖像的產生、傳播與使用，以不同的方式觸及了族群、權力、性別、階級等界域劃分的問題，以及不同界域之相互關係。再者，圖像的內涵不僅包括理性思維，亦包括情感表達，因而更能展現近代中國文化構圖之多重意涵。

# 「清代檔案與臺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紀要

林蘭芳\*

## 一、會議緣起

故宮博物院以其書畫器物之典藏聞名於世，因此該院主要活動，歷來均以展覽為主。但除此之外，該院所藏清廷宮中檔硃批奏摺、軍機處奏摺錄副、月摺檔、上諭檔、傳包、傳稿、臺灣輿圖與民俗圖繪等資料，更是研究清史和臺灣史不可或缺的一手史料。如能利用、爬梳故宮所藏檔案，對於臺灣在清治二百一十二年間，上層決策和執行之間有何落差、清廷如何因應處理臺灣的民變，以及臺灣民間社會風貌為何等問題，相信都可以得到更進一步的釐清。

過去該院研究人員即善用所藏檔案寫出優秀的論文，莊吉發便是其中代表，此次學術研討會亦有不少故宮人員發表文章。再者，創造使用檔案的良好環境，更可廣為招徠學術界利用該院典藏檔案締造研究佳績。一則活化檔案運用、增進學術，二則與外界充分交流，這也正是本次會議召開之目的。

本次研討會在六月中旬召開，還有另一個溫馨的原因：該院圖書資料處研究員莊吉發和處長吳哲夫定於六月底退休，此一會議也有向二位致意的寓意。

## 二、議程簡介

本次研討會由故宮博物院主辦，於2001年6月15、16兩日假該院演講廳舉行，與會者兩百多人，會場座無虛席。院長杜正勝致開幕詞後，繼由陳捷先發表專題演講，接著舉行五個場次的會議。除第五場為綜合討論外，第一至第四場為論文發表，茲將議程（另增「備註」欄就論文性質稍

---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所博士班研究生

做分類)簡介如下:

場次	報告人及題目	評論人	備註
專題演講	陳捷先〈從清代檔案看雍正治臺〉		
第一場次 主持人：王世慶	黃富三〈清季臺灣外患、新政與霧峰林家——林家之際遇與紳權性格之轉變〉	林滿紅	家族史
	蔡淵絜〈「淡新檔案」與清季北臺家族史研究〉	吳密察	檔案
第二場次 主持人：陳三井	洪安全〈劉銘傳與劉璈關係之研究〉	陳芳明	政治史
	許文雄〈林爽文起事和臺灣歷史發展〉	陳秋坤	社會史
	李天鳴〈林爽文事件中的諸羅戰役〉	詹素娟	軍事史
第三場次 主持人：莊吉發	葉振輝〈清同治年間軍機處檔臺灣海關資料導讀〉	陳慈玉	檔案
	許雪姬〈由乾隆朝的肅貪看柴大紀案〉	張世賢	政治史
	鄭永昌〈清代前期臺灣貨幣流通的發展與演變(1684-1800)〉	孟祥翰	財政史
第四場次 主持人：林柏亭	溫振華〈清代臺灣淡北地區的開發〉	蔡慧玉	社會史
	柯志明〈清代臺灣的族群政治〉	張勝彥	政治史
	莊吉發〈鄉土情、義民心：清代臺灣義民的社會地位與作用〉	周宗賢	社會史
第五場次 主持人：吳哲夫	綜合討論 引言人：莊吉發 陳捷先 柯志明		

### 三、專題演講內容概述

陳捷先專題演講講題為〈從清代檔案看雍正治臺〉，他甫出版《康熙寫真》一書，以歷史小說的筆法來重現康熙。寫完父親康熙，繼之談其子雍正的治臺風格。他指出：雍正治臺，一改康熙朝「不以生事為貴」的作

風，加上有鑒於朱一貴事件的教訓，變消極為積極，同時更厲行務實政策，調整臺灣職官制度、增劃臺灣行政區域、慎用臺灣文武官員、關心臺灣官員生活、加強臺灣防衛實力、安定臺灣內部秩序。結語提及，雍正治臺，既重視政治經營，又強調經濟開發；既關心疆土之固守，又兼顧大一統的宏圖。從歷史長遠的潮流來看，有利於穩定地區統治，裨益統一之局，也有助於多元民族國家的發展與進步。

#### 四、論文摘要

配合「清代檔案與臺灣史研究」的會議主題，此次研討會所發表的十一篇論文在處理的時間斷限上，皆屬清治時期。目前臺灣史研究有逐漸聚焦於日治時期和戰後之勢，「此調不彈久矣」的清治時期之研究藉此次會議重新發聲，令人欣喜。這些論文以其研究性質可約略分為：與「檔案」相關者兩篇，政治史、社會史各三篇，家族史、軍事史、財政史各一篇。茲依以上分類將論文摘要如次。

##### （一）檔案類

蔡淵潔所撰〈「淡新檔案」與清季北臺家族史研究〉一文，目的在於拋磚引玉，寄望有更多人利用該項檔案，來討論相關問題。全文除前言、結語外，重點有三：「淡新檔案」與社會史／家族史研究、「淡新檔案」中有關家族地位層級和內外關係之資料、「淡新檔案」中有關家族活動及其變遷之資料。該文特色為以「表」來彰顯各節討論重點，三節共列出五個表，惜未詳加分析。評論人吳密察因事未克出席，其請人代為宣讀的評論指出，該文只以早年戴炎輝的分類做基礎，顯有不足，應加重整體考察；而且晚近對淡新檔案已有深入之探討，不宜略而不談。康豹發言指出，作者對「地位層級」之用語未加定義，文中諸表應置於附錄，如作為內文應有詳細之論證，不能存而不論。

葉振輝所撰〈清同治年間軍機處檔臺灣海關資料導讀〉一文指出，清同治年間海關資料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資料，珍貴異常。該文首先介紹軍機處臺灣資料皮藏與整理現況，其次以原件影印之方式分析軍機處奏摺錄副之格式，繼之解釋海關收支報告出現之相關名詞，如海關收支報告又稱「四柱清冊」，另有結期、船鈔、稅司、洋稅及洋藥稅、火耗等目。作者



提出之心得與感想為：軍機處檔案可比對出滿清重要大吏相關全集中和稀泥之處。該文附錄「清同治年間軍機檔臺灣資料一覽表」，對研究者當大有助益。

## （二）政治史類

洪安全所撰〈劉銘傳與劉璈關係之研究〉一文，係充分利用故宮檔案和出版品撰成。作者使用一份前人尚未使用過的劉銘傳密參劉璈之摺片，屬新史料的提出；又考證出劉璈卒於光緒 13 年(1887)到 16 年(1890)之間。該文討論了劉銘傳之退守基隆、劉璈案之過程、二劉出身與性行之比較、湘淮二派之畛域、道員的地位與所造成的衝突。結論指出：出身與性行乃個人處事之本，道員地位乃處事之憑藉，湘淮畛域乃個人過去之歷史經驗，此三者存在在影響二劉處事方式和人際關係。

許雪姬所撰〈由乾隆朝的肅貪看柴大紀案〉一文，從清高宗懲辦貪污談起，繼而討論柴大紀的死因以及柴大紀案中遭懲處的官員。最後的結論指出：柴大紀案可能是清治臺灣以來最大的一案，不僅柴大紀慘遭處死，受此案波及者更高達一百多人。柴大紀因貽誤軍機、荒廢營伍、居官貪黷等三項罪名被判死刑，但這三項罪名卻都是臺灣官場向來之積弊及陋規，柴之所以不能免於一死，福安康等滿洲權貴對柴大紀的嫉恨可能是主要原因。

柯志明所撰〈清代臺灣的族群政治〉一文，討論到族群、文化主義、生番歸化、劃界與隔離、從消極隔離到積極利用熟番的結盟政策、以番制漢以熟制生等議題，重心則是清廷的族群政策。作者指出，清廷在中國西南實施「改土歸流」，不論土著之生熟，一律納入直接控制，設官建制；但是在臺灣，清廷用心防範的是漢人變生腋肘的問題，因此策略性地利用番人來防制漢人。清廷治臺的族群政策，自康熙末年以來，以文化主義為理想，對各族群採取同心圓式的中心邊陲差序關係；到雍正時，改採族群隔離但等距對待的原則；乾隆中期以後，終於確立以熟番為內群結盟的族群政策。

## （三）社會史類

許文雄所撰〈林爽文起事和臺灣歷史發展〉一文重點有二：一是分析林爽文的個性，二是討論林爽文事件後臺灣社會的轉變。文中先簡述事變

的導因和經過，繼之分析參加者人數、社會背景、意願、親族關係、組織意識形態及其影響。作者認為：林爽文起事以後，居民遷徙、人口成長趨緩、米價高漲、民生困窘、社會動亂增多，清廷爲此改變措施，加強政治控制，並設置屯番保障原住民，防範漢人，而官渡的實施和五虎門八里坌路的開放，更促進了臺灣北部的開拓。作者指出，就臺灣開發過程而言，林爽文起事前後建立的一田兩主租佃關係，成爲其後臺灣主要的墾殖模式；從臺灣社會發展看，則士紳、地主、豪商協助政府平亂，亂平後受賞職銜，成爲「特殊地位團體」，造成臺灣社會的兩極分化。

溫振華所撰〈清代臺灣淡北地區的開發〉一文，以區域史的角度來分析漢人在淡北地區的開發。該文討論了開墾大勢、淡北地區的原住民——凱達格蘭族與泰雅族、漢移民祖籍及淡北三大地區的拓墾情形。結論指出：淡北沿海與毗鄰地帶，僅有小墾號，並個別向凱達格蘭族請墾；盆地內的肥沃平原，則自 1709 年後紛紛成立大墾號，侵墾凱達格蘭族社域之事時有所聞；東南近山處，因有泰雅族之威脅，青潭以南墾戶結合宜蘭結首制設隘防衛。作者最後指出，泰雅族之威脅於 1885 年以後在文山區稍減，但在三峽一帶勢力仍大，漢人開墾備極艱辛，足見作者站在漢人的立場發言。

莊吉發所撰〈鄉土情、義民心：清代臺灣義民的社會地位與作用〉一文，認爲義民組織是抑制民變的民間武裝力量，其主要作用是抵制起事者、反制會黨，保護村民，或隨軍進剿亂民。作者討論了義民的族群分布及其社會地位、義民社區的形成及其社會作用、義民與生界原住民的招撫、義民組織與會黨的互動、分類械鬥與義民社會責任的體現等問題。針對大陸學者陳孔立指稱「義民不義」的說法，作者認爲，「義民」之稱呼不限於官方，在天地會告示中亦隨處可見「義民」二字，而且現存檔案並無反映義民搶掠、誣陷或公報私仇的負面情況，且督撫提鎮的奏報文書中，譴責義民破壞社會的言論實屬罕見，因此很難支持指控義民不義的論述。作者並指出，粵庄義民平時提倡文教、獎勵功名，並具經濟性功能，但這些方面現存檔案均甚少涉及，可知資料之侷限性。

#### （四）其他

黃富三所撰〈清季臺灣外患、新政與霧峰林家——林家之際遇與紳權性格之轉變〉一文，扣緊「外患」和「新政」兩大時代脈動，討論臺灣紳

家之際遇與因應時局之道。作者指出，1884-85年中法北臺之役，霧峰頂厝林朝棟、下厝林文欽分別支援劉銘傳與劉璈，也因此捲入湘淮之爭，影響到清末兩房之命運。臺灣於建省後開始推動新政，劉銘傳破格重用板橋與霧峰二大林家，引為施政之左右手。霧峰林家上厝在林朝棟領導下發揚武人根性，於1895年日本治臺後回歸大陸，繼續效忠清廷，也因此埋下衰落之兆；下厝林文欽則因支持劉璈而不得志，轉而韜光養晦，孝親教子、樂善好施，成為文教型領袖，為林家另闢一條大道。結論指出，臺灣紳家之發展高度取決於政治環境，回應策略與投效派系之選擇正確與否，更影響了家族命運與發展方向，這也顯示十九世紀末清廷已建立對臺統治權威，即紳權依附於官權。

李天鳴所撰〈林爽文事件中的諸羅戰役〉一文，從軍事史角度出發，詳述乾隆51年(1786)11月到翌年11月初諸羅戰役中民軍和福安康所率清軍對峙交戰之經過。文中分析兩軍優缺點，結論中指出，林爽文於諸羅戰役敗北，從而輸掉了抗清戰爭。本文如能詳究兩軍戰略，並輔以地形位置圖來分析，相信更能幫助讀者理解諸羅戰役成敗關鍵所在。

鄭永昌所撰〈清代前期臺灣貨幣流通的發展與演變(1684-1800)〉一文，重點有二：一是利用官方檔案來討論17、18世紀臺灣銅錢流通問題，以了解清廷在臺所實施的貨幣政策。由於清廷並不了解臺灣社會之實際情況，決策多從內地立場出發，未顧及臺灣個別與特殊需要，故政策上跌跌撞撞而收效甚微。二是利用18世紀臺灣碑刻資料和民間契約文書，討論紋銀與銀元在貨幣市場下的競合與消長過程，並對銀元流通的區域特性有所分析。此文發掘爬梳史料功夫細緻、論據嚴密，獲得諸多史學前輩的肯定。

## 五、綜合討論

在最後一場的綜合討論中，主持人吳哲夫首先報告故宮博物院《清代臺灣文獻叢編》的整理與出版經過。該叢編於1970年至1993年間，依序出版了袁世凱、年羹堯兩人之奏摺專輯，宮中檔康熙、雍正、乾隆、光緒、嘉慶、道光、咸豐等各朝奏摺，以及《宮中檔補遺》。1994年起，為因應社會要求與時代趨勢，開始編輯宮中檔與臺灣相關之史料，迄2001年為止，陸續出版清宮月摺檔、清宮諭旨檔、清宮廷寄檔、清宮洋務始末、

宮中檔中之臺灣史料。此項出版計畫尚在陸續進行中。

綜合討論引言人有三位：莊吉發、陳捷先與柯志明。莊吉發談到，其選擇退休，用意是希望利用更多的時間專心著述。他也指出，臺灣目前缺乏檔案學系，在檔案整理方面應再加強；過去故宮整理、出版檔案之進度，都走在大陸之前，近年來則有停滯的現象，值得警惕。

陳捷先歸納此次會議的成就指出，有關臺灣中、北部開發、臺灣民變、義民論題，以及族群治理政策上的研究，都為臺灣史研究建立新的里程碑。

柯志明談到，文獻之整理乃為促進研究，不論民間或是官方文獻，皆各有優缺點。地方契約文書如〈岸裡社文書〉，地方官廳文書如〈淡新檔案〉，以及如故宮所藏的宮廷檔案，應當「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互相呼應，交互檢證，以期相得益彰。此外，清宮檔案分藏於臺灣和大陸的部分，應該聯合出版，這是他作為一個讀者所提出的要求。

會議最後，故宮杜正勝院長感謝論文發表人、評論人，以及與會者的共襄盛舉，並表示故宮將察納雅言，在出版和史料整理部分盡力改進。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45)

### 袁氏家藏近代名人手書

王爾敏編

620 頁

精裝 3500 元

此書之內容，全在收載前清兩廣總督袁樹勳及其長子思亮兩代所收輯清末民初之名人手書，俱未嘗公之於世。而其書牘之可貴，多涉及民國肇始之際之政壇珍聞，若民元北京兵變後都城之荒亂寫實，袁世凱之操縱大局，袁世凱之結納前朝遺老引進參議院之布局，黃興在民元為革命軍乞借軍餉，張君勱、張嘉璈、楊度、湯覺頓、范源濂等四小黨籌謀合併之密計，以及迎接梁啟超擔任黨魁等事皆向無人知之政黨史料，參考價值極高。

# 從婦女看歷史：「近代中國的婦女、國家與社會(1600-1950)」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

許慧琦\*

## 一、大會緣起

2001年8月23(週四)到25日,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財團法人純智文教基金會贊助,於中研院國際學術活動中心召開的「近代中國的婦女、國家與社會(1600-1950)」國際學術研討會,堪稱今年臺灣史學界在近代中、外婦女史研究領域,最精彩的一次成果展現。<sup>1</sup>8月中旬以降的臺北學術界,中、外學者雲集;從漢學研究中心主辦的「欲掩彌彰: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私』與『情』」,到「近代中國的婦女、國家與社會(1600-1950)」,都吸引了大批學者的參與。後者所邀請的與會學者,來自臺灣、香港、大陸、日本、韓國、美國、英國、澳洲各國,針對近代中國婦女各方面的發展,及其與國家、社會的關係,進行廣泛的意見交流與觀念分享。該會在正式召開前,尚有準備充裕的會前會作為熱身,包括同年2月16、17日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舉行的「中國婦女史研究的新方向」國際會議(“New Directions in Chinese Women’s Histor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及6月30日由中國近代史學會主辦的「橫看成嶺側成峰:婦女史與性別研究」學術座談會。前者從法律、視覺藝術、物質文化、女性主體意識與宗教等六個單元進行討論;後者則從心理學、消費文化、電影、攝影、婦女史研究方法論等角度切入探討婦女史與性別研究。「近代中國的婦女、國家與社會(1600-1950)」會議,則從更為多元的角度,呈現豐富而歧異的近世中國婦女面貌,從而顛

---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博士

<sup>1</sup> 此會議亦為近史所於1992年獲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贊助的「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計畫第二期結束的具體成就。

覆了既往對傳統中國婦女的刻板印象；並從寬廣的歷史研究視野，重新賦予中國婦女以新生命；更從婦女的各形各色言行表現，而重塑歷史圖像的複雜面貌。

## 二、會議各項主題的展開與討論

此次會議共有 32 篇論文，分 10 個單元與場次進行。在正式展開會議討論前，首先由加大柏克萊分校歷史系葉文心教授發表名為「歷史圈套與文化困境——談『中國婦女』」的專題演講。她認為，在近現代中國政治變遷、社會重構、經濟轉型的交互運作下，「中國婦女」不再是具有高度共性的整體，而逐漸被解構為各具不同特色的女人。而如何在論述有關中國婦女的各種議題之際，能從革命及殖民話語的運作邏輯或盲點中解放出來，誠為眾人應深切關心的問題。以下，則為各場論文發表與評論內容的綜合記述。

第一場討論主題為「性別與國家」。首先由長期浸淫於清代才女文化並卓有見識的加大戴維斯分校歷史系曼素恩(Susan Mann)教授，以一位 19 世紀前半期常州詞派張琦之女張縉英(1792-1849 後)的作品，尤其是關注國家命運而發抒的「感事詞」(收錄於《澹菊軒詩初稿》中)為例，見微知著地指出政治危機、國家命運實與婦女、家庭、社會性別息息相關。本文為曼素恩教授「十九世紀的婦女」計畫中的一部分，她在文中運用了具內在凝聚力與延續性的家庭時間進程(family time line)與混亂、外顯的政治時間進程(political time line)兩種概念，交織呈現出 19 世紀的女作家，如何因「承其家學」、男性(仕宦)親戚的啓迪、與詩友交流等背景及因緣際會，使她那種被視為傳統女性所專擅的個人情懷發抒，得以與感時憂國的國家之情結合，成就她的傑出文采。近史所所長呂芳上則從近代中國公、私觀念的游移、緊張與重塑著手，析論「革命」與「戀愛」在 1920 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理念宣揚及行為實踐之間，所呈現出的種種複雜糾結關係。他不僅從 1923 年由張競生發起的「愛情定則」相關討論，歸結出當時許多知識青年所面臨的情愛困局——說得到、做不到，並舉出許多實例，說明戀愛這種在五四時期被賦予崇高個人主義意涵的行為，到 1920 年代革命意識與民族大義高過一切之時，起了本質的變化；男女間的情愛為革命所介入，個人的私情，也只能在集體的革命感情中，才得獲發展的

空間。相較於前兩篇觸及性別與國家的關係在公、私領域之互動，近史所研究員張玉法則選擇屬於女權重要訴求之一的婦女參政權課題，將其發展分階段地進行歷史性的闡述，以呈現自 19、20 世紀之交從西方傳入的婦女參政思想，如何在中國的政治、社會環境脈絡裡，發展出獨特的女權模式。該場評論人為美國維吉尼亞州立大學教授汪榮祖。他對以上三篇論文分別進行史料與研究觀點的評析，並提出問題與意見，包括建議使詩詞擴大成為研究歷史的重要材料，跳出政治史的分期與政權交替的發展框架，將婦女史做多層面的探討。<sup>2</sup>

第二場討論主題，「性別與性命」，從師大歷史系教授林麗月對明代溺女習俗與相關記述的研究中，開始展現該場評論人梁其姿所謂「女命的困境」之歷史處境。林教授從地方志與歌謠兩類史料著手，分析溺女論述的構成及行為者的心態。她指出，當時地方官多將「婚嫁習俗的奢侈」視為溺女之風盛行的主因，並由此發展出戒奢崇禮等婚俗改革。此現象所反映的是晚明菁英階層企圖挽救社會失序的策略，與禮教意識的興起。近史所助研究員呂妙芬則企圖從男性文本的侷限性中，探尋明代理學家庭裡的婦女是否可能藉由某些管道達成對性命的追求。她的研究發現，在理學論述中，女人其實並無分於道德修養的追求，即便有為人母者被冠以「聖賢」的尊號，也只能說是「母以子貴」；換言之，成聖始終不是女人的職分。這種侷限，使得她們轉而嘗試於佛道的天地中，追求自我靈性的滿足。同時，該文文末企圖說明，當代學者普遍強調晚明文學與文化的「尚情」心態，並佐以名妓文化及其與才子的情愛表現為證的研究取向，並無法涵括同樣在晚明有重要位置，卻幾乎未見「尚情」心態反映的理學世界（包括其詩作與家庭）。近史所助研究員張哲嘉所鎖定探討的明清星命書中的女命，則從一以往較少見，卻是與日常民生密切相關的算命這個視角，切入瞭解傳統社會中女性生涯的可能性，及其最（被）重視的人生問題。他的研究顯示，中國獨有的「女命」這個概念，其原理蓋與中國宇宙觀的陰陽思想相契合。星家透過聯繫傳統社會的性別關係與其所闡述的天理，將女命的論述合理化，同時在現實實踐上，進一步加深了原有的性別建構；此種傾向，尤其在星家對「淫」的警戒、強調與據此加諸女性之上的決斷性

<sup>2</sup> 例如關於中國婦女參政權的問題，可從政治以外的社會、經濟面向，說明中產階級婦女要求參政權的原因之一，在於保障其財產權，由此衍伸說明婦女運動也有其複雜的物質需求基礎。

歸罪，可明顯看出。中研院社科所所長梁其姿的總評論，則以提問的方式，點出許多發人深省的思索路線。她認為三篇論文共同說明了女性生命困境的延續性：從明代的溺女行為到當代中國大陸因一胎化政策而造成的「選擇性流產」現象，從理學家的自視清高並阻絕了自家妻女成聖的性命追求之可能，以及從明清命理學普遍將女命的壞格定於「淫」、「賤」，且視對公共事務有興趣的女子為淫，這些都共同說明並揭櫫了女命的困境，也側寫了傳統男性中心社會的性別文化運作。

第三場討論主題，「性別與法律」，四篇論文多著重於檔案資料的運用與分析。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定宜莊主要根據清代的婚書契約，討論清代的婦女再嫁問題。她首先指出以婚契取代口諾為信的傳統，是清代婚姻關係不同於前的特點之一，同時提醒讀者注意婚契也可能存在立契者出於各種自利因素而捏造的問題。她並認為，不論當時婚契中所言的休妻之因全為事實與否，多少都能反映當時社會對性別與婚姻的看法。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劉錚雲使用的資料，為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中的 278 件乾隆朝關於夫妻失和的案例。他從女子「三從」中的第二從，即既嫁從夫，以及「男女內外之分」兩個觀念出發，依夫妻失和的原因性質區分為「生活細事」與「情慾心事」兩大類，以檢視這 278 件涉及人命的刑事案件中夫妻衝突的面貌與型態，並呈現當時兩性在婚姻中的處境。從「情慾心事」這類案例的觀察中，我們看到婦女對於不事生產、床第不合、久病不起的丈夫的實際反應，實與傳統「男尊女卑」的理念規範有相當大的差距，頗堪玩味。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賴惠敏則從《內閣題本刑科》婚姻奸情類檔案與《內閣漢文黃冊》中關於旗人家庭的一百多宗案件，佐以與漢人家庭案件的比較與對照，剖析乾隆元年到 35 年間旗人家庭的特殊面貌。她從實際的案例內容，肯定一般學者認為旗人社會特別重視儒家傳統思想，包括不分家、兄弟同住的大家庭制度，以及強調女子的貞節觀念。她所呈現出的盛清旗人婦女面貌，大體上來說是「有教養，很矜持、自重」的。國史館協修梁惠錦，則從前二者對檔案的爬梳與歸類分析，轉而討論關於婦女婚姻的法律條文之發展。她所選擇的論述時段，主要從湖南婦女公開揭櫫婚姻自由權的 1920 年，到國民政府公布保障婦女婚姻自由的民法親屬篇之 1930 年。該文著意於瞭解當時各類輿論與報章媒體所呈現的婚姻自由權論述，指出兩性的共同努力、西方個人主義學說的引入等，共同締造了婚姻自由權在法律層面的成績；不過其他配套的法律條文（包括



財產、親子關係、姓氏、居住等問題)並不完善,許多舊式女子在新式婚戀模式中被犧牲、男女法律平等與實際平等間的差距……等問題依然存在,有待後人繼續努力。此場評論人為政大法律系陳惠馨教授。她主要從法學與法律規範的角度出發,提供三位發表人有別於史學訓練的一些討論議題與思考方式。另外,她認為在某些名詞的界定與分類上,如定宜莊文中的「嫁賣生妻」、劉錚雲文中的「情慾心事」、梁惠錦文中的「新式、舊式婦女」,應予以更清楚的說明與定義。

第二天(8月24日)的首場,亦即第四場,討論主題為「性別與社會」。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葉漢明,藉由19世紀末的香港華人社會領袖與英國殖民統治者針對「妹子」(即婢女)問題所進行的爭議,處理有關「保護婦女」的論述問題。這個問題的複雜性,在於牽扯出並體現了殖民母國與殖民地、殖民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男性精英與弱勢「妹子」等多種糾結而互涉的權力關係。不論華人男性精英將「妹子」制度解釋為「慈善」制度,抑或英國殖民者為統治之便而從善如流,其間都暴露了婦女(此處尤指「妹子」)做為葉教授口中「屬民中的屬民」(subaltern of subaltern),其真正的困境(包括拐賣婦孺、逼良為娼等實際而悲慘的社會問題)可能被解決的機會,多半在男性「們」的協商中,被忽略、犧牲了。加大聖塔克魯斯分校歷史系教授 Gail Hershatter,則將焦點放在1950年代中國大陸公、私領域與觀念的轉變及消長。該文為 Hershatter 教授「被雙重邊緣化的女性」(Doubly Marginalized Women)計畫中的一部分。她以陝中和陝南農村為主所進行的研究指出,「家庭」這個被傳統視為國家基礎、被五四激進派批為社會與政治落後的關鍵場域,到1950年代被中共視為僅是人類活動中一個殘餘被動的領域,首次在中國歷史上變成了「私人的」。然而,在執行生產政策與動員婦女以成為國家成員的過程中,中共又比以往的中國政權更深刻地改變了家庭這個領域。同樣將關注點放在1950年代的加大戴維斯分校歷史學博士王政,則以中共建國初期發展出的城市基層新組織——居民委員會——為重點,討論該委員會的主要成員為何多是女性,以及為何大量家庭婦女願意加入此種無報酬的志願服務?她的研究說明了婦女較純潔的政治背景,反使她們得以受民政局的重用;而擔任居民委員會里弄幹部的家庭婦女,雖然無薪資可拿,卻透過這項職務參與了國家的公共事務,得以被人以其娘家姓氏稱呼,並被賦予獨立於其丈夫的某種社會地位。易言之,動員家庭婦女參加里弄工作,既表現中共提供婦女

加入公眾社會生活的管道，同時也顯現中共精明地利用婦女（尤其是非工人階級家屬）的權宜之計。擔任評論人的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翟志成，則質疑是否在所謂的「父權體制」中，女性與男性，都千篇一律地分別扮演著受害者與壓迫者的角色。他並舉中共建國後鼓勵婦女成立「小腳偵察隊」來窺伺各個家庭內的私密生活為例，表示當時民間社會最基本的單位，即家庭，其隱私性已被滲透，私房語成了公開話，公與私的分際已難以明確區隔。

第五場的討論主題是「婦女與美感」。首先由中國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羅蘇文以最能展現近代中國時裝風尚的上海為主，援用《點石齋畫報》(1884-1894)與《圖畫日報》(1910-1911)等材料，以探討上海都會女裝興起的背景與特徵。她企圖藉由對女裝演變的脈絡掌握，考察近代上海的租界（即城外世界）文化如何影響華界（即城內世界）文化的發展，並說明「女裝」做為文化身分識別的符號，可發展為檢視社會性別問題的有用課題。她認為江南地區及其女性群體，是解構近代中國的先行區；而此解構的過程，可以說是既超前、又有其侷限性，無法代表整個中國。由此，她強調「文化地域」這個概念及其分疏，對於研究近代中國的發展，有其存在並加以重視的必要性。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游鑑明，則從「美人變種」的概念出發，把時段放在 1920 到 40 年代的中國社會，析論女體與對女體的論述，在中西文化交流、國族觀念延伸、媒體蓬勃發展、都市商業化……等發展過程裡，如何被審視與評估；「健康美」（或謂健美）的概念，又如何透過強國保種、商業需求，與女性解放等多種動機的交錯互動，被建構與呈現。該文點出某些存在於當時健美言論中的矛盾現象，包括健美概念雖來自西方，健美女性卻不應使用「舶來」化妝品；健美雖被論者視為有助女性解決兩性問題，卻同時落入男性或國族論述所建構出的固定健美框架中。不過整體而論，對女子健美論述的討論，是不應僅被置於國族論述架構底下來談的，因為從當時部分女子的自敘可知，確有女性在追求健美身體的過程中，實現了自我。墨爾本大學的歷史系資深講師 Antonia Finnane（安東籬），與羅蘇文同樣從「時裝」著手，但將歷史時空放置於中共建國初期的 1950 年代，以女畫家兼服裝設計家郁風（郁達夫之侄女）的時裝作品為例，審視當時關於衣著文化的討論與爭議，所反映出當時知識分子對於現代化、世界大同、國家認同、社會主義各方面多元化的考量與訴求。透過對郁風有關服飾的言論及其時裝設計中蘊涵少

數民族文化、大自然風味等特色並切合世界時裝潮流的分析，Finnane 教授展示了 1950 年代具有自我與美學概念的中國女性，在以男性穿著為楷模而衍伸出的「艱苦樸素」延安美學精神主導社會時尚之際，如何有所突破及其可能有的發展空間。該場評論人為哥倫比亞大學巴納學院中國歷史系教授 Dorothy Ko（高彥頤）。她從視覺文化與物質文化兩個角度出發，指出三文皆以圖片做為論述與史料的一部分，連帶將使史學方法與歷史的分析範疇皆產生改變；同時，三文皆涉及對身體概念的重建，也論證了女性主體的可建構性。她並對「時裝」(fashion)，或謂時尚，在西方自 15 世紀末以來的發展及其代表意涵，做了精要的勾勒，並提出「服飾文化機制」的概念，指出個人對服裝的選擇，在當時的消費市場其實有其侷限性，並非都能依其志願選擇服飾；而這種服飾文化機制對個人的約束，約可表現在政治路線（或立場）的約束，以及物質上的約束兩大方面。

第六場的討論主題是「婦女與教育」。臺灣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林維紅透過對曾（國藩）氏家族婦女在歐洲言行的觀察，探討受過中國傳統女子教育的官家婦女面對西方文化時可能有的表現。她首先點出該文側重的主要史料《曾紀澤日記》所具有的侷限性：即「沒有女性自己的聲音」，並仔細檢索該日記中對於曾家妻女（在此包括曾紀澤妻劉氏、兩女廣璇、廣珣，與二妹紀曜）在歐洲數年的生活剪影，諸如她們與洋人來往、參觀、學習和參與其他活動等信息。林教授並以曾紀澤的詩句「萬國身經奇世界，半生目擊小滄桑」，來勾勒曾家女眷旅居歐洲時的感受。愛丁堡大學的歷史系教授 Paul Bailey，則將關注的焦點放在民初的女學生，以及當時社會規範女學生角色與行止的種種論述上。他相當具有自覺地與那些把近代以來婦女史的發展視為「不斷解放」之過程的史家，保持了一定的距離，並從學校教科書、期刊與女性刊物的閱讀中，發掘並凸顯清末以來有關女子教育與女學生的論述所具有的「爭議性」與「複雜性」，以說明「教育」做為一種手段，可以同時為具有不同目的之論者所用。當時的女子教育發展，並不單是文化激進主義論述所闡揚的那種完全是解放女性與平等教育權的體現。加大聖塔芭芭拉分校歷史系副教授 Joan Judge（季家珍）的文章，討論的對象同樣是女學生，不同的是，這是一群跨出國門、遠赴重洋求知的留日女學生。有鑑於以往關於留日女學生的研究比較偏重於民族主義、革命或女權運動方面，她特意從文化這個廣義的面向出發，論證這批女留學生不僅在中國的政治或革命活動上有其成就；尤其值得強調的是，

她們透過在海外的生活經驗、人生歷練與文化衝擊下的諸多省思所創造出的新婦女文化與新婦女教育觀，才是她們最有意義的貢獻。該場評論人近史所副研究員沈松橋，從史家歷來對女權解釋的兩大模式<sup>3</sup>，以及理論思考的層次出發，將三篇文章予以互動性地串連。他認為林教授之文觸及了關於再現（屬民聲音）的問題，Bailey 教授有關女學生的抗爭論述帶出現代性的焦慮(anxiety of modernity)，季教授則質疑了國族主義論述，並從新文化認同(new cultural identity)的面向，賦予留日女學生活動以新義。

第七場的討論主題是「婦女與文藝」。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蔡瑜首先以晚明的《名媛詩歸》為例，透過對該書著作權的考證、評選觀念之所出，以及書中女性詩學觀的剖析，來呈現晚明女性詩評與傳統詩學的對話關係。她說明該書評選者鍾惺(1574-1625)「聯古今為一人，合述作為一心」的詮釋理論，並說明其標揚女性詩作的動機，在於以女性詩作本於性靈、質近自然的特質，矯正當代模擬失真的詩學走向。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副研究員華瑋，則從 21 種明清婦女的戲曲創作，探討戲曲作為一種文類，對明清女性作者所蘊涵的對抗正統意識形態的意義，同時審視明清婦女戲曲中的情、欲書寫所呈現的性別、時代與藝術特色。她將這 21 種創作大致分為婚戀離合、自我追求與社會關懷三大主題，並歸結出這些女作家將她們在現實社會中無法滿足的情感欲望，藉由戲曲的創作，或彰顯於夢境、補全於仙境，或抒發於圖像、表現於遊戲。而與男性作品相較，女性情欲書寫的「揚情輕欲」傾向，則頗為明顯。衛斯里安大學教授 Ellen Widmer 則以四部女性小說（顧春的《紅樓夢影》（1861 年序，1877 出版）與王妙如的《女獄花》（1904）、思綺齋的《女子權》（1907）、邵振華的《俠義佳人》（1909））為例，討論第一本與後三本小說在標示作者性別與否、作品內容與出版形式等方面的差異，探究為何小說這個文類在傳統中國多半被視為女性的寫作禁區，而清末外來文化、翻譯著作與女傳教士等所造成的影響，又如何消弭了以往對女性不成文的寫作與發表小說的限制，鼓舞女性開始參與撰寫小說這個文類，有勇氣公開自身性別，並著重小說的出版、傳播方式及其銷路。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副研究員胡曉真，則以其最擅長的女性彈詞小說為主題，透過對號稱「女性彈詞小說殿軍」的民初

<sup>3</sup> 即以自由主義為基礎的現代化敘事模式（婦女皆從矇昧到啟蒙，從落後到進步），及以國族主義為基礎的民族主義敘事模式（婦女的解放與自由，是隨國族的解放與自由而來），

彈詞小說家姜映清其人其作之介紹，上溯清代女性彈詞的創作環境與心態，下及晚清時期彈詞小說的轉向企圖，並綜合討論民初男性舊派文人試圖經營的彈詞小說之市場價值、女彈詞小說家的轉型、現代媒體廣告的宣傳炒作，以及上海文學市場的發展及其意涵。擔任評論人的耶魯大學東亞語文學系教授孫康宜，則以多種「焦慮」(anxieties)的概念貫穿四文：蔡文呈現的是男性讀者的焦慮(anxiety of male reader)，華文書寫的是關於公與私的焦慮(anxiety of the public and private)<sup>4</sup>，Widmer 文著意的是作者的焦慮(anxiety of author)，胡文觀照的則是市場的焦慮(anxiety of marketing)。

8月25日(週六)的第一場，即總會議的第八場，討論主題是「婦女與家庭」。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陳慈玉首先以一個家族——日治時期經營礦業聞名的基隆顏(雲年)家族——的婚姻圈及其與家族企業的關係，展開對婦女在家庭中可能扮演的角色與發揮的作用之探討。她藉顏家之例，說明由血緣擴散出的「姻緣」網絡，有其超越傳統中國的地緣與業緣網絡，而主導家族企業運作的可能，並比較發現顏家女子多半遵循父兄指示，扮演丈夫背後重要女人的角色；至於顏家媳婦，則或因本身家庭背景等因素，多半兼顧家庭與工作，未完全退居家中。日本駿河臺大學教授前山加奈子所提出的問題，則是針對近現代中國的母性主義而發。<sup>5</sup>她指出，做為社會「分利者」的女性，一方面被視為他者，另一方面又被賦予生育、養育和教育「新民族、國民」的特性。她並簡要比較了1930到40年代中國與日本的母性主義之異同：相同之處，在於兩國都提倡培養優秀國民(戰士)的「生育、養育的性」；而不同之處，在於日本母性主義與賢妻良母主義的推進，是朝著維護天皇制而開展，所以多了一種懂得人情世故的「忍耐」特性，至於中國方面，國民黨統治地區發展出新賢妻良母主義，中共統治區則發揚了具有「工作」與「戰鬥」特質的新母性。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康豹(Paul Katz)<sup>6</sup>，主要使用了臺灣的戶籍資料，佐以方志等其他史料，從區域開發史、經濟與人口結構變遷的角度出發，對日治時期東港

<sup>4</sup> 孫教授指出華瑋文已傳達情、欲本身就是一種焦慮的意念，而戲曲的創作則成了一種女作家在私領欲中痛苦與焦慮的抒發與補償。

<sup>5</sup> 前山教授文中指出，「母性」這個詞彙及其相關論述，是從瑞典教育家愛倫凱(Ellen Key, 1849-1926)而來。前山教授將其定義為「生物學上的生育及與其相關的事象、特質與期間」。

<sup>6</sup> 康豹教授即將加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擔任副研究員一職。

街（集中於東和、東隆、內關帝、鎮海四個社區）的社會結構與婚姻形態，做了初步的梳理與統計。他的研究發現，當時東港和南部其他漢人佔多數的地區一樣，大婚（嫁娶婚）的比率，較之小婚（童養媳婚）與入贅婚（招贅婚）的比率，是高得多；當地人普遍比較晚婚，其總生育率也比其他地區來得高些。他並指出，由於東港男性多須外出從事漁業、商業或工業，當地女性的工作能力遂有相當的社會價值，也因而延遲了她們的結婚年齡。由此可推斷，當地婚姻形態的發展，與社會結構與經濟條件息息相關。對於這三篇都涉及性別的家庭職責問題的文章，評論人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主任劉翠溶，以其研治臺灣史的深厚功力，對陳文與康文提出一些觀點與史料上的問題及建議，例如在探討或比較顏家女子與媳婦的婚後角色扮演時，可以從姻親家庭的面向觀察等。

第九場的討論主題是「性別與戰爭」。首先上場的是中研院近史所助研究員巫仁恕。他以明代永樂 18 年在山東發生，以唐賽兒這位女子為首的民變為例，說明世人對民變中婦女形象的看法、評價及其轉變，與這些發展所反映出的性別價值觀與政治立場。由於唐賽兒始終未被捕獲，因而提供當時及後世對這位奇女子各樣的敘述與想像空間。巫教授將有關唐賽兒形象的塑造來源，大致分為官方著述、士大夫評論，與民間野史筆記或小說三類，其多元的面貌，呈現出從「妖婦」到「女仙」的兩極化發展。該文藉由唐賽兒的例子，說明在傳統男性中心的文本中，女性地位的提升與扭轉，並非由內在理路的動力所驅使，反而較多是男性士大夫在面臨外在環境變化下的產物。而日本高知女子大學社會福祉學部教授沈潔，則在「侵略」與「反侵略」互動的大架構下，討論偽滿政權(1932-1945)統治地區的婦女參與社會活動的情形。她將婦女活動的發展區分為九一八事變、中日戰爭、與太平洋戰爭三個階段，從殖民統治、民族鬥爭、階級利益、婦女解放等多重視角，切入探究偽滿政權統治之下的中國與日本婦女的活動，表現出當地受到殖民統治深化的社會現象。與關內的婦女解放及抗日運動相較，偽滿統治地區的中國婦女組織及婦女社會活動的發展，則顯得更為複雜，也充滿曲折與艱辛。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羅久蓉，則由戰後漢奸審判的角度，處理戰爭與婦女的關係。她所探討的，是戰爭中婦女所處的生存空間問題：婦女的性別關係網絡，如何影響別人對她的印象或評論。該文以一位名為李青萍的女畫家的審判案例為主、張愛玲與蘇青的個案為輔，從李青萍如何被草率地按上漢奸罪名、接受司法以及社會輿論對

她遊走淪陷區的(藝術)行動的審判與評斷，申論戰爭與女性解放間的複雜與矛盾關係。該場評論人近史所研究員張瑞德，則側重於從理論與比較的觀點，來綜論三篇文章。他指出巫文的新文化史取向，不只注意故事本身，還兼及讀者們的反應；沈文則仔細分析了滿洲國的複雜情境；而羅文呈現的是知識分子的選擇性與多樣性。在理論層次上，他提出可由「女性東方主義」(female Orientalism)的角度出發，討論帝國主義與性別角色建構的關係，及其對性別意識塑造的影響。以被殖民等屬民階級的活動為例，他舉了 Louise Young 在 *Japan's Total Empire: 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1998)一書中所借用的「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這項概念，來說明爬梳被殖民女性的活動、組織與聲音之可能及其必要性。同時，他更提出所謂的「螃蟹理論」，說明當社會上有人想與眾不同時，往往會被其同類給制約住，侷限其發展的可能；唐賽兒的形象流傳，與李青萍所承受的社會及司法審判，都可謂置身不同歷史時空中、必須面對不同壓力的「螃蟹」。

最後一場的討論主題是「跨文化的婦女」。東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林美玫延續她對女傳教士在華活動的關懷，以美國聖功會在上海經營的聖瑪利亞女學(1881-1907)為例，討論女傳教士如何藉由宗教傳播，與中國婦女進行性別對話。該文採取中國與美國婦女史的雙重角度比較方式，從介紹 19 世紀初的美國婦女如何於第二次宗教大覺醒運動所激發的回歸基督教信仰中，尋求自身在家庭與社會中的新定位，並以教師一職為結合宗教與性別的主要職業；進而說明來華的女傳教士以「教會女學」為美國婦女為中國婦女所營造的跨文化之婦女宗教網絡，其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層次，是遠超出女子教育一環的。亞歷桑那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鮑家麟，則以豐富的口述歷史資料，介紹了四位美國亞利桑那州南部的中國傑出女性的生平。這四位華裔權威女家長，均為當地公認的社區領袖，並深受中外人士所敬重。鮑教授認為這些女性的故事，說明了一部分在美華裔婦女充分利用新大陸婦女們所能享有的自由，來謀求自我的充實與實現，並發揮一己才幹。最後一篇論文，由中央大學英美文學系副教授周慧玲充滿想像與吸引力的標題「投射好萊塢、想像熱女郎」展開。該文為周教授即將出版的著作之一部分，主要從「文化交涉」(interculturalism)的概念出發<sup>7</sup>，將 1930

<sup>7</sup> 在該文中，interculturalism 被譯為「文化交涉」、「文化互滲」與「文化間際」。

年代的中國觀眾及電影人，視為好萊塢電影及其文化的廣義「觀眾」，以分析他們如何反應或挪用好萊塢模式，以審視中、美電影的文化交涉及其特質。周教授透過比較 1930 年代好萊塢對幾位代表性女明星的行銷包裝策略，與當時部分中國女演員的表演方法，探究電影女明星作為一個文化演員，如何體現特定的女性意識形態，並參與建構文化的集體意識。該文的研究指出，跨文化間的交流與交涉，不僅指涉某一領域的概念、主張、手段、策略，如何因社會文化場景的移轉而被賦予不同的意義，還包括在同一社會文化場景中不同領域的概念與主張等，彼此的衝擊與流動。因此，好萊塢的表演策略挪移到中國，一方面與傳統的語言結合，另一方面又成為現代性想像的投射，並從電影這個領域擴散成為文學、美學、表演學、社會學領域的跨文化互涉。評論人中研院歐美所副研究員趙綺娜，指出以上三文處理的都是美國文化與社會如何影響華人社會與文化，與後者如何反應，進而有所創造的課題。她肯定林文首次援用美國聖功會的「中國差傳檔案」與教務雜誌《差傳精神》等寶貴史料，不過，她對女傳教士在華創辦的女子教育於提升女權所發揮的作用，持保留態度。至於鮑文特別集中介紹美國西南地區的傑出婦女，評論人認為此文突破以往侷限於東西兩岸的都會地區研究，有其貢獻；她同時建議應更細膩地爬梳華裔婦女在美國所普遍承受的三種壓迫形式（即白人、男性與資本家），以更清楚地瞭解她們在異國所能享有的新自由，及可能遭受的不公平對待。對於周文的題材與生動的論述，評論人予以相當正面的評價，也提出一些建議以供作者參考，如對於跨文化的交涉，應將中國這部分的接受與變動做更清楚的敘述。

### 三、綜合討論

繼上述十場論文的發表後，壓軸的綜合討論，於焉上場。擔任引言人的共有五位學者，分別為兼任主持者的近史所研究員熊秉真，及曼素恩、Gail Hershatter、Dorothy Ko 與林維紅教授。她們各自從自身最關注的角度出發，對婦女史與性別史研究的歷來發展及階段性演變，提出一己見解，以及從實際治學經驗所得的諸多省思。

首先發言的是 Dorothy Ko 教授。她精要概論了「婦女史的歷史」，並從方法論的演進上，歸納出婦女史研究的三大階段：一為將婦女史等同



於婦女生活史／地位史／從屬史，二為將婦女史等同於婦女解放史，三為將婦女史等同於社會性別史。她指出，性別史與晚近文化史研究的興起有關，把史料視為開放性的文本，強調對史料的「解讀」並發掘各類論述的侷限，以提供更細膩的歷史詮釋。她認為婦女史的終極目標，即不斷地顛覆、進而超越既有的研究成果，並藉由開拓非文字的史料，以擴展婦女史的視野與認識層面。繼而發言的林維紅教授，則以其於臺大婦女研究室的多年經驗，現身說法談論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交流對婦女史的啓發及可能產生的限制。她表示，跨學科的研究可提供婦女史以新的分析範疇與豐富的辭彙；她期許跨學科研究的發展，能有助於歷史學與理論的有機結合，以重新建構歷史的整個版圖。與此同時，在史學研究方面，能運用歷史語言與歷史思考方式來提問，深入闡析，進而展現各種歷史中的複雜機制，使歷史學不只是在史料上的發現有所貢獻，更能提供精彩的、發人省思的解釋與分析。

Susan Mann 教授的發言，指出此次會議的主旨，在於研究如何打破 20 世紀與過去的那道歷史分界線；又，在研究中國時，如何能夠甩掉西方(get rid of the west)及以西方為基準的現代化論述？換言之，即如何掙脫現代性論述對歷史研究所造成的功能性與目的性的限制，並使中國史研究不再受西方理論所主導。她表示，中國是唯一自古便有「中國婦女」、亦即「女」此一辭彙並有各類論述的國家；而傳統中國的「男」與「女」始終是互補與相關的(complementary and related)二元概念與存在。對明清知識婦女的長期與深入研究，使她發覺中國婦女所具有的驚人的內在創造力(inner creativity)；她並以此次會議為例，指出其中有許多文章已展現研究觀點上的突破，與資料上的活用。

接著發言的 Gail Hershatter 教授，則從三大面向發表其對此次會議的感想：一為放棄對進步史觀的執守，二為朝（以往視為的）邊緣性課題發展，三為展開跨（文化、學科、內外、公私）對話(cross-talk)。她建議不要再以「悲劇性地受挫的議題與無出路」(tragically interrupted agendas and dead ends)的心態或敘述方式，來形容 20 世紀以來中國婦女史與性別史的發展，而應反問為何某些課題或辭彙，諸如革命，能如此佔據乃至於主導婦女史的論述走向。與其像五四以降的文化激進主義一樣，將許多具有保守主義成份的論調或行徑打上「封建遺弊」的惡名並棄之如敝屣，還不如用心發掘並仔細審視被五四史觀與進步模式所忽略的其他發展與論述，以

使近代中國的歷史圖像，及婦女在其中的位置，能有更完整的呈現，乃至重塑。Hershatter 教授同時指出，此次會議有許多論文成功地將關注點投向以往屬於邊緣性的課題與時段，包括加入日本或泛亞洲思維的跨文化交流、被殖民地區的家族與奴役制、偽滿地區的婦女活動、戰時淪陷區的女性活動空間、女傳教士所創辦的教會女校、1950 年代的中國與性別等。對於所謂的國族敘事(national narratives)及其與私領域的互動，她認為國族敘事恰恰只有當其為人民的日常生活所接受、實踐，並被納入日常例行活動時，才有其力量與效能；亦即，當女性對於自身、性別與世界的觀點改變後，國家才能成為對她們有意義的重要關懷，而這正是因為國族敘事展現了一個更健康、更快樂且更具吸引力的生活，在公、私領域皆然。至於如何在不斷游移的公／私與內／外範疇中，透過口述歷史、審判案例等史料的開發，為不同歷史時空的女性之主體位置加以定位，將是今後學者可再繼續努力研究的問題。

最後做總結的熊秉真教授，則描繪了一個歷史研究的新願景：即藉由明清與近現代歷史景況與史學知識的互動、滲透，能從以往「補遺式」的婦女史，發展為「改變圖像」的婦女史。<sup>8</sup>因為，眾聲喧嘩後的混聲合唱，可能要說的，將是另外一個不同於前的歷史故事。

#### 四、結語

這次「近代中國的婦女、國家與社會(1600-1950)」國際學術研討會，由持續三天的高出席率及參與討論的熱烈程度，足徵其已成功地達到跨文化、跨學科、跨性別的學術交流。在最後的綜合討論裡，多位學者表示參加此次會議，受益良多；各類課題的探討，與多種資料的援用及觀點的提出，都對會眾多所啟發。來自上海社科院的羅蘇文，表示這次會議文章共同關注了女性的被表述與自我表述的問題，她並建議今後的婦女史研究，可多注意地域等差異性因素，並進而討論性別倫理、性別教育與性別空間等課題。葉文心教授也認為，空間建構的重新調配，可能是婦女史議題開

<sup>8</sup> 因為僅僅是制式地從過去史料對婦女的書寫來「補上」婦女的位置或活動，是遠遠不足以呈現過去婦女真正的發展與生活情況，因為多數時候，她們是被迫噤聲的。然而，誠如熊教授所言，「靜默其實是一種有力的聲音」(silence is a powerful voice)，惟有跳出以往男性中心的敘事模式，才能看到並認識文字記述外的女性存在。

展的新方向。熊秉真教授則在婦女研究之外，進而提出男性研究的問題及其必要性。由此可知，婦女史的研究範圍及其關懷，應不僅只限於婦女自身，而是她們在歷史中與所有人、事、物的互動與交流。這其中牽涉的，包括研究者本身的立場與態度，以及研究對象可能有的諸多問題。誠如 Dorothy Ko 教授所言，有關婦女或性別的問題，所涵蓋的文化與社會意義相當複雜而廣泛，相信這也是歷史迷人並吸引學者繼續從事研究之處。

### 附錄：會議論文發表人、論文名稱、主持兼評論人

專題演講 葉文心：歷史圈套與文化困境——談「中國婦女」

第一場 Susan Mann：Womanly Sentiments and Political Crises: Chang Ch'ieh-ying's Poetic Views of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呂芳上：革命與戀愛：一九二〇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情愛難局

張玉法：二十世紀前半期中國婦女參政權的演變

主持人兼評論人：汪榮祖

第二場 林麗月：風俗與罪愆：明代的溺女記述及其文化意涵

呂妙芬：婦女與明代理學的性命追求

張哲嘉：明清星命書中的女命

主持人兼評論人：梁其姿

第三場 定宜莊：從婚書契約看清代的婦女再嫁問題

劉錚雲：從夫妻失和看清代婚姻關係中的兩性認知——以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乾隆朝案件為例

賴惠敏：清旗人的家庭糾紛(1644-1770)

梁惠錦：婦女與婚姻自由權(1920-1930)

主持人兼評論人：陳蕙馨

第四場 葉漢明：Chinese Society, Colonial State: The Protection of Women in Early Colonial Hong Kong

Gail Hershatter：Making the Visible Invisible: The Fate of "The Private" in Revolutionary China

王政：社會性別與 50 年代上海城市社會的重新組織——居民委員會的故事

主持人兼評論人：翟志成

第五場 羅蘇文：清末上海都市女裝的演變(1880-1910)——以《點石齋畫報》、《圖畫日報》為例

游鑑明：美人變種？近代中國有關女子健美的言論（1920年代-1940年代）

Antonia Finnane：The Art of Fashion in 1950s China: Aesthetics, Politics, and Self in the Work of Yu Feng

主持人兼評論人：Dorothy Ko

第六場 林維紅：面對西方文化的中國新女性——從《曾紀澤日記》看曾氏婦女在歐洲

Paul Bailey：‘Unharnessed Fillies’: Discourse on the ‘Modern’ Female Student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Joan Judge：New Lin Daiyus: Female Overseas Students in Japan in the Early 20<sup>th</sup> Century

主持人兼評論人：沈松僑

第七場 蔡瑜：晚明女性詩評與傳統詩學的對話關係——以《名媛詩歸》為例的探討

華瑋：無聲之聲：論明清婦女戲曲中之情、欲書寫

Ellen Widmer：Honglou men ying and Three Novels by Women of the Late Qing

胡曉真：閨情、革命與市場：由民初彈詞小說家姜映清談起

主持人兼評論人：孫康宜

第八場 陳慈玉：婚姻與家族勢力：日治時期基隆顏家的婚姻圈

前山加奈子：近現代中國における母性主義（試論）——「私」から「公」へ——

Paul Katz：Social Structure and Marriage Patterns in East Haven Private: A Preliminary Analysis

主持人兼評論人：劉翠溶

第九場 巫仁恕：「妖婦」乎？「女仙」乎？——論明代山東唐賽兒的形象轉變

沈潔：偽滿統治時期婦女參與社會活動的背景以及特徵

羅久蓉：戰爭與婦女：從戰後漢奸審判看兩性關係

主持人兼評論人：張瑞德

第十場 林美玫：美國聖公會女傳教士在華的活動：以上海聖瑪利亞女學  
(1881-1907)的發展為例

鮑家麟：Chinese American Matriarchs in American Southwest

周慧玲：投射好萊塢、想像熱女郎：1930 年代好萊塢與中國電  
影中「女明星論述」的跨文化交涉

主持人兼評論人：趙綺娜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85)

北一輝的革命情結：在中日兩國從事革命的歷程

黃自進著

350 頁 精裝 350 元 平裝 300 元

北一輝是戰前法西斯主義的理論導師，同時，早年他又曾投身中國革命運動，是中國革命秘密組織「同盟會」的正式成員。探討他這一段曾奔走中日兩國革命運動的離奇生涯，是本書的宗旨。全書共分三章，第一章以他生涯中的三大著作——《國體論與純正社會主義》、《支那革命外史》、《日本改造法案大綱》——為討論重點，觀察其思想演變。二、三兩章分別論述他投身中國革命的歷程、及其對中國革命認知上的發展。最後論及他轉而倡導日本革命的心路歷程、影響日本法西斯主義走向的來龍去脈。



學術演講

## 「秩序問題」與明清江南社會\*

岸本美緒\*\*

大家好，承蒙近代史研究所各位老師們的關照，有機會和各位教授們見面、請教，我感到非常高興與榮幸。我第一次拜訪近史所是 1989 年，當時我參加由臺灣大學所召開的「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討論會。之後在近史所作報告，由曹永和教授替我翻譯。直到現在，還記得當時我的報告非常粗淺，心理十分不安，但卻得到教授們熱烈的回應，提供了許多寶貴意見，內心相當感動。這次是我睽隔十二年之後，再度有機會在此報告。今天報告的內容和 89 年時差不多，很遺憾沒有時間好好準備。但我心裏比 89 年時輕鬆許多，因為我已經認識了很多熟悉的朋友們。藉此報告的機會，還請各位教授直率的批評指教，謝謝。

今天我所要報告的題目是：「秩序問題」與明清江南社會。我在 1999 年 12 月出版了一本書《明清交替與江南社會》，這本書的序言承蒙熊秉真教授與各位老師的幫助，由何淑宜小姐翻譯成中文發表在《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30 期，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今天的報告是對上述序言的補充，因為這篇序言與一般的序言不同，與其說是條理清楚的方法論，不如說是對我個人未能明白陳述之想法的表白，看過那篇文章的教授們相信也有同樣的感覺吧。今天我想講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關於「秩序問題」。該書的副標題是「17 世紀中國的秩序問題」。那麼，「秩序問題」到底是什麼？第二個問題是關於 17 世紀。為什麼是 17 世紀？第三部分，希望談談出版此書之後我的新研究方向。如果時間許可的話，我想簡單說明這三個問題。

首先，關於什麼是「秩序問題」？秩序問題對社會科學家來說，是一

---

\* 本文為民國 90 年 5 月 25 日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表的演講稿。

\*\* 日本東京大學東洋史學部教授

個相當古老的問題。人都是自私自利的，既然如此，爲什麼有可能建設共同的社會？換言之，社會秩序爲什麼是可能的？這個問題是從 17 世紀的霍布斯(Hobbes, Thomas)以迄 20 世紀的帕森斯(Parsons, Talcott)乃至盧曼(Luhmann, Niklas)等人的理論中，一脈相承的老問題。但就歷史學家來說，這樣的問題意識卻是繁複多變的。比方說，我進大學的 1970 年代初期，馬克思主義史學在日本歷史學界相當強而有力。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嚴厲的批評美國學界的近代化理論，但我認爲兩者的歷史觀其實有共同的特點，就是認爲歷史有一定的方向，透過一定的程序而發展。他們對於明清社會的形象(image)，傾向於強調專制制度和共同體不自由等方面。因此，歷史發展的課題，便應該是如何打倒舊秩序、追求自由這個問題；這也就是美國有名的思想史學者狄百瑞(Theodore de Bary)所說的“liberationist ideology”(從舊秩序到解放)這樣的觀點。

但日本學界對前近代中國社會的看法，並不侷限於上述之 liberationist 的觀點，實際上對前近代中國社會的自由度，有著各式各樣的看法。我在〈市民社會論與中國〉一文中，便根據過往學者們對中國社會中介團體結合的強弱程度，和他們將這種結合程度之強弱視爲正面或負面因素爲座標，試著將學者們的觀點區分爲四種類型。第一種看法認爲中國前近代社會是自由先進的社會。比如水林彪教授（位於函數座標的象限 IV），便是一位典型的代表。他是東京都立大學法學系教授，研究日本的法律史。他在著作中寫道：

宋代以來，科舉制度在中國得到全面的普及，這意味著以統治作爲家族世襲職業的貴族不復存在，同時也意味著以農業、商業和手工業等職業作爲不可改變的世襲身分這種制度的不存在。中國在此階段已經不是身分制的國家，或者在國家之下已沒有一個身分制的社會。在那裡，無論職業還是財產，都不再屬於家族，而屬於個人。個人聚集起來形成家族和宗族，並進而構成社會，在此之上則聳立著官僚制的國家。在殷周時期，似乎存在過類似於日本江戶時代幕藩制那樣的身分制的社會和國家。但是，這種舊秩序在春秋戰國的動亂時期已經開始瓦解，通過從秦漢帝國到宋代的一千多年歷史過程中，中國脫離了身分制，並形成了其獨特的個人主義式社會和國家。這個脫離身分制的歷史過程比我國〔日本〕提早了一千年左右。

水林先生注意到中國社會非身分制的性質，並以此作為中國社會具有歷史先進性的標誌。這種對中國社會又自由又先進的看法，並非水林先生所獨具，許多抱持宋代以後中國近世論的日本學者，對此也有相同的觀點。

另一方面，日本學界也有完全相反的見解。他們同意中國社會是較偏向個人主義的非身分制的社會，然而，正是這樣的性質，對中國的近代化構成重大的障礙。如東京大學法學系教授戒能通孝（位於函數座標的象限Ⅲ），在 1943 年根據河北農村調查，提出了「因為中國社會不存在共同體，所以不具備實現近代化的可能性。」這樣的看法，帶給當時研究中國的日本學者很大的衝擊。戒能先生認為：

在中國農村，作為慣習的土地所有權，非常近似於西洋近代所謂的無限制個人所有權。在西洋或日本前近代社會中很容易發現的家族或者宗族習慣法嚴格限制個人土地所有權的現象，在中國似乎並不存在。儘管中國的土地所有權表面上與近代西洋非常相似，但實際上卻恰恰缺少近代所有權最基本的內在要素。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沒有能夠形成一種由相互認同的結合意識所支撐的規範秩序。近代西洋所有權的發展背景，有西洋社會的特點：就是在近代西洋，國與國結合，市民社會的秩序萌芽於能夠對抗封建領主制所建立的農村共同體。也就是說，從封建時代的農村共同體非常堅固的秩序中，發展出這樣新的近代的秩序。所以沒有這樣的秩序意識的話，人的自由是如散沙般沒有共同意識的秩序，人們都是自私自利，沒有可能建立共同的秩序。

戒能先生承認中國社會是較自由的、個人主義的社會，但是正因如此，較少可能發展出近代式的秩序。我認為戒能先生的看法與梁啟超、孫中山先生等清末民初的改革論者對中國的看法，有一些共同之處。他們都認為中國的問題並非是沒有自由的問題，而是自由太多的問題。在過份自由的社會中，人們不得不透過私人的結合而形成人倫式的秩序。這樣的看法也是日本幾位學者的共同觀點。比如，1940 年代研究中國社會論的柏祐賢、村松祐次等人都注意到這個問題。

戒能先生認為中國缺乏在規範意識方面上支持共同體的凝聚力，從而導致他對中國近代化前景的悲觀看法。但同時，在日本也有學者高度評價中國透過行會的自治傳統，並從中看到建設共和制國家的可能性。這種看法的代表學者，以京都大學的內藤湖南（位於函數座標的象限Ⅰ）最為有



名。他在 1914 年發表了《支那論》一書，於序言中指出：

在中國，最有生命力和體系性的團體就是鄉黨宗族，而這種團體的代表者則是父老。中國從隋唐以來就存在著人民的自治，官吏不介入自治的範圍，僅僅在文書上執行統治人民的職務。地方上人民不再認為自己應該受到官府保護。對人民來說，民政上需要的一切事務如救貧事業、育嬰、教育等，都由地方上的自治團體承擔。這樣，鄉團自治對於中國人民的生活來說，成為最重要的大事。

依據內藤湖南的看法，中國有很強韌的社會集團。與戒能通孝的看法不同，內藤湖南等人認為中國的社會集團很強，也對這樣的社會集團強韌性作了正面的評價。

還有一種看法與內藤湖南同樣承認社會集團的強韌性，但卻對這種強韌性抱持負面的態度。這樣的看法與馬克思主義史學很相近，比如有名的法律史學者仁井田陞（位於函數座標的象限Ⅱ）的「封建共同理論」就有這樣的傾向。他認為這樣的集團是對中國近代化的障礙，惟有先打倒這種集團，才有可能建立近代社會。

象限Ⅰ的學者認為中國社會的民間團體很強，而象限Ⅲ的學者認為中國社會很自由。不過，這兩個類型對歷史發展基本方向的看法，卻有共同之處。他們都認為建立秩序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所以從自由到秩序，就是他們心中認為歷史發展應有的方向。同樣的，Ⅱ與Ⅳ的學者雖然對中國社會的看法有所不同：Ⅱ認為中國社會集團很強，而Ⅳ認為中國是個人主義的社會；但Ⅱ、Ⅳ兩派學者卻都認為從壓迫個人的秩序中解放，乃是歷史發展的基本動向。

我覺得這些不同類型的看法，並不是孰是孰非的問題，不過，我一直比較偏向Ⅰ、Ⅲ這兩種類型。個中理由一部分基於我個人的喜好，如我在序言中所言，我年輕的時候就有這樣的傾向。另一個理由是：Ⅰ、Ⅲ類型的觀點，和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看法比較相近。我以前讀過張德勝（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所著的《儒家倫理與秩序情結》一書，他認為儒教思想千門萬戶，歸根究柢，都是為了追求秩序這一問題而展開。諸子百家的思想都是在春秋戰國時代的「失範狀態」(anomie)中產生。「失範狀態」給予中國的影響很深，一如佛洛伊德所說的「創傷」(trauma)，中國的 trauma 就是害怕「失範狀態」，這是春秋戰國時代中國所受到的 trauma。

之後二千多年，中國人的思考中一直有很深的秩序情結，他們對秩序和動亂這個問題極度敏感。儒家思想的基本命題便是如何建立秩序，這和霍布斯的社會秩序為什麼是可能的這個問題有共通之處。不過，儒家把「如何建立秩序？」當作規範性的問題(normative question)，並認為秩序問題是中國人思想中最基本的問題。相反的，霍布斯的「社會秩序為什麼是可能的？」卻是一個智性的、社會科學的問題(intellectual question)。我閱讀此書時覺得很感興趣，我想他的看法有正確的地方。雖然我無法回答「秩序是什麼？」，但至少我可以說，社會秩序並不是自然存在的事物，而是很困難的、不可思議的人為事功。秩序問題是人類共通的問題。我覺得中國社會的歷史，比日本的歷史乃至於西洋的歷史，更明顯的突顯出秩序問題的複雜性與不可思議性。我在拙著序言中提出了幾個方法上的問題，比如說，我們考察中國社會的時候，是否應該以不安的、孤獨的個人為基礎，從個人的角度來研究社會秩序？社會現實不外乎人們的共同感受，也就是社會情緒，因此，從事社會史研究，其實也就是對思想史的探討。還有，「自己組織性」這樣的問題，也與我對秩序的看法有一點關係。

第二個問題：「為什麼是 17 世紀？」這裡所說的 17 世紀，與其說是 1600 年到 1700 年這一百年間，不如說意指 1570 年代到 1680 年代（萬曆初期至康熙中期）的一百多年，也就是從明朝開放海禁、中國進入世界經濟網絡的 1570 年代開始，以迄清朝政府佔領臺灣、解除海禁的 1680 年代。很有意思的是，霍布斯也是 17 世紀的人，這是偶然的巧合，還是有一些內在的聯繫性呢？霍布斯自稱為恐怖的兒子，可以說他的思想與 17 世紀的時代背景有密切的關係。霍布斯覺得社會是非常不安定的、很可怕的东西；那麼，17 世紀中國和西洋的時代情況，有沒有共同的特點呢？我想，的確有共通的地方。有一位美國學者 J. Fletcher（中南亞細亞專家）寫了一篇論文“Integrative History: Parallels and Interconnections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所探討的問題，是 16 至 18 世紀中南亞細亞、歐洲、美洲等地區間環球性的統合歷史(integrative history)是否存在？他認為各個地區雖有各自的特點，但是，從非常宏觀的角度來看，當時的世界確有幾點共同的潮流，比如人口的增加、社會變遷與流動的加速、地方經濟性城市的成長、城市與商業階層的勃興、宗教組織與傳教活動的蓬勃、農村的騷亂、游牧民族的衰落等等潮流。他尚未對這些共同潮流所以出現的原因，做出明確的回答。不過，我認為，白銀流通的問題當然很重要，但是

白銀流通對各個地域的影響並不相同。以下簡單說明我對 17 世紀中國社會的基本認識。這個問題，也與巫仁恕教授所提出的問題密切相關。巫仁恕先生曾為拙著寫了一篇很好的書評，發表在《新史學》11 卷 3 號。這篇書評中提到了一些問題，他說：

社會秩序解體的情形，在中國歷史上，尤其是朝代交替時期，都常出現這類現象，當時人們都應該會有類似不安的感覺。同樣地，血緣結合的宗族組織與擬制血緣的盟、會這類集團，在明末以前皆已出現。那為何是在明末而不是別的時代，這種流動的社會與人們的不安感會使人們走向宗族與擬制血緣集團？再者，作者流動社會論的前提，建立在明中期以前是農村共同體下的社會秩序，在明中期以後這樣的社會秩序瓦解或遲緩。這種說法或許是日本學界既有研究的結論，但在本書中卻未說明這樣的論述是基於何人的研究上，筆者覺得應有所交代。

日本也有幾位學者在對拙著的書評中提到同樣的問題。為什麼是明末？為什麼是 17 世紀？許多大陸學者認為這段時期是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時期。的確，外國白銀的流入促進了貨幣經濟的發展；但值得注意的是，以活躍的貨幣經濟和蓬勃的城市社會為特色的這個時代，從另一方面來看，又是經濟蕭條、農村窮困的時代。我認為明末時期，既有光明的一面又有黑暗的一面，總之是一個明暗對照極為明顯的時代。大家都知道，「北虜南倭」是 16 世紀明朝統治者所面臨最頭疼的問題。我認為，北虜和南倭這兩個問題是以白銀流通為中介，而互相密切聯繫著。為了對抗蒙古，大量軍隊流向北方邊疆，明朝政府為支應糧餉，不得不向全國人民徵收稅糧。當時的政府如強力抽水機般從全國抽取白銀，並把數量龐大的白銀運往北方邊疆，因此全國的農村呈現白銀不足的現象，中國社會對白銀的需求越來越強烈。另一方面，美洲或日本的白銀生產越來越豐富，恰如水之就下，白銀從國外大量流入中國，成為難以遏止的自然趨勢。即使是倭寇的糶糧，也並不會因為海禁政策而無法進行。然而，1567 年明朝解除海禁之後，白銀不足問題卻無法馬上解決，究竟白銀到何處去了呢？當時人曾指出，一部分白銀流入到蒙古地方，但一定也有其他部分流入官僚、軍人、商人的私囊，輾轉回流到內地。明末官僚、商人們的財富，實際上是令人矚目的。他們累積的私人財富遠超過急速擴大的國家財政，其所居住的城市就像孤立的繁榮海島，與窮困的廣大農村構成了鮮明的對比。所以

我認爲，繁榮的城市和窮困的農村明顯的明暗對照，就是明末時期的特色。這樣的情況導致了如下幾個問題。其一是：隨著白銀的國際性流通，商品的流通量也大爲增加；除了自然災害，市場的波動也巨大地影響到人民生活，以致大量貧窮農民被迫流入繁榮城市。這些現象如禮教制度的崩壞、徭役制度的動搖或農村經濟的貧窮化等，一直是日本的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者所注目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流動性與一般動亂時期的流動性不同，並非短期的不正常狀態，而是比較長期的、日常的流動性。同時，這也是個慾望的時代。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讓官僚、商人們致富，「慾望問題」同時也成爲當時知識分子所討論的重要問題。人總是自私自利的，既然如此，如何才能夠建立共同的社會呢？這種不安感，與其說是單純的不安，不如說是一種哲學性的不安。人的本性是什麼？究竟是自私自利的，還是本性中有自然的共同性？這也成爲知識分子所關心的問題。再者，當時很多知識分子喜歡談論風俗的良窳，風俗漸漸惡化是當時相當流行的常態說法。關於風俗問題，日本學者森正夫寫過幾篇論文，介紹明末地方志中的風俗論內容。我認爲，當時知識分子所以流行這樣的評論，有其經濟性的背景。他們的評論，背後有城市文化的繁榮；而城市出版文化的興隆，也支撐著他們的評論。秩序問題當然與現實社會的動盪狀態有關，另一方面，也可說是人們對這種社會情況的回應。我認爲，如果沒有 *intellectual response* 的話，「秩序問題」就無法形成。明末的社會，一方面社會動亂，人的流動性增大，形成人的慾望和共同性的矛盾；另一方面城市文化發展，知識分子有錢有閒來討論這個問題，所以當時的「秩序問題」可以成爲流行的哲學性思想問題。我認爲，17 世紀「秩序問題」的背景並不只是單純的動亂，而是明暗對照明顯的明末清初特有的社會情況。

第三個問題，是我以後想研究的方向，這大概有三個方向。第一是 18 世紀的中國與世界。這也是去年八月在挪威奧斯陸召開的「第十七屆國際歷史學圓桌會議」所標出的題目。那次會議的主持人是大陸人民大學的戴逸教授。他認爲，18 世紀是世界歷史分水嶺的關鍵時代。自 18 世紀以後中國逐漸落後，相反地，西方急遽發展。對這樣的問題，最近有很多學者寫了相關論述。我在那次會議中所報告的內容，並非關注於中國落後、西方發展這樣的問題，而是強調 18 世紀時，中國、日本、法國各國所面臨的一項共同問題，即：經過 16、17 世紀的動亂之後，如何重建秩

序的問題。比方說，16世紀是民族與宗教流動性很大的世紀。民族的交流增加，宗教的對立嚴重，怎麼樣解決民族、宗教的混亂，統合新的國家？在市場和財政的問題上，面對著16世紀以後商業的發展和國際市場的興隆，如何因應市場發展，鞏固國家財政？此外，還有體制的問題：新建立的國家應該採行中央集權，還是讓中介團體的力量較強？我想，這些都是中國、日本與法國等幾個歐洲國家所共同面臨的問題，而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也是各式各樣的。比如說，日本在17世紀以後成為相對封閉的國家，對自由的市場經濟有較嚴厲的限制。如水林先生所說的，日本建立了比較穩固的身分制度。這樣的辦法與清代中國的辦法並不相同，所以18世紀是面臨共同問題的各個國家做出不同回答的時代。此後，我想詳細的比較各個國家對於新舊秩序的興革。

再者，是民事法秩序的問題。這個問題現在成為日本、美國、中國等地學者所共同關心的問題。1996年，由美國的黃宗智教授主持，在日本的鎌倉所舉辦的「後期帝制中國的法律、社會、文化——日美研究者的對話」會議中，雙方學者相互交流，提出了直率的意見。會議中雙方有一些分歧的看法。比如日本有名的法律史學者滋賀秀三先生認為清代的民事審判依據的不是法，而是情理。但美國黃宗智教授出版的書卻強調，清代民事審判也是依據法律審判的。此外大陸學者王亞新、梁治平翻譯了滋賀秀三、寺田浩明、夫馬進和我等四位日本學者的論文，編成了《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一書，並對我們的文章作了深入的評論。透過這樣的會議，日本學者和外國學者間的對話漸漸發展起來，雖有意見分歧之處，但對彼此的研究工作想必可以帶來助益。我也對此問題很感興趣，過去也寫了幾篇相關的論文，一篇是關於土地買賣中找價回贖的問題，還有一篇是討論賣妻典妻的問題，也就是去年在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學術會議中所提出的〈賣妻可否？〉一文。對找價回贖及賣妻典妻這樣的問題，明清時期的審判官態度為何？從這樣的角度出發，我們可以深入觀察當時人對這類問題的思考理路。

第三、關於身分感覺的問題。日本學界對身分制有很長的研究歷史，不僅是從法律的、完整制度的角度，更是透過當時人的共同感受以及感覺微妙變化的角度來研究身分的問題。換言之，這是風俗變化的問題。風俗的變化是非常不可思議的，沒有人能肯定回答風俗為什麼變化？但是實際上，風俗確實變化了。這和我前面所說，社會秩序具有非常不可思議的性

質，有點共同的地方。總結來說，以後我想研究的方向不是從硬性的制度，而是從模糊的、日常的常識、實踐(practice)的角度，來研究「秩序」此一不可思議的問題。

(朱慶薇紀錄整理)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46)

#### 胡炎漢回憶錄

胡炎漢著

311 頁

平裝 250 元

胡炎漢先生(1924-)江西省修水縣人。作者生逢當年內戰頻仍與八年抗日戰爭之亂世，其求學過程係在顛沛流離與半饑餓狀態下完成，但亦因而養成堅忍不拔、樂觀進取之性格，勇於面對逆境。民國三十七年(1948)作者自江西南昌國立中正大學森林系畢業，經校方推薦進入臺灣省林產管理局(現稱「林務局」)服務，前後十數年，對臺灣林業經營具有深切體驗，經常發表有關臺灣林業興革建言。民國五十三年(1964)作者以林業專家身分應聘赴馬來西亞任職，翌年約滿返臺，受邀轉入行政院退輔會森林開發處任職技師兼廠長，並先後奉派赴美、加、日、澳、紐、馬與印尼諸國考察林業。民國六十一年(1972)作者因受正大校友「涉嫌匪諜」乙案之牽連而下獄，但其在獄中一面潛心鑽研學問，一面刻苦鍛鍊身體，從未虛度時光。民國六十七年(1978)刑滿出獄，時臺灣尚處戒嚴，致具有「特殊身分」的作者，求職無門，只有隱名從事筆耕以維一家生計，並策勵子女奮發上進(如今，其兩位公子分別在美國矽谷科技界與國內營造工程界卓有成就)。作者十數年來已出版譯、著作十二冊，雖年近八旬，仍為國內報刊撰寫專欄，未嘗中輟。



## 劉崇鉉教授傳(1897-1990)\*

蘇雲峰\*\*

劉崇鉉教授，字壽民，生於 1897 年 8 月 7 日，出身福建閩侯望族，聰明幸運，學業順暢，清華八年，留美五載，執教國內著名學府，認真教學，培育人才，為人處世，溫良敦厚，淡泊名利，晚年毀棄個人書信、資料和文稿，回歸空寂，亦士林一絕。

崇鉉遠祖原居河北省之薊北，祖先劉彬於明成祖永樂年間(1403-1424)，因軍功分鎮閩中，世襲福州右衛指揮使，從此落戶福州。祖父劉齊銜(1815-1878)為清道光辛丑科(1841)進士，官至河南布政使，署理巡撫，為清兩廣總督林則徐(1785-1850，福建侯官人)之快婿。父劉學怡，光緒 14 年(1888)舉人，江蘇婁縣知縣，繼室是湖廣總督張之洞(1873-1909)的姪女。張夫人生子崇鉉、崇樂、崇辰及女崇瑜。<sup>1</sup>崇鉉娶兩江總督沈葆楨(1820-1879，福建侯官人)之孫女沈鍾應(父沈瑜慶，1858-1918，舉人出身，官至貴州巡撫)，劉家媳婦，可謂代出名門閨秀。劉家因此也成為清季具有維新思想的家庭。學怡於戊戌政變前後，響應張之洞在兩湖推行的不纏足運動，<sup>2</sup>其仲兄學恂亦在福州倡導天足，故劉家女子此後皆不纏

\* 承邀撰寫本傳之初，並無十分把握，現在能順利完成，且獲得何炳棣院士和李又寧教授之嘉許，首先應感謝劉廣定教授之鼓勵和協助，其次要感謝何炳棣院士、李又寧、王曾才、張元、劉景輝、孫同勛、張存武、張朋園、張秀蓉、陶英惠、林滿紅諸位教授之指正和補充，和清大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呂小燕之協助。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sup>1</sup> 據劉廣定 7 月 8 日抄來福州劉氏族譜資料，學怡原配陳夫人，生子崇澍、女崇洪，陳夫人卒於光緒 14 年。繼室張夫人為張之洞兄張之淵之女，卒於 1904 年。此外，學怡尚有側室田氏，生一女名崇嶼。劉崇瑜嫁楊石先，楊氏曾任南開大學化學系主任、校長。據胡瑛，《張之襄公年譜》(北京：天華印書館，民國 28 年)，卷 2，頁 4，張之淵是張之洞同父異母之三兄，曾署湖北安襄鄖兵備道，因領造船事居揚州，1882 年歿於任所。

<sup>2</sup> 張之洞於 1897 年寫〈不纏足會教〉一文，並於兩湖推行不纏足運動，及經濟政治教育等改革，

足。劉崇鉉同父異母長兄崇澍和堂兄崇佑、崇傑、崇倫，均留學日本。崇佑(1877-1941)光緒甲午(1894)舉人，清季任福建省諮議局副議長，與林長民等參加三次國會請願運動，武昌起義後，自上海趕返福州，領導諮議局組織新政府，宣佈獨立。民初任國會眾議院議員，隸進步黨，與梁啟超等合辦《北京晨報》。又為福建法政學堂創辦人，在北平、天津、上海等地執律師業二十餘年，號稱民國第一律師。五四時期，為北大及南開學生愛國事件義務辯護；也是民國 26 年「七君子」事件律師團的首席律師，純為社會公義，不收分文。<sup>3</sup>崇傑(1881-1957)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曾任福建法政學堂監督、駐日使館參贊一等秘書、代理駐日公使、外交部參事、次長、駐西班牙、葡萄牙公使、駐德公使及大使等職。<sup>4</sup>堂兄崇勤(學怡弟學愉次子)為 1911 年清華直派留美學生，1917 年密西根大學醫學博士，曾任福州醫院醫生。弟崇樂(1901-1969)清華學校 1920 級，美國康乃耳大學農學博士，先後任教清華大學、東北大學等校，1946 年為清華農學院昆蟲系主任，1955 年被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sup>5</sup>再往後則有姪子劉岱業(長兄崇澍之子)曾任南開大學教授；姪劉準業(崇佑長子)曾任教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及華東化工學院；姪孫劉廣京(學怡之三兄學性的曾孫)，<sup>6</sup>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名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劉廣定(學怡仲兄學恂的曾孫，崇佑之孫)，臺灣大學化學系教授，可謂一門俊秀。

崇鉉幼年時代曾住武昌和上海，除了家庭教育外，可能上過教會學校，學習英語和數理課程。在堂兄崇勤的影響下，帶著辮子由上海到北京投考清華學堂，從此訂定他的一生，這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當時以庚子退還賠款派遣留美學生的工作，由外務部「遊美學務處」

學怡為張之洞姪婿，時又在武昌任事，自然受其影響。蘇雲峰，《中國現代化之區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0年)，頁 506-507。

<sup>3</sup> 據劉廣定手抄福州劉氏族譜，及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58 年)，頁 68, 164-166。

<sup>4</sup> 橋川時雄纂，《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鑑》(北京：中華法令編印館，1940 年)，頁 683。

<sup>5</sup> 《清華人物志》(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6 年)，冊 4，頁 69-70。

<sup>6</sup> 關於劉廣京的一系，據廣定抄來之福州劉氏族譜：劉廣京之曾祖原名學性(即學怡之三兄)，出嗣堂叔齊康後改名「忻」。忻之次子鴻壽(即崇任)為光緒 17 年(1891)舉人，生六子二女，其中，次子驥業早稻田大學畢業，民初曾為廢帝溥儀之日文教師。四子駿業即廣京之父親，五子駟業(攻芸)留英經濟博士，曾任教清華大學，後從政，抗戰勝利後曾任中央信託局局長、中央銀行總裁及何應欽內閣之財政部長。長女適林彥京，即陳雪屏之岳父母。



辦理。「遊美學務處」下設「遊美肄業館」，以清皇室「清華園」為堂址，讓通過甄選的學生接受半年到一年的預備教育。但由於時間緊迫，實際上前三批學生，在肄業館的時間均不足三個月。為提升學生學力，學務處乃將「遊美肄業館」改為清華學堂，分為中等科和高等科各四年，八年畢業後可直接插班美國大學三年級，美國大學畢業後再繼續三年學業。清華學堂於1911年3月30日開學時學生共468人，其中，1910年第二次留美考試之備取生143人，由各省考送者184人，由清華學堂籌備處1911年2月在北京招考者116人，<sup>7</sup>崇鉉即為其中之一。他回憶1911年初赴京應試經過時說：

筆者時年十四，原籍福建，隨父兄居江蘇，不能在福建應試，特隨先兄搭海輪繞道秦皇島（時大沽口冰凍）入京就試。記得是一個寒冷的初春早晨，帶了墨盒毛筆（那時中國似乎還沒有自來水筆），乘坐騾車，到西城學部考棚（科舉時代的考場）去參加考試。最擔心的是英文程度太差，尤其是考到「英文默寫」，由唐介臣（國安，時為校長）先生讀一段英文，考生跟著寫錄。唐先生英文太好，念得非常流利，祇是苦了筆者跟不上，尤其每句之末來一個‘period’，簡直莫名其妙。兩天考完，想不免「名在孫山外」，那知榜發，竟僥倖列在第十一名，意外之喜不必說。榜發的次日，先兄帶我到理髮店（那時稱剃頭店）將辮子剪去，當時不知道剪辮子的意義，也不知道沒有辮子可能的危險，筆者是沒有政治敏感的。<sup>8</sup>

其實，清華學堂的入學考試科目多且難，除國文及中國史地外，一律以英文作答，要考取真不容易。入學後淘汰率又很高，要通過層層嚴格篩選更難。他自覺「英文很不行」，所以入學後多「忙於英、算，而忽略國學」，經多年努力，各科都有進步，英文和國文也都不錯。1918年畢業前夕，既感興奮，也依依不捨。他回憶說，

我們的畢業期近，去美國，選什麼學科，入那個學校，當然是我

<sup>7</sup> 蘇雲峰，《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11-1929》（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頁17-20。

<sup>8</sup> 劉崇鉉，〈五十年前畢業清華學校的回憶〉，《傳記文學》，卷13期1（1968年7月），頁13。

們最關心的事，可是對於水木清華的校園即將辭別，深感依依不捨，所以於每天清早到校園內各地散步，希望留個美麗的記憶。<sup>9</sup>

他可能受到清華歐洲史老師麻倫(Carroll B. Malone, 1886-1973)，及交換教授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主任麥克洛(Robert M. McElroy)的影響，<sup>10</sup>決定專修西洋史，插入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三年級，1920年獲得學士學位。同年秋轉入哈佛大學，1921年獲文學碩士學位。1921至1923年間，分別在哥倫比亞大學及耶魯大學繼續歐洲史及美國史之研究，不修學位。在紐約，他認識了久仰的蔣廷黻和蔣氏在哥大之博士論文指導教授海斯(Carlton J. H. Hayes, 1882-1964)。<sup>11</sup>這二人對他都有一定的影響。他敬佩蔣氏的治學態度和史學方法，此後任教時也常採用海斯為美國高中學生所寫的歐洲史課本。1923年崇鉉返國應聘為天津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這是他完成學業後的第一個教職。

南開為張伯苓所創辦，1919年改為大學，積極經營，延聘名教授，有良好聲譽，但經費常感困難，不若清華寬裕。而清華學校為提升教學品質和學術地位，於1925年成立大學部（1929年改為國立清華大學），積極延聘清華留學有成之校友為教授，他乃於1925年8月轉教清華學校，一待就是24年，他回憶說：

誰知我太幸運，於離開清華之後七年(1925)，又回到清華任教，重享清華的優美氣氛，直到中共軍隊開到校牆外，清華入其勢力範圍，我遂不得不離開清華，離開北平，離開中華的大陸。<sup>12</sup>

崇鉉在清華主要講授西洋通史和希臘羅馬史。他為人不善交際應酬，也不太關心政治，專心教學，培育了許多西洋史學人才，其中，受益最深者為世界級史學家何炳棣院士。何氏於事隔六十餘年後，談到這位恩師

<sup>9</sup> 劉崇鉉，〈五十年前畢業清華學校的回憶〉，頁14。

<sup>10</sup> 同上，崇鉉說麻倫在清華教歐洲通史和歐洲上古史等課，「給我們的歷史基礎訓練」。另外，麥克洛於1917年初到清華任交換教授，對他們高三這一班作了“The Representative Idea in History”一系列專題演講，內容包括希臘、羅馬、德國、英國、美國革命和美國憲法。蘇雲峰，〈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11-1929〉，頁421-424。

<sup>11</sup> 劉崇鉉，〈我所認識的蔣廷黻兄〉，《傳記文學》，卷9期5（1965年），頁30-31；海斯為著名美國史學家，在哥大講課，廣受聽眾歡迎，見《大美百科全書》（臺北：光復書局，民國83年），頁432。

<sup>12</sup> 同註9。

時，還感動得哽咽落淚，良久不能語言。<sup>13</sup>主要原因何原本於 1934 年考取清華大學化學系後不久就想轉系，因受大一必修之西洋通史課程的影響，一年後決定轉入歷史系，開此課程者便是劉崇鉉教授。此外，西安事變和平結束當夜，何與左派「救國會」學生衝突，跑到劉崇鉉家中躲避，免於挨打。<sup>14</sup>何回憶轉系的經過說：

（選修）西洋通史和大一英文，給我帶來無限的歡欣。西洋通史是全年八學分的奠基主課。由於外系必修，其他文、理、法學院諸系選修者亦多，班上同學超過百人，只能在星期一、三、五晚上在科學館（已為物理系專用）三樓戲院式大教室上課。此課由劉崇鉉（壽民）教授主講。他出自福州世家，國學根基相當雄厚，英文亦好，與夫人（沈鍾應）的書法俱甚俊秀。劉師教學的特色是篤實。課本不過是美國高中最通行的 Hayes 和 Moon 合著的上下兩冊的通史。他認這兩冊細讀消化之後應已能初步掌握基本史實。他另精選不少部較高層次，但並非必讀的參考書，由學生自由抽讀品嚐。這些書放在西文閱覽室參考書架上，由學生簽字借閱，限時歸架，違者罰款。

劉師為人謙虛和藹，講課極為認真，幾乎週日晚間總在圖書館底層辦公室裡，準備講課的資料。他的演講一般遠較課本為深入，甚至有時太深了而不能淺出，於是使我不避冒昧夜間就向他叩門請教，受到書目方面的指導。例如我最初抽讀芝加哥大學近東考古和埃及學宗師 James H. Breasted(1865-1935)入門性的《上古世界》，和耶魯大學 Michael I. Rostertzeff 的《古代近東》兩書後，即覺得眼界大開，趣味無窮，內心已在考慮是否應改修歷史了。<sup>15</sup>

由於崇鉉教授的指導和鼓勵，何氏認真研讀西洋史，結果上學期平均成績得超等 E(Excellent)，居全班之冠。「下學期更加用功深索，全年平均竟獲 E+，創了紀錄」。可是，全心投入西洋通史和英文的結果，化學

<sup>13</sup> 何院士為個性剛強之人，但於 2000 年 6 月和劉廣定及筆者談到這位恩師時，竟哽咽落淚，良久不能語言。可見其感念之深，也的確令我驚訝和感動！

<sup>14</sup> 蘇雲峰，《抗戰前的清華大學，1929-1937》（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 年），頁 241-239。

<sup>15</sup> 何炳棣，《何炳棣回憶錄稿》，〈清華大學〉部分。

和數學成績相對下滑。而化學系要求大一化學成績若非達到相當標準，不准升入二年級。由於個性不願居人之後，何乃決定第二年起轉入歷史系。何自認這是一次成功的經驗，「以後治學幾無不遵守清華大一讀西洋通史過程中所立的紮硬寨、打死仗式的自我磨練原則。」<sup>16</sup>崇鉉教授與有功焉。名史學家劉子健亦說，由於崇鉉教授當年對清華學生閱讀的要求，「遠遠超過燕京和北大，清華也就出了許多史學方面的人才。」<sup>17</sup>

七七事變後，政府要求大學西遷，教育部於1937年8月28日成立長沙臨時大學，由南開、北大和清華三校組成。9月初，梅貽琦校長通知各教授往長沙集合。起初，清華教授中有許多人不想離開北平，吳宓便是其中之一，經梅氏及馮友蘭、葉企孫等人催勸，大家始決定南下。8月15日，吳宓到清華，時各宿舍均已關閉，人煙稀少，「卒遇劉崇鉉君及其夫人，擊二子散步」，<sup>18</sup>作離校前的最後巡禮。崇鉉安排家眷妥當後隻身南下，約於9月中下旬到達長沙。臨時大學於10月25日開學，有教職員255人，其中清華153人最多；學生1480人，清華也佔多數。崇鉉為清華歷史系主任兼臨時大學歷史系教授會主席。因長沙空間不足，奉命帶領臨時大學文學院學生190人（其中清華歷史系4人），於10月14日到達南嶽聖經學校分部，安排宿舍、圖書和課程妥當，於11月6日向梅貽琦常委報告。從這份報告裡可以看到他的領導能力、處事態度和臨危不懼的精神。他說，

（十四日）下午二時安達聖經學校。學生共約一百九十人。男生一百六十餘，居一宿舍，每室五人，頗為擁擠，室內不能看書作字，只能以課室兼作自修室。女生二十餘人，居另一樓房之一半，其他一半作辦公室。樓下則中央研究院辦公室也。教員所居之樓更在山上，須行石階三百數十級（實為384級）始達。每日數往返，久練成習慣，想至明年，文學院夫子個個能健步如飛矣！院務由委員會主持，吳俊升先生為主席，朱佩弦（自清）先生為書記，（馮）芝生（友蘭）、（葉）公超與鉉參與會議，每兩三日聚會一次。因課室、圖書館尚未布置就緒，本定十五、六上課，

<sup>16</sup> 同上。何炳棣同時亦感謝數學系教授兼教務長鄭之蕃同意其轉系。

<sup>17</sup> 〈張元致劉廣定函〉，2001年2月4日。

<sup>18</sup> 《吳宓日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冊6，頁197。

茲延至十八，可不至再延矣。鉉既來此上課，系中事務不克遙顧，已函常務委員會辭系教授會主席職，並請姚從吾先生暫為代理。至清華方面，史學系學生在山者只四人，餘均留長沙，所有系中事務，擬托雷海宗先生代理。……<sup>19</sup>

從報告中看不到他的沮喪和悲情，但這段寧靜的日子非常短暫。瘋狂的日本侵略軍，於 1937 年 12 月 13 日佔領南京，大肆屠殺，長沙亦被轟炸。臨時大學於翌年 1 月中旬決定南遷雲南昆明，崇鉉於 1 月 12 日先送二箱行李下山，23 日到南嶽車站送吳宓上車，自己和文學院全部師生則於 2 月 5 日集中長沙。<sup>20</sup>赴滇計畫準備妥當，部分教授已先行，學生分為二批，女生及體格較差者經粵漢路到廣州、香港、海防，由滇越路入雲南。另一批二百餘人（其中教授 11 人）組成旅行團，穿山越嶺步行。崇鉉於學校宣佈南遷後，發現「學生頗有以經濟困難慮不克前往者，其中不乏品學優良之青年，若任其因貧輟學，殊失國家培植人才之意」，乃與 45 位教授共同發起，呼籲將學校津貼每位教授之旅費 65 元全數捐出，「作資助貧寒優良學生之用，其分配方法，悉請常務委會妥為籌劃」。結果有 51 位教授響應，共捐出 3350 元。除提出 1600 元補助 80 名學生外，餘款俟到昆明後，另行開會決定使用。<sup>21</sup>由於他的呼籲，80 名貧寒學生才能跟隨大夥出發，於 4 月 28 日前抵達昆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4 月 2 日改名），<sup>22</sup>其惻隱之心，灼然可見。

崇鉉到昆明後，接替雷海宗為歷史系主任兼師範學院史地系主任，休假期間則由雷海宗擔任。<sup>23</sup>其後，文學院遷蒙自，8 月 2 日崇鉉和金岳霖

<sup>19</sup> 〈劉崇鉉函梅常委報告南岳情況〉（1937 年 11 月 6 日），《清華大學史料選編》（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 年），冊 3（下），頁 32-33。

<sup>20</sup> 《吳宓日記》，冊 6，頁 283, 285, 293。

<sup>21</sup> 〈劉崇鉉等 45 教授捐款補助寒苦學生旅費信〉（1938 年 1 月 28 日），《清華大學史料選編》，冊 3（下），頁 114-115。這時湖南幣值穩定，物價便宜，一天三餐大魚大肉僅需四角錢，一元可辦八人份的一桌酒菜。見張起鈞，〈西南聯大紀要〉，《學府紀聞：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臺北：南京出版社，民國 70 年），頁 31-32。所以教授每人捐出的 65 元，是一筆大錢。

<sup>22</sup> 吳徵鎰，〈長征日記——由長沙到昆明〉（1939 年秋），《清華大學史料選編》，冊 3（下），頁 126-135。

<sup>23</sup> 雷海宗為崇鉉之學弟好友，清華 1922 級，1927 年芝加哥大學博士，論文為法國革命前重農學派經濟思想家 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1781)的政治思想，指導教授主要為 James Westfall Thompson。1965 年何炳棣之被選為芝大湯普遜講座，與此有關，見〈何炳棣致蘇雲峰

及葉公超，共同邀請剛抵校的吳宓到「蒙湖咖啡館」吃飯。<sup>24</sup>1939年12月31日新年除夕，崇鉉的妹夫楊石先（聯大化學系主任）夫婦，邀請葉公超夫婦、王贛愚夫婦、崇鉉、崇樂兄弟及吳宓等人共餐，諸客中除吳宓外，均互有戚誼關係。<sup>25</sup>崇鉉在西南聯大講授西洋近代史、歐洲19世紀史、英國近世史、英國史、美國史和美國史研究等六門課。<sup>26</sup>聯大歷史系學生傅樂成回憶說：

劉老師名氣極高，胸羅萬卷，而惜墨如金。他的「半循環式」教學法，數十年來，也膾炙人口。教法是第一堂的下半時的教材，必在第二堂上半時重述一遍，第三堂上半時講的，內容又與第二堂下半時相同。如此循環不已，層層見喜。這種教法，好處是學生雖遲到半堂，抄筆記仍能接得上。缺點則是因為過於「叮嚀周到」，課程多半無法講完，例如他的美國史，林肯便是永遠不死。<sup>27</sup>

教學與學術行政之外，崇鉉亦參與史料編纂工作。1939年元月，由北平南遷昆明的北平圖書館（實際負責人為袁同禮），為蒐集中日戰爭史料，作為歷史存證，與西南聯大合組「中日戰爭史料徵輯委員會」。北圖負責史料徵輯，聯大負責史料編纂。「應邀參加委員會者有：馮友蘭、劉崇鉉、姚從吾、錢端升、傅斯年、陳寅恪、顧頡剛等。徵得之中西圖書達八千餘冊，期刊二千八百餘種。史料彙編有《戰爭史料集刊》及各項書目索引，備供研究人士參考」，成果相當豐碩。<sup>28</sup>

在西南聯大期間，由於夫人仍居北平，他曾三度潛返淪陷區探親，<sup>29</sup>其中一次於1940年，其餘二次時間不詳。清華有教授每七年一度的休假研

函）（2001年4月18日）。雷氏學貫中西，教授中國通史、西洋通史和西洋斷代史，劉廣京院士和任以都教授均深受其影響。著有：《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一書，另與林同濟合著《中國之危機》與《文化形態史觀》二書，自編《中國通史選讀》（1935年）一冊。

<sup>24</sup> 《吳宓日記》，冊6，頁344。吳宓說：「西餐洋酒，入滇以來所未嘗也。」

<sup>25</sup> 《吳宓日記》，冊7，頁106。

<sup>26</sup>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150-152。

<sup>27</sup> 傅樂成，〈我怎樣學起歷史來〉，《時代的追憶論文集》（臺北：時報出版社，民國73年），頁258-259。

<sup>28</sup> 王振鵠，〈袁同禮傳〉，收於胡建國主編，《國史擬傳》（新店市：國史館，民國89年），輯9，頁115。時館長為蔡元培，蔡於1939年3月逝世於香港，由袁同禮代理館長，1942年真除。

<sup>29</sup>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頁153，〈劉崇鉉〉。

究制度。1940年6月8日，他服務十四年期滿，向清華大學評議會提出申請國內休假研究計畫。從這個研究計畫中，可以了解他的研究興趣、方向、方法和困難所在。計畫書說，他擬編寫一部《十九世紀英國史》，已收集許多資料，但仍感不足，擬寫〈十九世紀英國之自由思潮〉，和〈十九世紀中英兩國關係〉二文，以為補充。這份研究計畫書可能是他留下的唯一史料，特將全部內容抄錄於下：

敬啓者，鉉自民國二十二年春節第一次休假返校後，服務復七載有餘，茲照章呈請休假研究，將所擬研究計畫略陳於下：

十餘年來，鉉所授課多屬歐洲十九世紀史及英國史範圍，近來頗思根據所集教材，編一《十九世紀英國史》，惟自問有若干方面需要補充。蓋尋常逐日上課，逐日準備，常苦時間匆促，有讀書不能詳盡透徹之憾。茲若得許休假，擬以較充裕時間先研究兩方面：

(一)、十九世紀英國之自由思潮。自由主義在十九世紀為英國政治進展之中心線索，對於歐洲其他國家，以及全世界，亦有相當影響。擬詳究其演化之過程及其盛衰之原因。建立此派學說之基本著作如邊沁之代表作品，亞當斯密之《富源》(Adam Smith—*The Wealth of Nation*)，穆勒之《群己權界》及《經濟學原理》(J. S. Mill—*On Liberty,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等，擬詳加研讀，俾了解各人學說之精義，識其異同及其修改演變之過程。論自由主義之名著如 Halivy—*Formation du Rationalisme Philosophique*, Stedphen—*English Utilitarians*, Dicey—*Lecture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Law and Public Opinion*, Ruggiero—*History of European Liberalism* 等，亦將廣為涉獵，並注意學說之應用及其於實際政治之影響。

(二)、十九世紀中英兩國關係。關於此方面之紀述與討論，中文書籍已頗不少，惟對於近年英美之出版重要著作如 Earl Pritchard—*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hinese Relations, 1750-1800*, Costin—*Great Britain and China, 1833-1860*, Kiernan—*British Diplomacy in China, 1880-1885*，尚少利用。而英方之原始資料，如 Parliamentary Papers (Blue Books), Parliamentary Debates (Hansard)亦似尚未充分用及。今擬盡所能用此種資料，求

明了英方之觀點與立場，或可補充與糾正國人以往之論著。據鉉所知，Pritchard、Costin、Kiernan 諸人之著作，北平圖書館備有；British Documents, 1898-1914(IV)，清華有前六冊，現在昆明，又北平政治學會圖書館有全帙。Blue Books，政治學會圖書館似有之。本年擬致力此兩方面，若得相當成績，將先寫成論文，並根據以為編著全書之基礎。（以下為歷史系服務滿七年可申請休假者名單，從略）

劉崇鉉謹啓

（1940年）6月8日<sup>30</sup>

他可能於此年秋離開昆明，到北平探親及搜尋資料後，轉赴上海探親。<sup>31</sup>這時昆明與香港仍有航空班機，與上海之間亦時有人員往來，他是如何去的，不得而知。依照校方規定，休假一年期滿，應返校復職並提出報告，但不知何故，他在休假期滿後仍滯留上海。1941年10月底，梅校長電催早日返校，並謂「萬一臺端在滬需款備充旅費，並希電示，當可商請上海中基會在滬墊撥。」<sup>32</sup>據西南聯合大學1942-1943年度的歷史學系教授名單判斷，崇鉉最快也要到1943年秋才回到昆明。<sup>33</sup>另一個證據是，1943年3月梅校長之母在津過世，崇鉉未赴梅宅弔唁，而於9月16日應梅之邀到其寓所「食牛肉」。<sup>34</sup>由於潛赴淪陷區是冒險之行，他從未向人透露其中經過，我們也就無法知道其中內情了。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軍來華助戰，由於清華的留美關係，西南聯大與美軍將校和駐華官員之間，交往頻繁。1944年6月25日，梅貽琦應來華訪問的美國副總統華萊士(Henry Agard Wallace, 1888-1965)之邀，到昆明美國領事館午餐會談，陪同梅校長與會之清華教授有：劉崇鉉、潘光旦、張奚若、曾昭掄、湯佩松等12人。美方除副總統和總領事

<sup>30</sup> 〈劉崇鉉國內休假申請信及研究計畫〉（1940年6月8日），《清華大學史料選編》，冊3（上），頁292-293。

<sup>31</sup> 劉廣定說他的祖父崇佑，和崇鉉的舅兄沈崑三（沈葆楨之孫），這時都住在上海。

<sup>32</sup> 〈梅貽琦函章名濤、浦江清、劉崇鉉催照章返校事〉（1941年10月30日），《清華大學史料選編》，冊3（上），頁328-329。

<sup>33</sup>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頁148。於歷史系教授十人名單中，無崇鉉名字，跟著說他「於1940年赴北平探親」，可見他此時尚未回來。

<sup>34</sup> 《梅貽琦日記》（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134, 141。



外，有陳納德等將領 3 人，外交官 Owen Lattimore, John Hazard, John C. Vincent, Elmer Davis, Minter Rutherford 和學者 Hayes（應是崇鉉認識的哥大教授）6 人。雙方交談多涉及中國戰局和美方所擔心的戰後俄國勢力擴張問題。會談後，崇鉉等還陪華萊士一行參觀聯大圖書館和生物系，並隨華氏至雲南大學演講，是晚接受省主席龍雲之歡迎餐會。<sup>35</sup>可謂崇鉉等為促進中美關係付出最多的一天。

抗戰勝利，西南聯大於 1946 年 5 月結束，各校復員。崇鉉等西南聯大教授六十餘人，5 月底由昆明抵達重慶，急著返回北平，但是航空委員會之飛機，因時局關係停航，而中國航空公司赴平班機，每周僅載旅客 14 人，且已有一千二百餘人登記，想去買票，也苦無門路。另一方面，重慶氣候濕熱，滯留過久，經濟也不堪負擔。為早日返校，乃聯名函請傅斯年和梅貽琦二人，建議「向政府交涉，請求允許航委會或航空公司包飛機一、二次，即可解決目前的問題」；若不能，則請「向救濟總署接洽，用登陸艇免費送同仁至京滬轉天津，或向美軍方面借飛機，自渝逕飛北平。」<sup>36</sup>似都不如願，以致遲至 10 月初始抵北平。<sup>37</sup>

由於清華校園被日軍用作野戰醫院病房，圖書儀器搶盡，建築破壞不堪，梅校長估計非三數年不能恢復舊觀，又以交通擁塞，清華師生直到 1946 年 10 月 10 日，始復校開學。隨著國共政爭惡化，學潮頻起，開學兩個月後，清華學生就連續為沈崇事件、非法逮捕事件、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反美扶日等運動，罷課罷考遊行。梅校長「再三告誡，勿往校外活動」，學生固不聽。請政府勿令軍警擅入校園，政府亦不理，以致惡性循環，校園擾攘不安，至令梅校長承認「無法維持善後」。時雷海宗為歷史系主任兼代文學院院長，非常活躍。崇鉉向不太關心政治，除講授西洋

<sup>35</sup> 《梅貽琦日記》，頁 153。原日記中美方人員有姓無名，今據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4) 查核補全。彼等除海斯外，均為國務院主管戰爭情報、人事、中國和蘇聯事務部門的官員。按華萊士於 1944 年 6 月 20 日抵重慶，7 月 2 日返美，其間曾到昆明二次，行前與蔣介石發表聯合聲明：「中美互助對日作戰，中美俄友善諒解。」見：《中國國民黨七十年大事記》，頁 206-207。但當他們和西南聯教授會談時，卻憂心戰後俄國勢力向太平洋擴張。

<sup>36</sup> 〈劉崇鉉等十六人函傅斯年請安排返北平機票事〉（1946 年 6 月 21 日），《傅斯年檔》，II：472。十六人之簽名依次為：劉崇鉉、馮承植、馮友蘭、陳序經、姚從吾、甯槐、邵循恪、張清常、陶傑楷、江澤涵、湯用彤、蔡樞衡、王遵明、徐仁、王憲鈞、葉楷。

<sup>37</sup> 《梅貽琦日記》，頁 254。1946 年 10 月 6 日「上午陳福田來，劉壽民來，皆新到平者。」

通史，研究英國史與美國史之外，<sup>38</sup>僅兼「中國近百年史研究委員會」、「教職員醫藥補助委員會」、「教職員福利委員會」和「校園巡防委員會」委員。近百年史研委會擬編著一本半專門半通俗性之近百年史標準著作，由 12 位委員依各人專長提出研究計畫，經評議會於 1947 年 4 月 17 日通過執行。崇鉉的研究計畫是〈歷次變法與革命運動〉。由於校園動盪不安，這 12 人的計畫都沒有完成。1948 年 12 月初，清華校園外就已砲聲隆隆，15 日解放軍進駐清華，接管學校，梅校長先一日離校。<sup>39</sup>清華從此進入一個新時代。

崇鉉於 12 月 20 日與梅貽琦等人離開北平，先到南京，後轉上海。時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邀其前往廣州，因已答應臺大校長傅斯年之邀，乃乘中興號輪船來臺。1949 年 2 月 1 日到臺大報到，這是一個轉捩點，至少他慶幸逃過一劫。自此日起他出任臺大歷史系教授，直到 1973 年 8 月退休為止。其間於 1950 年至 1963 年兼任歷史系主任，1951 年 3 月至 1954 年 7 月兼任教務長，1957 年 2 月至 1963 年 7 月兼歷史研究所主任。<sup>40</sup>蕭啓慶說，這「正是臺大歷史系的第一盛世」。<sup>41</sup>1962 年，崇鉉與臺大中文系教授臺靜農共同策劃，向校方爭取到經費，每年就中文和歷史兩系之研究生學位論文中，選出三篇，編印《臺大文史叢刊》，迄今已出版百餘種。<sup>42</sup>這是崇鉉對臺大歷史系的一項貢獻。此外，他還在 1955 年借聘到東海大學創辦歷史系，兼主任一年。又由於梅貽琦校長生前的推薦，他於 1963 年 8 月至 1969 年 7 月間，兼任美國在華教育基金會(Fulbright Foundation)執行秘書。這時有人批評他為賺取美金，不顧歷史系及歷史研究所主任身分。實則係出於人情牽絆，梅既是他的物理和圖形幾何老師，又是多年長官，二人感情濃厚。他又佩服梅校長的處事態度，崇拜他的人格，所以「不能推辭」。<sup>43</sup>更何況當時之「執行秘書」實際即如今之「執行長」，有相

<sup>38</sup> 〈人少而活躍的歷史學系〉，《清華大學史料選編》，冊 4，頁 191-192。

<sup>39</sup> 以上片段資料係取自《清華大學史料選編》，冊 4，頁 27-28, 70-84, 87, 172-178, 192, 268, 578, 592。

<sup>40</sup> 據劉崇鉉〈臺灣大學教員履歷表〉及〈國立臺灣大學教職員動態登記卡〉。

<sup>41</sup> 蕭啓慶，〈千山獨行：我的習史歷程〉，國科會《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卷 3 期 2（2000 年 10 月），頁 4-5。蕭啓慶 1955 年考入臺大歷史系，1959 就讀臺大歷史研究所，1963 年畢業。2000 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sup>42</sup> 〈劉廣定致蘇雲峰函〉引述孫同助教授語，2001 年 3 月 9 日。

<sup>43</sup> 劉崇鉉，〈悼念先師梅月涵先生〉，《傳記文學》，卷 1 期 1（1962 年 6 月），頁 38-39。

當的權力。加以「他對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國文化）的瞭解之深，以及思慮的週全和任事的勤勇，對於促進中、美間的文化交流，有極大的貢獻。」<sup>44</sup>就在他的籌劃下，該基金會與臺大歷史系訂立一個合作計畫，資送系上年輕講師孫同勛、張忠棟、劉景輝，和中文系的張靜四人赴美留學，孫、張二人因此而獲得密西根大學的博士學位（主修美國史）。<sup>45</sup>四人後皆為臺大著名教授。他離開基金會回臺大後，又於 1972 年 8 月應聘到東吳大學創設歷史系兼主任一年。臺大退休後，專任東吳歷史系教授及主任至 1979 年。臺灣大學為感謝他對歷史教育的貢獻，於 1986 年頒給他「榮譽教授」名銜。此外，其與臺灣學術界有關者尚有三事。一是享譽世界的《清華學報》，從新 2 卷（1960 年）起在臺集稿出版，他擔任編輯委員，直至新 14 卷（1981 年）為止。<sup>46</sup>二是「中國歷史學會」於 1965 年成立，他是創始會員，並連任理、監事十餘屆，對會務「貢獻良多」。<sup>47</sup>三是主持國立編譯館高中及初中歷史教科書編輯委員會多年。

崇鉉在臺灣大學歷史系教學的認真，和在清華與西南聯大時並無二致。他的得意高足王曾才說：「他教學態度的認真，也可以說是無出其右者。如果第二天有課，他這一天從早到晚，一定會摒棄一切雜務，把教材整理了再整理，常常到大半夜不能睡覺。」<sup>48</sup>半循環式甚至全循環式的教法，與西南聯大時相同。課本採用英文教科書，提高學生外語能力。李又寧說，「劉師講課很認真，從不缺課。雖然不是口若懸河，但很有條理。他是一位沒架子的教育行政主管，總是笑靨迎人，很和氣，很客氣，對學生不直呼其名，男生稱某同學，女生稱 miss 某。同學們認為，這是一種美國作風，甚為稱頌。」<sup>49</sup>

他協助創辦東海大學歷史系，所延聘的教授，除他的老師麻倫外，大

<sup>44</sup> 王曾才，〈和煦如春風的劉崇鉉先生〉，《清華校友通訊》，期 111，頁 141。

<sup>45</sup> 同註 42。孫同勛為美國史專家，曾任臺大教授、中研院美國文化研究所所長，現執教文化大學。張忠棟（已故）和劉景輝皆為著名美國史和西洋史教授。

<sup>46</sup> 〈劉廣定致蘇雲峰函〉，2001 年 5 月 31 日。

<sup>47</sup> 《中國歷史學會會訊》，期 36（民國 79 年 5 月 20 日），版 16。中國歷史學會自今年七月起為第 37 屆，有會員千餘人。

<sup>48</sup> 王曾才，〈和煦如春風的劉崇鉉先生〉，頁 141。

<sup>49</sup> 〈李又寧致蘇雲峰函〉，2001 年 5 月 6 日。李教授是臺大歷史系 1957 級，現任美國聖約翰大學教授。

都是他的清華學弟，如：楊紹震是清華歷史系 1933 級，美哈佛大學碩士，曾任中研院近史所兼任研究員；藍文徵是清華國學研究院 1929 級，中國史專家；梁嘉彬是歷史系 1932 級，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博士；朱延豐是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1933 級，英國牛津林肯學院碩士。可以說都是當時知名的歷史學家，為東海歷史系樹立鞏固基礎。東海大學為感謝其對歷史教育與學術的貢獻，特別設立「東海大學歷史系劉崇鋐學術講座」。

東吳大學於 1972 年獲得基督教亞洲高等教育委員會(Commiss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之資助，指定發展中國藝術史之研究，決定成立歷史系。端木愷校長乃聘請崇鋐為系主任，從事籌備工作。他借重故宮博物院對中國藝術史已有的研究成就，延聘其副院長譚旦厝為專任教授，講授「中國藝術史」與「藝術史論」；聘同為故宮副院長的李霖燦為兼任教授。另請在故宮任職，長於西洋藝術史的宋宇女士為兼任教師。以上三位老師，均甚叫座。以後又陸續延聘臺大歷史系畢業，學術有成的張元、王曾才、杜維運、杜正勝，與西南聯大畢業的翁同文，和南開大學畢業的魯光桓諸人為專任或兼任教師。可謂人才濟濟，盛極一時。在出版學術刊物方面，他請譚教授主編《東吳大學中國藝術史集刊》(年刊)。這是當時臺灣唯一的藝術史刊物，獲得國內外專家的重視與佳評。東吳歷史系由此奠定基礎，成為一個以研究中國藝術史為特色的歷史系，培養了許多人才。為感謝他對歷史教育的貢獻，東吳大學於 1979 年至 1985 年聘他為研究教授。繼他之後為東吳歷史系主任的張元回憶說：

劉先生生活簡樸，以讀書為樂，儘管年事已高，仍然不廢閱讀，在東吳授課時每有新義。課堂之外，劉先生淡泊名利，謙沖為懷，言談舉止之中，每每展現高雅的風度，更是學生仰慕效法的典範。劉先生是一位兼具中西文化修養的彬彬君子。東吳歷史系的師生在他帶領下，相處融洽，敬業樂群，不論研究或學習都取得良好成績。而劉先生教學態度的認真不苟，與待人處世的優雅風範，更是深深烙印在親炙學生的心田之中。<sup>50</sup>

他不僅對學生如此，對其他同事亦然。早年在臺大圖書館任職的曹永和，因常到臺大歷史系圖書館去看書，而和劉教授認識。劉教授並不因他

<sup>50</sup> 張元，〈劉壽民先生與東吳大學歷史系〉(2001年2月手稿)。

僅有日治時期五年制中學的學歷，而影響對他的看法。於了解曹氏對歷史有濃厚興趣，且在臺灣史研究上已有若干成績後，便鼓勵並邀請曹氏參加1962年10月在臺北舉行的第二屆亞洲歷史學家會議。曹氏於會中宣讀〈明末中國海外貿易〉一文，這是曹氏第一次參加國際會議，獲得肯定。以後曹氏又想借用美國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的邊疆論，探討臺灣的開發和貿易，向崇鉉教授請益。崇鉉說，「邊疆論只是解釋美國西部開發過程的學說之一，在學術研究的實際操作上，邊疆論還是需要仔細檢驗的。」由於受到崇鉉教授的警惕，曹氏於撰寫臺灣開拓史時，不輕易遽下結論。以後繼續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享譽國際，於2000年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在曹院士的印象中，「劉教授是一位客氣、溫和，且相當紳士風度的人」，和他交談，「完全沒有高高在上的架子」，態度親切，耐心回答你的問題。<sup>51</sup>

在學術研究態度方面，崇鉉深受清華學風影響，重視學術而輕視政治。他對清華歷史系主任蔣廷黻之勸勉有志於史學者，應努力做一個「小註人物」(footnoter)，而不一定要做「標題人物」(headliner)一語，牢記心中，<sup>52</sup>常引用此語告訴臺大學生，勿急於事功，專心研究，「註腳第一，頭條第二」。如前所述，他曾提過若干研究計畫，但一生除了幾篇書評外，發表的論著甚少，學界困惑不解，他自己亦感到懊惱。所以如此，原因很多，主要是他想寫十九世紀英國史，但困處戰亂中國，沒有辦法利用到原始檔案。加他教學認真，難以推辭的行政兼職太多太久，研究時間不足。更重要的，則是他自我要求過嚴、過高，幾乎「是一位完美主義者」，認為寫出的文章，如果不能「藏之名山」，「便索性不要留傳」。他雖閱讀過許多書籍，「一筆不苟」地做了許多資料卡片，<sup>53</sup>但因過度審慎，「惜墨如金」，多半途而輟。而後隨著歲月遞增，名氣愈大，愈不肯輕易出手。他曾於一次演講中，表示十分羨慕英國名史學家吉朋(Edward Gibbon, 1737-1794)，一生經濟獨立，無教學之勞形，專心研究，而有《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這本名

<sup>51</sup> 曹永和，〈關於邊疆論：我與劉壽民教授的學緣〉，《東海大學歷史系劉崇鉉學術講座》，2000年6月1日。

<sup>52</sup> 劉崇鉉，〈我所認識的廷黻兄〉，頁30-31。

<sup>53</sup> 王曾才，〈和煦如春風的劉崇鉉先生〉，頁141-142。

著，感嘆自己之不成。<sup>54</sup>晚年他更毀棄所有資料卡片、筆記、信札、文稿和講義。一位和煦如春風，重視史料的學者，竟壯士斷腕，毀棄自己的史料，豈不也令人爲之惋惜！

在婚姻家庭生活方面，崇鉉與徐志摩、吳宓等人不同。他的妻子沈鍾應(1895-1984)，「原是他的五表姐，結婚後一直被劉教授稱爲五姐」，<sup>55</sup>兩人感情融洽，家庭生活美滿。主張婚姻和愛情可以並行不悖，但結果是婚姻失敗、愛情挫折的清華西洋文學系教授吳宓，於1930年8月22日晚應崇鉉之邀宴於北院9-10號宅後，「深羨其家庭之雍睦，一門三世之和雅，及耐用布置之巧適，小兒之可愛。諸友亦云云。」<sup>56</sup>六年後，吳再度赴宴於劉宅，贊其「肴饌之精美，恨宓居清華多年而未得享受如此之舒適家庭生活也。」<sup>57</sup>最難得的是，抗戰期間，崇鉉曾三度冒險潛返北平相聚，足見鱗鯨情深，難分難捨。崇鉉受清華體育老師馬約翰的影響，喜愛運動，臺大歷史系學生回憶說，劉教授上課時喜歡爬樓梯，亦常騎單車載夫人在校園裡快速奔馳，一若鴛鴦戲水，其樂融融。及夫人於1984年罹患腦中風逝世後，崇鉉悲痛過度，精神憔悴，經常生病住院，至1990年3月21日，因罹患肺炎不治，與世長辭。<sup>58</sup>遺有二子，長劉建、次劉全，俱在美國留學與就業；劉建不幸也於1991年去世。崇鉉之遺產，交其姪孫劉廣定代爲處理，除1994年捐贈臺幣130萬給臺大歷史系購置西洋史史料外，還分別捐贈北京清華大學、天津南開大學、東海大學及東吳大學歷史系，嘉惠後學。這種犧牲自己，培養人才，遺愛人間的精神，將永垂不朽！

<sup>54</sup> 據張朋園說，在中研院史語所的一次演講中，劉崇鉉教授曾提到此事。今查吉朋簡傳，證實其出身富裕家庭，一生不事生產，不愁衣食，專心研究，故有此成就。'Edward Gibbon',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995), v. 5, pp. 248-250.

<sup>55</sup> 王曾才，〈和煦如春風的劉崇鉉先生〉，頁141-142。

<sup>56</sup> 《吳宓日記》，冊5，頁99。

<sup>57</sup> 《吳宓日記》，1936年7月27日，冊6，頁24。

<sup>58</sup> 王曾才，〈和煦如春風的劉崇鉉先生〉，頁142。

亡友守和兄因北平淪陷留美在國會圖書館  
工作編纂此書廣集資料其見工力是一冊極  
有用之參考書目且見其不忘家國書印行  
於一九五八年七年後守和兄逝世於美都逝世  
前一年幸得一晤時已困於病魔  
庚戌年正月初八(一九七〇年二月)於台北古亭書屋  
購得此複印本

此係劉崇鉉教授於袁同禮所編《西文論著中國書目》一書扇頁上的親筆題記。(劉廣定提供)



## 藝術史與文化史的交界：關於視覺文化研究

王正華\*

假若美國藝術學學界（College Art Association，簡稱CAA）的年度大會可視為觀察英語世界藝術史研究的風向標，自1990年代初以來，「視覺文化」（visual culture）或與之相關的字眼如視覺性（visuality）、視覺化（visualization）等耀目非常，在長達四天、橫跨古今東西的各式議程主題中不時出現，稍能與之抗禮的僅有「物質文化」一詞。<sup>1</sup>以具有視覺意義的物品或圖像為研究對象，本為藝術史之固有傳統，久以「視覺藝術」（visual arts）自稱，而與音樂、戲劇、詩作等相區分。如今冠上新而具有統稱性的「視覺文化」一詞，顯然著重點不在於形式之別，而在於「視覺」與「文化」二大分類範疇的連結。此一連結所代表的，不僅是藝術史自身的變化，與之相應的，更是人文社會學界對於「視覺」作為文化分析重要對象的共同趨勢；其牽涉之廣，遠非本文篇幅及筆者學力所能涵蓋。此處僅以視覺文化研究作為切入點，簡述近年學術思潮下藝術史與文化史交涉的一箇層面。至於另一個重要的面向—物質文化，日後若有機會，或可再作進一步的思考。

「視覺文化」為一正在成形的領域（field），實難以鳥瞰方式觀察其大貌，給予功過評判，學院中人對此的態度也莫衷一是。例如：1996年，理論性極強的美國藝術學刊物《十月》（*October*）曾廣發問卷，徵詢各方學者對於「視覺文化」的意見，回應紛紜，肯定、質疑皆有。<sup>2</sup>不過，儘管有些學者認為視覺文化跳脫目前已有之學科分門，不遵循研究傳統，甚至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sup>1</sup> 相關資訊見網址 <http://www.collegeart.org>，其他指標或可自該機構發行之刊物 *Art Journal*、*Art Bulletin* 或近年藝術史博士論文題目測知。

<sup>2</sup> 見“Visual Culture Questionnaire,” in *October*, no. 77 (summer 1996), pp. 23-70.



並無哲學基礎，眾人仍承認其存在於學術研究及學院課程中乃不爭之事實。<sup>3</sup>視覺文化研究確實不能定義為學科(discipline)，因為學科必須有固定研究對象及方法、有其學院內部傳統建制，而「視覺文化」的研究對象及方法卻都跨越了學科的藩籬。以「領域」稱之，正可彰顯其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的特質。

簡言之，「視覺文化」研究的對象包括所有的影像(images)、觀看器具、技術或活動，以及與視覺有關的論述；討論的議題如影像的複製與傳播、視覺在某一文化脈絡中的位置、各式視覺表述(visual representations)，以及觀者的凝視與角度等；所運用的研究方法可有多種，不限於各學門的傳統，在近年人文社會學界理論化的趨勢中，適可與各式理論交會對話。如此看來，在傳統學科分類下便有藝術史、社會史、文化史、人類學等學門與「視覺文化」息息相關，遑論新興學科中以各式影像為研究對象的電影研究、媒體分析等；而 1970 年代崛起於英國的「文化研究」，在大量運用理論解釋近現代與當代文化現象時，自然更少不了「視覺」部分。

無可諱言，視覺文化研究初盛於 1990 年代初，確實與當代文化的特質密切相關。<sup>4</sup>各種視覺產品充斥於當代消費市場，觀看與消費大量結合，取代傳統的消費形式。漫畫成為讀取故事的重要媒介，MTV 成為消費流行音樂（甚至若干古典音樂）的重要管道，兩者皆有其獨特的表達方式。例如，後者在處理音樂的視覺呈現時，不一定採用敘事形式，畫面剪接也不遵循線性的文字邏輯，而往往是以視覺上的聯想為連接點。更不用說近十年來各式電腦遊戲與虛擬真實的數位影像風靡全球，對於成長於電子時代之年輕世代的認知模式自有莫大影響。美國學界與大眾媒體在 1980 年代末期已開始熱烈討論視覺在生活中日趨重要的現象，以及隨之而來之認知方式的改變；連負有文藝發展重責的「國家人文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亦專文報告此一現象，憂心於以文字為主的人文傳統及西方文化將為之衰落。<sup>5</sup>「視覺」成為當代文化重要一環，在

<sup>3</sup> 見 Susan Buck-Morss, "a response to Visual Culture Questionnaire," *October*, no. 77, p. 29; Geoff Waite, "The Paradoxical Task... (Six Thoughts)," p. 65.

<sup>4</sup> 若干關於「視覺文化」的討論，都提到當代以視覺為重的文化現象對於學院研究的衝擊，例如：Nicholas Mirzoeff, "What Is Visual Culture?" in Nicholas Mirzoeff, ed., *Visual Culture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1998), pp. 3-13.

<sup>5</sup> 見 W. J. T. Mitchell, "Introduction," in *Pictorial The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十九世紀後半已現端倪，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即曾討論視覺在現代主體性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sup>6</sup>而今日與「視覺」有關的研究中，頗多將焦點集中於十九世紀後半此一特殊文化現象者。<sup>7</sup>由此觀之，視覺確為現代文化研究的重點之一，於今更演成一枝獨秀的局面。

歷史學強調時間的距離方能孕育出歷史的感覺，其在回應當代文化的挑戰上，或許不如文化研究或人類學靈敏。然而，「所有的歷史皆為當代史」，歷史學對於「視覺」此一文化範疇的注意或視覺材料的運用並不後人，尤其是歷史學的「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 或稱「語言轉向」linguistic turn)，更與視覺文化研究多所相通。以文化為討論內容的歷史學著作早已有之，但標舉文化史旗號，甚至自名為「新文化史」的史學潮流，近十餘年來才在英、美、法諸國盛行。<sup>8</sup>

在此次所謂的「文化轉向」中，受到結構主義與符號學以降學術思潮的影響，尤其強調人類意義的建構性(constructedness)，表述史(history of

1994), pp. 1-2.

<sup>6</sup> 關於班雅明對於十九世紀視覺活動、技術及文化現象的討論，見 Walter Benjamin, "Paris, Capital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his *The Arcades Project*, trans. by Howard Eiland and Kevin McLaughlin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3-13; "A Short 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Alan Trachtenberg, ed., *Classic Essays on Photography* (New Haven: Leete's Island Books, 1980), pp. 199-216.

<sup>7</sup> 例如：Tony Bennett, "The Exhibitionary Complex," in *New Formations*, no. 4 (spring 1988), pp. 73-102; Thomas Richards, "The Great Exhibition of Things," in his *The Commodity Culture of Victorian England: Advertising and Spectacle, 1851-191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7-72; Curtis M. Hinsley, "The World as Marketplace: Commodification of the Exotic at the World's Columbia Exposition, Chicago, 1893," in Ivan Karp and Steven D. Lavine, eds., *Exhibiting Cultures: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Museum Display*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1), pp. 344-65; Timothy Mitchell, "Orientalism and the Exhibitionary Order," in Nicholas B. Dirks, ed., *Colonialism and Cultur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2), pp. 270-92。日文著作見橫山俊夫編，《視覺的一九世紀——人間·技術·文明——》(東京：思文閣，1992)。

<sup>8</sup> 關於歷史學的文化轉向或語言轉向，見 Victoria E. Bonnell and Lynn Hunt, "Preface," and "Introduction," in Bonnell and Hunt, eds.,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p. ix-xi and 1-32; Peter Burke, "Unity and Variety in Cultural History," in his *Varieties of Cultural Histo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83-212。關於法國歷史學最近十年來的新趨勢，大陸學者沈堅有簡要明白的介紹，見〈法國史學的新發展〉，《史學理論研究》，2000年第四期，頁76-89。

representations)一躍成爲文化史研究的核心。<sup>9</sup>歷史學從研究過去所發生的事情，轉向研究各種「歷史真實」(historical realities)的建構；原本被視爲反映真實狀況的歷史文獻，也轉變成各種社會力交結糾葛之下產生的「文本」(text)。<sup>10</sup>如此一來，歷史學研究的重點在於「文本」如何呈現某一作者或機構的特殊觀點，如何建構某一說法成爲社會普遍接受、視爲自然而然的事實，如何達到內化人心、型塑意識形態的作用。另一方面，正由於「文本」所顯示的並非客觀的真實，而是不同社群對於自己生存處境的主觀認知，研究各種感受的表達與記憶，遂亦成爲歷史學的新議題。在此，具有視覺意義的物品與活動也被視爲「文本」的一種，在討論「歷史真實」的建構或主觀感受上極具分析效力，可與文本同列，成爲研究者討論的對象或論證的材料。<sup>11</sup>

回溯過往，西洋史學本有以藝術品表徵時代特色的傳統，例如「巴洛克」此一歷史時期的命名，即來自藝術品的風格特質，而歷史的分期也以風格的轉變爲依歸，即使現代與後現代之爭，也與當代藝術形式的變化緊密糾結。<sup>12</sup>此一長遠的歷史傳統，如今在若干歷史學家的著作中再度出現；這幾位文化史家大量運用視覺材料，討論原本被視爲社會史或政治史的課題。例如，Simon Schama 探討十七世紀荷蘭脫離西班牙統治後，意圖藉若干文化行爲與社會價值，區隔自身與仍在西班牙統治下的南方尼德蘭，形

<sup>9</sup> 關於結構主義、符號學、後結構主義等思潮的介紹不勝枚舉，筆者覺得以下三本書可爲參考：見 Terence Hawkes, *Structuralism and Semio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Christopher Tilley, *Reading Material Culture: Structuralism, Hermeneutics and Post-Structuralism* (London: Basil Blackwell, 1990).

<sup>10</sup> 關於「文本」的討論，筆者覺得 Michel Foucault 一文可爲參考，“What is an Author?” in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trans. by Donald F. Bouchard and Sherry Sim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115-24.

<sup>11</sup> 關於新近文化史潮流的討論，見法國文化史重要學者 Roger Chartier, “Introduction,” in his *Cultural History: Between Practices and Representations*, trans. by Lydia G. Cochrane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88), pp. 1-16; Lynn Hunt, “Introduction: History, Culture, and Text,” in Lynn Hunt, ed.,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1-24.

<sup>12</sup> 事實上，「後現代」(post-modern)一詞最早見於 1970 年代後期的建築批評，見 Charles Jencks, *The Language of Post-Modern Architecture* (New York: Rizzol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Inc., 1977)。關於西方史學以藝術風格轉變觀測社會與文化變化的傳統，見 Francis Haskell, *History and Its Images: Art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as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成自我社群的認同；Peter Burke 以法王路易十四為例，討論各式視覺及文字媒介如何塑造君主形象，如何表徵其為權力的絕對擁有者。再有 Lynn Hunt 討論法國大革命前後由君主政治轉向共和的過程中，如何藉由打破原有奠基於家庭神話的君主政體模式，形成革命與共和所需之新的意識形態。<sup>13</sup>從若干文化史家對於圖像資料的討論，足見其嫻熟於形式分析，甚至得出文字資料難以推見的結論。例如：Lynn Hunt 對於法國大革命時期富含政治諷刺意味之視覺媒材的研究，早已成為藝術史課程中關於「藝術與政治」課題必讀的範文；作者並明白指出，法國當時不識字人口約佔一半以上，視覺形式實為其吸收政治訊息及革命思潮的主要媒介。<sup>14</sup>

當歷史學的研究涉及文化中的視覺面向時，自然會注意到慣於處理視覺物品或圖像的藝術史。事實上，在「視覺文化」此一跨學科領域蔚為風潮後，藝術史研究遂由人文學科中乏人問津的邊陲地帶，開始吸引各方的目光，雖不能說引領風騷，獨擅勝場，但其他學科希望與藝術史交流切磋的企圖卻也十分明顯。以中國史研究而言，許多學者便已注意到文化史與藝術史的交界地帶；多項由史學界主辦的研討會也相繼邀請藝術史學者與會，可見主辦者希望自此一交界地帶汲取研究上源頭活水的心思。<sup>15</sup>此一

<sup>13</sup> 見 Simon Schama, *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 An Interpretation of Dutch Culture in the Golden Ag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7); Peter Burke, *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Lynn Hunt, *The Family Romanc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eter Burke 早年的研究中有專書探討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藝文盛況賴以產生的文化、社會脈絡，書中大量使用建築、雕刻、繪畫等藝術品。惟該書首版成書於 1972 年，仍處於歷史學借取社會科學量化方法的學術潮流中，而未見後來新文化史中常見的各式文化理論。見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Culture and Society i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sup>14</sup> 見 Lynn Hunt, "The Political Psychology of Revolutionary Caricatures," in *French Caricatur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1799*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p. 33-40. 此一短文的若干研究成果已被納入上引作者關於法國大革命的專書中。

<sup>15</sup> 例如：宋史學者 Patricia Ebrey 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所舉辦的「中國文化的視覺面向」研討會，即嘗試邀請不同領域學者與會，在論文結集出版的序言中，也強調近年來藝術史與文化史的交涉。見 Patricia Ebrey, "Introduction to a Symposium on the Visual Dimensions of Chinese Culture," in *Asia Major*, vol. XII, part 1 (1999), pp. 1-8. 另外筆者曾受邀參加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蔣經國中國研究中心」所舉辦的「中國婦女史研究的新方向」(New Directions in Chinese Women's History) 研討會，與會者研究的領域包括社會史、文化史、藝術史、物質文化、文學史，主辦單位甚至邀請紐約大學藝術史家 Jonathan Hay 針對歷史研究中圖像與物品的使用發表看法。本所今年舉辦的二次「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一六〇〇迄今」研討會，亦邀請不同學科學者發

交界地帶的出現，除了歷史學的「文化轉向」外，藝術史學科內部因應學術思潮而來的變化，也是重要的原因。

藝術史作為學院中的一門學科，奠基於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德、奧；後因納粹德國迫害猶太人，促使重要學者播遷英、美，學科之建制包括研究對象、議題、方法與基本假設，也隨之在英語學術世界生根發展。二次大戰後的二十多年間，美國藝術史形成「形式主義」(formalism)與圖像學(iconography)二大研究方向，或專注於藝術形式的剖析與各家各派風格譜系的建立，或致力於發掘可解釋作品中人物或故事意義的文獻資料。此二方向雖來自德奧傳統中的風格分析(stylistic analysis)與內容(content)詮釋，惟其成為研究慣例後，藝術史卻慢慢失去原有的衝力、創見與思辨性。於是，批評之聲自 1970 年代初期開始匯聚，逐漸釀成藝術史研究第一次重大的轉變，即 1970、80 年代社會藝術史（或稱「新藝術史」）的興起。

社會藝術史的潮流與歷史學的社會科學化類似，皆受到 60 年代學生運動後社會與學術思潮的影響，在反省社會建構與關心社會議題的同時，將性別、階級與族群等社會身分的劃分帶入藝術史研究中，或可歸類為左派藝術史。<sup>16</sup>在此之前，無論是形式主義或圖像學研究，皆秉持藝術的自主性、美感的超越性與普世性、藝術家為天才似的創造者與意義產生的主要來源等基本假設。尤其在黑格爾歷史觀的影響下，認為藝術的歷史發展為風格的單一直線進化，自原始的二度空間表現邁向具有視覺上幻覺效果的三度空間，各文化皆然，並無差異；而一個時代的各種藝術形式有其統合性，共同表徵時代精神。<sup>17</sup>在此一歷史觀下，藝術即使與其他範疇有所交涉，也僅限於當時所認為「人類精神文明」中的哲學或文學。左派藝術

---

表論文，包括藝術史學者，見張哲嘉刊登於本期《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的會議報導。

<sup>16</sup> 關於社會藝術史或新藝術史，見 T. J. Clark, "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Art," in his *Images of the People: Gustave Courbet and the 1848 Revolution*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Ltd., 1973), pp. 9-20; A. L. Rees and F. Borzello, "Introduction," in Rees and Borzello, eds., *The New Art History* (Atlantic Highlands: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Inc., 1988), pp. 2-10; Donald Preziosi, *Rethinking Art History: Meditations on a Coy Sci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59-68.

<sup>17</sup> 關於唯心哲學與藝術史傳統，見 Michael Podro, *The Critical Historians of Ar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Michael Ann Holly, *Panofsk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Art Histo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對於黑格爾歷史主義藝術史的批評，見 E. H. Gombrich, "In Search of Cultural History," in his *Ideals and Idols: Essays on Values in History and in Art* (London: Phaidon Press Limited, 1979), pp. 24-59.

史則視藝術品為所有人造物品中的一種，具有物質性；其研究焦點由其內在彷彿與生俱來的美感特質，轉向藝術品作為產品的社會脈絡。原本獨自品嘗創作冷暖的藝術家成為製造產品、行銷販賣的社會人；藝術史研究中開始出現有錢有勢的贊助者、觀看品評的評論者等角色，藝術品成為包括金錢交易、政治權力等各式社會關係的匯集點。

自 1970 年代中後期開始，美國學界開始面對來自歐陸強大的理論思潮；文學批評理論尤其是符號學，鋪天蓋地而來，席捲一世，不僅是文學研究，其他的人文社會學科也必須面對各式文本與符號理論，這就是前已論及的「語言轉向」。藝術史的反應雖不如人類學、文學批評等學科迅速而全面，甚至對於跨學科理論的容受仍多有質疑，<sup>18</sup>但自 1982 年 CAA 機關期刊 *Art Journal* 「學科的危機」(The Crisis in the Discipline)專號開始，80 年代各種對於藝術史學科建構的反省，仍應與此一學術思潮的刺激有關。<sup>19</sup>姑且不論個別學者對於藝術史改革所開出的良方為何，溫和、激烈與否，綜論之，當時年輕世代學者所以產生危機意識，殆肇因於對於己身養成訓練及藝術史研究環境的不滿。

相對於學科奠基之初，藝術史乃是學界智識活力的來源之一，學者如 Erwin Panofsky 等的著作深具啟發性，探討學界普遍有興趣的重要議題，<sup>20</sup>藝術史研究在 1960、70 年代的美國，可說已淪為學術邊緣，與其他學科鮮少交集，猶如祕密宗教，自寫自讀，不斷重複製造類似的知識，在方法學與認知論上少見建樹。因此，在所謂的「藝術自主」與「學術客觀」的

<sup>18</sup> 1970 年代初中期 Clifford Geertz 及 Jonathan Culler 分別將歐陸的文本與符號理論帶入美國人類學與文學批評，而藝術史「語言轉向」出現的年代約晚了十年左右，首見於 *Vision and Painting: The Logic of the Gaz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一書，該書作者為文學理論出身的 Norman Bryson，原本的訓練並非藝術史。「語言轉向」直至 1980 年代後期方在藝術史研究中形成氣候，Bryson 一書在筆者於美國求學時的 1990 年代初期為藝術史學生必讀書籍。

<sup>19</sup> 例如：Henri Zerner, ed., *The Crisis in the Discipline, Art Journal*, vol. 42, no. 4 (winter 1982); Hans Belting, *The End of the History of Art?*, trans. by Christopher Woo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W. J. T. Mitchell, ed., *Toward a New Art History, Critical Inquiry*, no. 15 (winter 1989); Donald Preziosi, *Rethinking Art History*.

<sup>20</sup> 關於 Erwin Panofsky 的研究對於其他學科的啟發，見 Brendan Cassidy, "Introduction: Iconography, Text, and Audience," in Cassidy, ed., *Iconography at the Crossroad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3-15; Allan Langdale, "Aspects of the Critical Reception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Baxandall's Concept of the Period Eye," in *Art History*, vol. 21, no. 4 (December 1998), pp. 486-89.

信念下，藝術史產生的知識很難與其他學科交流，也無法回應當代藝術創作與文化事件所提出的理論性問題，只能為藝術品市場買賣提供最好的諮詢服務。對於成長於 1960、70 年代社會議題盛行、並接受過社會藝術史思潮洗禮的新一代藝術史家而言，博物館雖名義上是為保存文化遺產、推動大眾教育而設立，實際上卻與昂貴的藝術品買賣、有錢人捐錢減稅脫不了干係；藝術史家為了研究價值昂貴的藝術品，不僅捲入博物館政治，也必須與拍賣市場及收藏家維持良好關係，時時處在衣香鬢影的開幕酒會等上流社會的交際應酬中，面對其他學科一波波在學術思考與智識方法上的反省與創發，不禁感嘆所學何為？

1980 年代的反思，對於藝術史研究影響深遠，直至今日，餘波蕩漾，猶未歇止；而其最重要的收穫，或在於打破藝術史的「幽閉症」。此一症狀既顯示於藝術史與其他學科缺乏交流，以及無能對應當代藝術創作與文化事件外，也在學科內部設立了重重關卡。關卡之一為藝術品的嚴格分類，研究上專以一類為主，研究繪畫者不懂版畫、攝影，研究雕刻者不須理會建築；其二為「精緻藝術」與「應用藝術」截然劃分，品秩分明，研究者多以前者為主，對於相對而言可以大量生產的工藝品則較為忽略，相應而生的研究方法自然也大為不同。「幽閉症」的解除，明顯地表現在藝術史跨學科、跨品類與注意大眾文化視覺媒材的研究趨勢上；對於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的理論遂亦較前開放、樂於了解。「視覺文化」或「物質文化」研究乃因勢而起。

在此之前，社會藝術史已將「社會」帶入藝術史研究中，「藝術」不再是獨立自主的範疇，而是社會脈絡的一部分；藝術品也不僅是特出天才的傑作，更包括形式一再重複的商業作品。近十餘年來所形成的第二波轉變方興未艾，然而，藝術史跨學科、議題化及理論化的傾向已十分清楚。在此思潮中，藝術品因內在品質而來的美學考慮更趨邊緣化，各式物品與視覺媒材可依研究課題，混一討論、不分品秩，也不須區別其品質的優劣；取代美學範疇而與藝術史相對話的，則是各式各樣的文化議題與理論。藝術史與其他學科之間，也因「視覺文化」與「物質文化」的崛起，首次出現廣大的交界地帶。

80 年代學科建構反省中的另一收穫，應為對學科傳統的重新認識。

相對於先前藝術史學史論著之稀少，<sup>21</sup>近二十年的成果可謂豐碩許多；在回顧省思的同時，學界也對早期德、法等國的藝術史重要著作，重新整理與翻譯。<sup>22</sup>其中，1991年翻譯出版之 Panofsky 早年以德語寫作關於透視法的著作、前已提及之 1996年 *October* 關於「視覺文化」的問卷回答，以及 1998年英國藝術史重要刊物 *Art History* 對於當代藝術史家 Michael Baxandall 早期著作的討論，在在表明「視覺文化」並非與藝術史傳統無關的外來物。反之，「視覺文化」與藝術史的淵源可謂極為深厚；不僅該詞作為有效的研究範疇與分析架構，首見於藝術史書籍，若干藝術史經典著作，今日更已成為「視覺文化」研究的範例。

1983年，柏克萊加州大學藝術史家 Svetlana Alpers 出版的專書 *The Art of Describing*，率先以「視覺文化」一詞分析視覺範疇的藝術品。該書研究十七世紀荷蘭地區俗世題材繪畫，反對沿用以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宗教、歷史繪畫為研究對象的圖像學式典範。她認為，前者並不具備圖像學式的象徵意義（例如：蠟燭象徵上帝之光、骷髏頭象徵死亡與世俗的虛榮），反而是當地以視覺表述世界、形構知識的特有文化，與這些極具描述風格的作品，更有關聯。也就是說，繪畫與當時科學上的視覺觀念、圖像製造器具及技術等與觀看有關的知識、實踐密切相關，共同形成荷蘭迥異於義大利式的視覺文化。<sup>23</sup>

在此書中，Alpers 明言「視覺文化」一詞係借自其同事 Michael Baxandall。<sup>24</sup>其實，Baxandall 本人的著作中並未使用此一詞語，惟其 1972

<sup>21</sup> 1980年代之前常見的關於藝術史學史的文章僅有 W. Eugene Kleinbauer 一文，該文以平鋪直敘的方式回顧 1970年代之前的藝術史研究與重要著作，為作者編選之論文集的導論。見 *Modern Perspective in Western Art History: An Anthology of 20<sup>th</sup> Century Writings on Visual Art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1971), pp. 1-60.

<sup>22</sup> 除了以下將引用的 Panofsky 之書外，尚見 Henri Focillon, *The Life of Forms in Art*, trans. by Charles Beecher Hogan and George Kubler (New York: Zone Books, 1989); Alois Riegl, *Problems of Style: Foundations for a History of Ornament*, trans. by Evelyn Kai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Christopher Wood, ed., *The Vienna School Reader: Politics and Art Historical Method in the 1930s* (New York: Zone Books, 2000)。第一本為舊譯本之重新編排並加上 Jean Molino 的導言。

<sup>23</sup> 見 Svetlana Alpers, *The Art of Describing: Dutch Ar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sup>24</sup> 其後 Alpers 在回答《十月》的問卷時，也如此回答。見 Svetlana Alpers, "a response to Visual Culture Questionnaire," *October*, no. 77, p. 27.



年的成名作 *Painting and Experience in Fifteenth-Century Italy* 所提出之「時代之眼」(the period eye)的分析架構，實與「視覺文化」研究的基本課題相通；1980年出版的對於十五、十六世紀之交德國木刻的研究，也意圖凸顯歐陸北部與義大利不同的視覺表現及社會意涵。<sup>25</sup>這兩本專書都被藝術史學者視為「視覺文化」的開山之作，在研究傳統中佔有不可忽略的位置。<sup>26</sup>

貫穿 Baxandall 書中的「時代之眼」的概念，係探討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或德國為何會形成某種時人皆可理解的特殊藝術形式。除了傳統藝術史對於某一地區、時代或派別風格的定性分析外，Baxandall 更意圖尋繹該風格之所以為社會接受的原因。因此，在 1972 年一書中，Baxandall 並未刻意標舉該時期作品的美學特質或辨別其品質之良窳，而是去探索當時有經濟能力贊助及有知識能力要求繪畫風格的人，如何理解當時不同畫家及畫派的作品。不過，與「贊助型」研究不同者，Baxandall 並未框定特定的贊助個人或群體，而是在當時社會的各式文化與知識養成中，抽出與理解藝術形式相關的部分，如戲劇表演的視覺形式、數學定理對於幾何形狀的測量等，這些視覺因素共同形成了「時代之眼」。黑格爾唯心史觀中抽象且具目的論與統合性的時代精神，在此落實到具體的社會構成與分析方法，將個別畫家的技藝與當時社會的集體視覺文化密切連結，無怪乎連美國人類學大家 Clifford Geertz 及引領現今社會學研究風潮的法國社會學家 Pierre Bourdieu 皆對該書有所回應，並據之發展出自身關於文化分析的理論。<sup>27</sup>

同樣廣受好評的為 Panofsky 於 1927 年撰成的 *Perspective as Symbolic Form* 一書。<sup>28</sup>Panofsky 為猶太裔德人，二次大戰前遷徙美國，為當時知識

<sup>25</sup> Michael Baxandall, *Painting and Experience in Fifteenth-Century Italy: A Primer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Pictorial Sty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The Limewood Sculptors of Renaissance German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sup>26</sup> 見 Thomas Dacosta Kaufmann, "a response to Visual Culture Questionnaire," *October*, no. 77, pp. 45-48.

<sup>27</sup> 見 Allan Langdale, "Aspects of the Critical Reception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Baxandall's Concept of the Period Eye," pp. 479-97.

<sup>28</sup> Erwin Panofsky, *Perspective as Symbolic Form*, trans. by Christopher S. Wood (New York: Zone Books, 1991).

板塊自歐陸移轉美國之大變動中之一人，其對美國藝術史研究影響之深遠，無人能比。據學者研究，Panofsky 遷美後，或因受到英美學界實證主義的影響，雖有圖像學及圖意學(iconology)研究方法的提出，但較為刻板與狹窄，已不復早年在德國唯心哲學傳統籠罩下的哲學性思辨與宏觀視野。<sup>29</sup>《透視》一書正可顯示 Panofsky 早期在新康德學派哲學家 Ernst Cassirer 啓發下，對於文化象徵形式的思考。<sup>30</sup>該書於 1991 年翻譯成英文，彌補了英語藝術史學界長期以來對於 Panofsky 早年作品的期盼。許多學者在形構視覺文化研究時，也大量引述此書，例如：芝加哥大學專研文本與影像理論的 W. J. T. Mitchell 在提出「圖像轉向」(pictorial turn)此一蓄意與「語言轉向」相區別並標示未來學術研究趨勢的宏大概念時，即以該書為討論重心，引為研究典範。<sup>31</sup>姑不論其所謂的「圖像轉向」是否確曾發生，抑或如其所言，藝術史研究將因而成為學界中心，Panofsky《透視》一書確實為視覺文化研究提出了一條寬闊的康衢，並直接與現今學術界普遍關心的人類認知模式與知識形成等知識論議題相連。

《透視》一書處理西方文藝復興時期二度空間畫面型構出三度空間幻覺的基本原理，也就是統合畫面各元素的透視法，認為該時期發展出來的定點透視，只是人類認知與再現世界之多種方法中的一種，既不比古典時期透視法更接近科學真理或視覺真實，也不是人類社會視覺再現由原始平

<sup>29</sup> 關於圖像學與圖意學，見 Erwin Panofsky, "Iconography and Icon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Renaissance Art," in his *Meaning in Visual Ar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pp. 26-54; *Studies in Iconology: Humanistic Themes in 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2); E. H. Gombrich, "Introduction: Aims and Limits of Iconology," in his *Symbolic Images: Studies in 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 II* (Oxford: Phaidon Press Limited, 1972), pp. 1-25; Keith Moxey, "Panofsky's Concept of 'Iconology' and the Problem of Interpretation in the History of Art," in *New Literary History*, no. 17 (1985-86), pp. 265-74; Brendan Cassidy, ed., *Iconography at the Crossroads*. 關於 Panofsky 的生平與學術，見 Michael Podro, *The Critical Historians of Art*, pp. 178-208; Michael Ann Holly, *Panofsk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Art History*; Christopher S. Wood, "Introduction," in *Perspective as Symbolic Form*, pp. 7-26; Keith Moxey, *The Practice of Theory: Post-Structuralism, Cultural Studies, and Art Histo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65-98.

<sup>30</sup> Panofsky 與 Cassirer 的關係，見 *Panofsk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Art History*, pp. 114-157; Silvia Ferretti, *Cassirer, Panofsky, and Warburg: Symbol, Art, and History*, trans. by Richard Pier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42-60.

<sup>31</sup> W. J. T. Mitchell, *Picture Theory*, pp. 11-24.

面自然而然進化到視覺空間的終極階段。換言之，各種透視法之間，既無進步與否、優劣高下的關係，也不是直線的發展過程或畫作內部理路的必然走向，而是與當時社會文化的其他範疇相關——在此，Panofsky 舉出的，多為哲學、數學或認識論。此一角度將「透視」視為 Cassirer 所謂文化「象徵形式」的一種，與其他如數學等象徵形式，共同表徵著當時的文化。因此，在該書中，Panofsky 所討論的，並不是個別畫家、畫派甚至地區風格或特色，而是表現在各藝術家、各式風格及各種媒材上，更具普遍性的觀看世界、表徵世界的方法。

Panofsky 對於不同類別視覺圖像構成原則的討論，在早一代的德、奧藝術史家著作中已可窺見。學者或謂其承繼 Alois Riegl 傳統，處理所有圖像的形式邏輯與背後的時代推動力；或如 Heinrich Wölfflin，觸及了普遍性的觀看形式，跨越繪畫、雕刻與建築之別。<sup>32</sup>可列為德奧藝術史傳統第二代的 Panofsky 與第一代學者在問學思辨上的傳承，並不意外。此外，出身英國的 Baxandall 在寫作上述專書時，正任教於 Warburg Institute。此一學術機構的前身，為德國第一代藝術史家 Aby Warburg 所建立的研究圖書館，1933 年因德國情勢惡化而轉移至英國。Warburg 接受著名文化史家 Jacob Burckhardt 對於藝術品與時代特質存有密切關係的看法，在尋思文藝復興受容古典藝術之整體時代心理時，早已跨越藝術史學科的樊籬，難以傳統學科區劃加以框限。其後，Warburg Institute 的研究取向與著作出版常見此種跨越學科界限、探究文化議題的傳統，而 Baxandall 的研究，若以文化史相稱，當無疑義。<sup>33</sup>

<sup>32</sup> 見 Christopher Wood, "Introduction," in *Perspective as Symbolic Form*, pp. 7-26. Riegl 的著作見註 22. Wölfflin 最有名的著作為 *The Principles of Art History: The Problem of the Development of Style in Later Art*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60).

<sup>33</sup> 關於 Aby Warburg、Warburg Library 及 Warburg Institute，見 E. H. Gombrich, *Aby Warburg: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London: Warburg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London, 1970); Kurt Forster, "Aby Warburg's History of Art: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Social Mediation of Images," in *Daedalus*, vol. 105, no. 1 (1976), pp. 169-76; Silvia Ferretti, *Cassirer, Panofsky, and Warburg*, pp. 1-80; Carlo Ginzburg, "From Aby Warburg to E. H. Gombrich," in his *Clues, Myths, and the Historical Method*, trans. by John and Anne Tedeschi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17-41; Forster, "Aby Warburg: His Study of Ritual and Art on Two Continents," in *October*, no. 77, pp. 5-20. 第一本書的作者 E. H. Gombrich 雖寫成 Warburg 之學術傳記，並且成為 Warburg Institute 的領導人，但對於 Warburg 式宏大且趨近文化史的藝術史研究並不贊同，見 Silvia Ferretti, "Introduction," pp.

事實上，德奧傳統中的藝術史家，便有許多人自我定位為文化史家，只不過其研究的對象為藝術品或人造物品，而非文字資料記載中的禮俗、思想觀念或文藝風潮。他們希望藉由對於物品或圖像的了解，尋思文化上的重大議題。Warburg 處理各式視覺材料，便很少觸及美學特質問題；他認為，藝術品一如文獻(documents)，顯示了當時諸多的文化訊息。Panofsky 許多著作，包括最具創意與宏圖的《透視》一書便繼承此一傳統。甚至連一向被歸為「形式主義」先鋒的 Riegl 與 Wölfflin 等人，在其以風格分析著稱的著作中，也有宏大的文化藍圖。<sup>34</sup>

在今日的學術風潮下，重新審視藝術史傳統中「視覺」與「文化」的連結，雖不失為藝術史在面對思潮變化時，一個既有傳承又可開創新局的選擇，但此一選擇並非充滿樂觀信念的陽光大道，捨此即無救贖之法。藝術史家在回答 1996 年《十月》「視覺文化」的問卷時，固有極力倡導者，也有懷疑質難者；後者甚至包括學界中頗富名望且具宏觀視野與方法意識的學者，當時任教於耶魯大學的 Thomas Crow，即為一例。<sup>35</sup>今日藝術史學界雖有前述跨學科、議題化及理論化的趨勢，但許多學者對於此趨勢或無力回應，或力圖反擊；新舊交織並陳，正是學科轉變時可以想見的紛紜景象。

以「視覺文化」為例，藝術史家或憂心於傳統中關於藝術品真偽判斷、品質鑑賞與風格傳承等問題將因之而隱晦不彰，或認為「視覺文化」未能正視藝術品在文化中與他種物品不同的特質，或質疑把以視覺為主的當代文化現象投射於十九世紀之前或非西方文化的研究是否合適等等。不過，這些問題並非沒有解決之道。首先，美國藝術史研究已逐漸分化為學院學者與博物館學者，後者環繞具體收藏品之真偽與風格的研究，或可承繼鑑

xi-xix.

- 34 關於德奧傳統藝術史的研究，除前引諸著作外，尙可見 Joan Hart, "Reinterpreting Wölfflin: Neo-Kantianism and Hermeneutics," *Art Journal*, vol. 42, no. 4, pp. 292-300; David Castriota, "Annotator's Introduction and Acknowledgments" and "Introduction," in *Problems of Style*, pp. xxv-xxxiii and 3-13; Christopher S. Wood, "Introduction," in *The Vienna School Reader*, pp. 9-72.
- 35 Thomas Crow 現為位於洛杉磯的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的主持人，著述瞻富，其中 *Painters and Public Life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一書屢獲藝術史學界大獎。其近年之新書 *The Intelligence of Art*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9) 討論藝術史傳統，兼及於人類學的相關論述，可見其學識之廣度。

賞學的傳統，成爲藝術史學界的基石；此外，藝術品的文化位置或美學價值，若視爲不同時空下的歷史問題，則其極具研究價值，殆無疑問。至於第三個問題，則牽涉到研究者個人的史識與處理角度，並非視覺文化研究的獨有難題。即使不談「視覺文化」此一專門領域，久居學術研究邊緣的藝術史，如果要在學院中維持一席之地，必須思考其所生產的知識究竟對其他學科有何意義；而藝術史傳統中的文化史取向，正可提供學術發展所需之思辨向度與視野開展。尤其是臺灣本地的藝術史家，面對藝術史研究長久以來的有限局面，或許比美國藝術史學界更須思考此一問題。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期刊第十期

#### 蘇東啓政治案件專輯

訪問：陳儀深 紀錄：王景玲等 4 人 412 頁 平裝 450 元

蘇東啓政治案件發生於一九六一年即戒嚴時期的雲林縣，軍事檢察官起訴四十七人，覆判的判決書則有五十人涉案，爲首的蘇東啓、張茂鐘、陳庚辛由死刑改判無期徒刑，罪名是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本案是白色恐怖時期少數牽涉臺獨的大案，只因年代距今較久，涉案人出獄後極少成爲政治明星，以致迄今仍不甚受到世人注意。本案受刑人雖有若干人死亡，或無法聯絡，或有要角（陳庚辛）因故拒絕受訪，但透過十九位相關人士的現身說法，已可呈現相當程度的蘇案真相。

---

本刊「研究概況」欄，歡迎讀者撰文介紹各學術機構有關中國近現代史之研究情況，以及對各個研究領域進行回顧與檢討。

---

# 「中國的物質與文化」研究計畫簡介

巫仁恕\*

## 一、緣起與主旨

「物質文化」(material culture)的研究起源甚早，1870 年代美國的人類學與考古學界即以此為名，研究美國印地安人的文化。而歷史學和社會科學界從事這方面文化分析的研究，則是較近的事情。1970 年代中期以後，物質文化的研究蓬勃發展；歷史學方面已從藝術史擴大到社會史的研究，且各種不同的學科也相繼加入了研究的行列，從考古學、人類學到文化地理學、民俗學等學科的加入，使得研究的範圍更為廣泛。也因此，各學科間對「物質文化」的定義頗為分歧，但其所具有的共同點都是要探討物質與人類行為之間的互動，即人類對於「物」背後的文化意涵的體認。實則在人類的歷史中，生活周遭的物質現象，便是呈現人類文化特性的重要管道。透過對物質現象的觀察與探討，不但可以了解人類文明科技發展的歷程，還能加深對各類文明意涵的了解。當今歐美學界在研究「物質文化」方面，利用物質史料與文獻史料相結合，帶來許多新的理論突破與修正，包括對現代化(modernization)、機械化(mechanization)、城市化(urbanization)、消費主義(consumerism)與大眾文化(mass culture)等諸理論與課題。尤其是近年來對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與全球化的探討，漸漸走向物質文明與消費文化的研究趨勢，成為西方歷史學與文化人類學的重要課題。

反觀中國史的研究方面，過去從事物質文化的研究者多是從藝術史的角度出發，至於食、衣、住、行、娛樂等方面的相關研究則較為缺乏。也正因如此，過去歐美學界有關物質文化的宏觀著作中，在提到近代物質文化的發展時，對中國的印象就相當模糊，較少深度的認識。有鑑於此，中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央研究院之明清研究會自 1999 年 6 月，即在近史所熊秉真研究員的聯繫下，成立了「物質文化與日常生活」之讀書會，每月聚集討論、閱讀相關理論或實證性研究，並邀請國內外有共同興趣之學者演講、討論。經過一年半的共同研討，乃有此主題計畫之研擬與提出。

這是一個為期三年的集體研究計畫，目的在集結國內人文、社會學科學者，以中國為例，對「物質與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做一有系統、並具開創性的學術研究。其焦點在探討在中國的歷史、文化、社會中，「物」（包括物件、物品、物產）或「物質」（其質地、條件、環境），如何受人群之價值觀、態度、需要、意圖規範，而人群之文化習慣、歷史趨向、文藝品味等，又如何界定、影響物質面的存在。另一方面，在方法上，希望跨越學科訓練的疆界，並結合物質材料與文獻素材來作探討。最終的目標是企圖釐清歷史上中國日常生活之物質文化發展的特徵，期與世界學術潮流對話；並以自身的角度對當代西方物質文化的全球化潮流，提出深刻的質疑與相互的檢視。

## 二、子計畫介紹

本主題計畫結合國內（包括院內、外）人文（歷史、文學）與社會科學（主要是人類學）界長期以來有共同志趣的學者，分別探索諸如「奇花異果、古玩字畫、礦石毒物、服飾裝扮、童玩童書、戲臺道具、市場物產、古董傢俱」等「物質」，如何與當時「文化」相互勾連與彼此影響。以下分別介紹其中的八個子計畫：

### 1. 盧建榮（中研院史語所）－「奇花異果收集的背後：一個文化史的分析」

唐宋新興的休閒文化之一是奇異花果的收集，它是由花會、花市、花果園林、私人庭院、花飾工藝等物質設施所撐起來的一種文化活動；而花果本身也從自然性物質，一躍而為文化產品或商品，甚至到宋朝還有許多花譜成書。從花的生產到花會的形成，相關的社會經濟設施的發展，是本計畫要探討的主題之一。花果收集行為本身亦有其文化徵候，而且不同時空的文化脈絡及其所屬的物質條件，會使人們對花的品味有所變化。如中古時代隨著佛教文化的普及，而有以蓮花圖案表示企盼永生的飾物；中古

時代貴族相中牡丹花作為其自身的象徵。花進一步也被借喻為女性身體，甚至有「花名冊」和「品花寶鑑」這類對於女性品頭論足的出版物大量湧現。唐宋以來的這種花文化的形成與變遷，從「花譜」書寫中可以看出端倪；而且花譜的刊佈與唐宋花文化的深耕與拓展密切相關，這是本計畫更重要的主題。

## 2. 衣若芬（中研院文哲所）－「集古與玩古：宋人的文物收藏與審美意識」

宋代由於朝廷維護文化傳統與建立典範秩序的政治需求，促成「古器物學」的盛行。文人一方面積極蒐羅文物，同時也作文字及圖繪的記錄。透過筆記叢談，也可窺知當時文人收藏文物的情形、汴京相國寺等地的文物市集，以及稱作「常賣」或「常買」的仲介捐客對於文物流通的影響。雖然收藏古文物可以古為今用，助益於禮樂制度之施行，又達到文房清賞的自娛之樂，但是其中文人收藏文物的心態頗值得發掘與探究。再者，收藏文物也是一種懷古之情的表現。作者希望從文化書寫的角度，體察其間的文化意涵；一方面挖掘文人收藏文物的心態，同時也建構品鑑文物的「古」的美學判準，深入思考「古」的美學品味為何？「古」的意義為何？「古」與「今」的差異？再將之置於「古文運動」、「西崑體」、「詩莊詞媚」的文學脈絡中觀察。如此，想必更可以通盤闡釋宋代文人好古之風的審美意識。

## 3. 張哲嘉（中研院近史所）－「明清『金石毒』的文化構圖」

同一種物品的性質會因觀者所屬的文化建構而異，這點在比較藥學傳統的時候尤其明顯。毒是少數中外藥學共通的概念之一。本研究首先是對中國文化中「毒」的概念做一個完整的鳥瞰，並檢討有毒與無毒之間的界線該怎麼區畫的工作。再者，本計畫將以明清時代煉丹家所使用的金、石毒物為中心，探索中國有關毒之概念內涵、認識角度以及運用方法，並追尋其與其他藥學體系所以有不同意見的原因。分析問題時，預備從醫家和煉丹家對於金丹基本成份、毒性的重大歧見與爭辯切入，尤其要針對他們是如何理解或說明現代認為是金屬中毒的一些可能癥狀進行探討。藉此研究足以勾勒出明清中國與現代科學有關毒物認知上異同的文化構圖，對釐清中國藥學史中有關「毒」這個概念的理論與實踐將有所貢獻，也會為中



外比較藥學開始建立對話的基礎。

#### 4. 林麗月（師範大學歷史系）－「消費與社會秩序：明清奢儉論的文化史考察」

在近半世紀以來的西方資本主義中，消費(consumption)可以說是一種涉及文化符號的社會文化變遷，而不僅僅是一個經濟的過程；尤其至 1980 年代更成為歐美社會學家、社會心理學家、社會理論家熱中的研究主題。反觀有關傳統中國的消費問題，過去的研究大多放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範疇中討論，很少觸及消費型態變遷及其社會意識、文化意涵的分析。Samuel A. Adshead 的研究曾指出，15 世紀以後歐洲物質文化發生巨變的主要動力是消費主義(consumerism)的形成與發展，進而改變與推動了近代歐洲的經濟成長，並斷言傳統中國沒有出現過消費主義，實則忽略了中國自明代中期以降屢禁不絕的奢靡之風。本計畫擬試闢新徑，以消費與社會秩序(social order)的關係為核心，就明清間（15-18 世紀）奢儉議論反映的消費型態與社會意識之變遷作文化史的分析。希望透過明清間各種正統與非正統的奢儉論作觀察，並由此分析「個人」、「物質」（金錢與消費品等）與「社會」三者的交互作用，以釐清明清奢儉論內蘊的消費文化與時代意義。

#### 5. 熊秉真（中研院近史所）－「近世中國的遊戲文化與兒童玩具」

無論從「依文游藝」的儒家傳統文化觀或「民生育樂」的現代社會哲學角度考慮，一個社會的娛樂和遊戲文化都是其社會生活中關鍵的一環，在調節社會生態、抒解個人心理、滿足群體需要上，扮演著不可或缺的功能，從而亦反映出該時該地某些核心的價值觀，並透露出該人群生存狀態之一斑。本計畫將以三年為期，先建立起中國娛樂遊戲史之大脈絡，並以此為座標，研究兒童遊戲與兒童玩具在近世的歷史與文化發展。先從幼齡人口的娛樂生活、遊戲文化與玩具器用入手，以明中國文化中對人生階段之基本分期（幼兒為何有遊樂時間之理論基礎）。而研究重心放在明清社會中遊戲之各種類型，對遊玩之道德規範、價值取向，與性質界定（如何方是為玩或正確的遊戲、有益的玩具）。再從一般家庭中自製玩具與南北玩具市場中所見的娛樂商品化與兒童用品的市場化傾向，進而探討兒童遊戲與玩具中所見之地域、性別、階級差異。

## 6. 王瓊玲（中研院文哲所）－「品味與技藝：清代戲曲藝術之專業發展與物質文化」

中國戲曲發展至清初順、康時期，劇壇上出現了脈絡清晰的三個戲曲發展動向：其一，民間職業戲班取代了家庭戲班，成為主要的演出方式；其二，競演新戲取代了搬演舊戲，成為劇壇的主導風尚；其三，職業劇作家成為主要的戲曲創作隊伍。這三大戲劇發展動向，強有力地促進了戲曲藝術專業化的蓬勃發展。戲曲藝術的專業化發展，除了力求理論層面的系統性與完整性，還須在劇本創作、穿扮道具、舞臺音響、舞臺表演、劇目選擇、舞臺美術、劇場設備等各方面，突出「商品性」、「技術性」與「娛樂性」等大眾審美文化的基本特徵，其所牽涉的包括了文化消費市場的檢驗與制約、審美產品的可複製性與程式化，以及審美需求的滿足等問題。這樣的關聯性，恰恰呈顯了戲曲藝術發展的專業化與當時的物質文化產生互動。本計畫擬針對戲劇藝術之文化場域中從事創作戲曲、演出、觀賞與閱讀活動相關之「人」（如劇作家、劇論家、演員、樂師、觀眾、評點家、出版商等）與關涉藝術發展的「物質構成」／「物質條件」／「物質環境」（如劇作、腳本、舞臺、劇場、職業戲班、藝術市場等）之間的互動展開研究。

## 7. 邱澎生（中研院史語所）－「從閱讀商書到參展博覽會：明清商業知識中的『物』產」

1866年，清朝政府首次接受邀請，參加在巴黎舉行的「萬國博覽會」，正式開啓了中國商人代表國家赴外國參展「商品」的歷史。對商人而言，將商品帶到外國參展，不僅面臨如何為國家爭取榮譽的問題，其實也考驗著自己既有的「商業知識」是否足夠。在此之前，明清商人早已累積了許多有關「物產」的商業知識，並透過個人親歷、店主傳授、親友間的口耳相傳，以及商人閱讀書坊出版的各種商業手冊，豐富了明清商人的整體商業知識積累。本計畫要問的是，當商人由閱讀商業手冊到實際參加博覽會，究竟中國的商業知識發生了何種轉變？特別是商人取得各種「物產」訊息方式發生了何種轉變？進一步要問的是：當取得與分析「物產」訊息方式發生轉變時，商人對「物產」的價值觀是否也連帶出現有意義的變化？作者將透過明清商書與博覽會兩類建構商業知識的不同表現方式，釐清其中反映的「看待、認識乃至呈現」外在物質世界的「認知方式」之轉變。

這對伴隨明清經濟發展而出現的某種「市場認知」，可以提出一些有用的觀察與說明。

### 8. 余舜德（中研院民族所）－「物質文化與現代性的建構」

從物質文化的角度來探討現代性的課題，為人類學近年來逐漸受到注意的研究。這些研究明白地說明著物質文化、歷史的記憶，與史觀的建構之間，蘊含著複雜但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作者擬從「社會對古、今的定位而建構之歷史意識」的方向來定義現代性，而本項研究計畫即是從物質文化的面向來探討中國社會現代性的建構。一方面可以有助於深入瞭解中國物質文化的特色；另一方面，探討中國物質文化的特色是否是史觀建構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本計畫將採取人類學民族誌研究的取向，從田野參與觀察的方式，來研究現代中國社會如何在使用日常生活的器物中，經由物的累積與具體經驗這些器物的物質面及文化面，共同建構他們對時間、歷史的認識，尤其是他們對「現在」與「過去」的區辨、對當今生活之時代和社群的想像、一個共同之時代認同的塑造，與對歷史發展節奏之建構。本計畫選擇大陸山西省平遙縣縣城及梁村做為田野研究的地點，並從衣物、室內裝飾物及日常實用器物，與建築材料等三類「物」的研究開始進行。

## 三、總、子計畫的共通問題

首先，本計畫關切的重心在於物質與文化關係的釐清，即物(objects, things)、物產、物品(products)、物質(materiality)與文化的關係、概念、屬性、文化符號的關係等。而具體物質與文化發展關係的探討，則需透過子計畫的相互整合。

例如在人與物的關係方面，子計畫中有林麗月〈消費與社會秩序：明清奢儉論的文化史考察〉論及態度與價值的問題；邱澎生〈從閱讀商書到參展博覽會：明清商業知識中的物產〉論述商業活動、市場經濟商品化與消費文化之間的脈絡關係；王瓊玲的〈品味與技藝：清代戲曲藝術之專業發展與物質文化〉、衣若芬〈集古與玩古：宋人的文物收藏與審美意識〉均對審美與物質發展的關係，以及個人品味與物質消費的關係作了深入的分析；而熊秉真〈近世中國的遊戲文化與兒童玩具〉則討論倫理與物質發

展的關係等。

就時空而言，本主題計畫涵蓋甚廣。在時間變化與物質的關係方面，各計畫涵括時間由隋唐、宋、明清以迄現代；其中，有五個子計畫以明清為範圍，因此明清可說是本主題計畫的時間主體。在地域與物質的關係方面，則多以江南為觀察對象，也有以華北、臺灣為對象的。

至於各子計畫所關切的共同問題均包含現代性與普遍性等議題，亦即：物質與文化的關係或現象是否呈直線式的歷史發展？是全球普遍性或是特殊區域性現象？諸如此類綜合性的共同議題，有待各個成員的不斷討論、長期交流，朝深度整合再做努力，從而展現出不同學科對於中國的物質與文化錯綜複雜的研究，在成果上的豐富性與研究上的長處。

#### 四、總結

未來還將有多位國外學者加入本計畫，如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萬志英(Richard von Glahn)教授將以「明清時代的貨幣、市場，與物質文化」(Money, the Market,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Ming-Qing China)為題，探討16至19世紀以來中國使用貨幣的變化。他不但視之為經濟現象，也認為這是一種文化現象。作者嘗試由文化的角度來作解釋，並注意使用貨幣時的地域差異，以體現出不同地區之市場文化(market culture)的特性。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奚若谷(Stephen H. West)教授亦為此主題計畫所吸引，並擬探討宋元明時期因為商業化與城市化之後，所造成一般民眾心態的變遷。諸如對財物的焦慮、恐懼，以及在戲曲中充斥的暴力，都反映了社會結構與社會關係之變化等問題。上海社會科學院的熊月之教授則擬以「世風流變：從明清江南到近代上海」為題，打通明清與近代的界限，將上海城市放在整個江南範圍裡，來考察社會風氣的流變，從而說明歷史發展的連續性與非連續性的問題，以及物質與文化的關聯。

經過五年以上有組織的團隊工作（包括準備期及計畫執行間之三年），本計畫預期對此中國人文社會學科上的新興研究主題，發生重要的推動、拓展之力；同時提出有系統的見解，對「中國的物質文化」之研究議題，在研究概念、方法及發現上均將提出關鍵性成果。



## 帳摺與水牌 ——傳統商販擴大信用之拓銷工具

王爾敏\*

我在民國五十七及五十八年(1968-1969)間在美國夏威夷居住一年，當時見到那裡的大百貨公司 Sears 已在招攬顧客掛帳賒欠。這是美國使用信用卡的前身。很快，信用卡的使用，就在十數年以後風行全世界。好像這都是世上的新事物，其實在中國早已是數百年來使用的老法子。這裡打算介紹明清庶民社會中普遍流行的掛帳工具：帳摺與水牌。

首先介紹帳摺。中國紙張發明以後，書籍圖畫的保存，長期保持「卷子」形式。惟自唐末五代發明雕板術印刷書籍佛經，自然改進至於冊頁裝訂。於是除了巨幅圖畫仍保持「卷子」的形式，其佛經書籍已大部改成冊頁裝訂形式。

印刷術在普遍發展流通之後，其附帶的裝訂裝套技術，也日漸進步，更加講究耐久、方便、美觀。而僧尼日日念誦佛經，一向敬慎於經卷的保存，減少使用時的翻閱污損，因是而將各類佛經以厚頁紙張裱裝成摺子形式。若《金剛經》、《心經》、《華嚴經》、《妙法蓮華經》各形各類日常習誦的佛經，每種均使之裱裝成摺子形式，每在誦經之時，以長條光滑細竹籤自摺子下面挑翻經頁，以避傷損佛經寶卷。尤其當女尼被邀赴俗家內宅宣講寶卷時，此等佛經摺子（正確的版本學名詞稱為「梵夾裝」或「佛摺裝」），每每俱用黃綾包裹，十分珍視，宣卷之時，輕輕打開，然後逐頁宣講。一般情況，有念有唱，並有解說。而女尼較常行者，多是熟記寶卷，只唱不說，並不展閱摺子，全靠熟記。是以佛經摺子形式，一直使用至抗日戰爭時期。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摺子形式之文書，最鄭重的使用機會是清朝一代的奏牘形式，大臣全用摺子上呈其各種公務報告，施政條議、戰陣進止、民情訪察，以至彈劾官吏、整飭治安，俱必須書寫在摺子上，並須敬慎焚香拜摺，然後由驛傳報呈京中。此一體制，直沿用至清末。

摺子既經創生，其用途即被廣泛擴展，不儘限於莊嚴典重的佛經和書法碑版的存藏，也不限於官家專用的奏摺。其氾濫發展，很快被平民社會吸收。首要的民間用途，是元明時代民間傳抄戲曲的本事與唱段。摺子尺寸本來有限，既被縮小，紙張裝裱亦不求精美，只重在小而實用，攜帶方便。佛經摺子本來即有長短限度，難以成厚大巨摺，其大者長不過一尺二寸，寬不過四寸，一冊摺本，亦不能達於百頁以上。而小型摺雖俱用小字書寫，亦無法保持過大過長。長不過三寸，寬不過寸半，其冊頁亦不會達於五十頁。由是任何一齣戲劇，必至分抄多冊摺本。此種摺本形式就是民間戲曲傳衍發展的寶藏。不但戲曲用摺本保存，民間流行的種種小調曲子，也是多用摺子傳抄。其方式直沿革至抗日戰前。

摺子的通俗應用，除傳抄戲曲本子之外，其用途最廣者則為市井商販的立摺記帳。這方面的前代資料由於只是暫時行用的瑣屑鄙物，多已毀棄無存，經過抗戰之社會巨變，世人實已難見任何遺物。文字遺獻亦絕無正面載述。我在幼少親見家族長輩使用，並亦常見其各類實質帳摺之大小型制。學界同道建言提具一些式樣，真品難於展示，但可在此簡要描述。但凡帳摺俱不出三寸長度，寸半寬度。外有厚紙摺套，多用小格圖案花紙作套，正中貼一長方大紅籤，開摺即寫明「某某寶號取貨往來摺」或「某堂某記取貨往來摺」。內摺紙不出三十頁，首頁題記與摺套同。翻過首頁，第二頁起即由商家起寫「大清光緒某年某月吉日立」字樣，旁書商家字號，一般不加印記，即視為有效，主顧家人即可憑摺到店選購物品。關於明清時代是否已有帳摺，坦白說，實難找到文字記載。《金瓶梅》書中敘及西門慶經營商號，時常派遣僕人來往到其他商號提貨，並亦遣人到各處收銀。自可見彼此一定設有經常來往帳冊，但不知是否使用帳摺。本人注意到香港處士翁仕朝家人所遺存大批帳簿，但卻未見任何帳摺。即使這些大批帳簿，翁氏遺存價值有限，因其並非商家，故其帳簿俱不過是流水帳。曾見日本長崎華商帳簿影本，其參考價值極高，然亦未見帳摺。

中國商業變遷，春秋戰國已十分發達，而自漢代王朝厲行輕商政策，嗣後歷代因襲相承，多行重農抑商之政，故在中國社會，二千年來，商學

最無發展，始終令其自生自滅。於齊民中，商人居最下，備受輕視薄待。雖然如此，社會需要，終不可缺少商人。商學雖不發達，而商人可以累積經驗。對於帳簿的使用，自亦達於複雜多樣之境地。

中國大型商號，行商坐賈，全不使用帳摺，而以大型帳簿為主，並分別各樣不同用途的帳簿；雖是空白紙張，而封面裝訂十分精緻，以雙股白絲線穿裝，封皮一般用藍色厚紙，並貼大紅籤條，用以標注立帳名稱。如「股東本利帳」、「銀錢往來帳」、「辦貨出入帳」、「商號專戶帳」、「倉儲出入帳」以及「日用流水帳」等，是一般中等商家均不可或缺者，惟俱不用帳摺。不過有一樣用摺子機會，是大商號的股東合同，必須用大紅摺帖書寫，訂定吉日，股東聚會，各取得股東合同。一般將紅利滾入本金，因是必須年年改換。

市井小商販，一般仍用帳簿，但以「流水帳」為主，已足備生意買賣記注。不過同時並用帳摺，此種帳摺最大者不及佛經摺本四分之一，其小者不及佛摺八分之一。一般必用摺套，套面加貼紅籤，可以添寫用途名稱。

市井商販為甚麼在帳簿之外要用帳摺？而且大量使用？這就是本之於拓銷宗旨，兼以鞏固顧客的長期購買。帳摺的使用，是對老顧客每戶立摺，一摺一戶。雖然每戶立摺，摺上一定不能用人名區別，此是社會習慣，沒有人願意把姓名開在帳摺上。每戶一摺，俱是開明堂號。如果大姓富戶，一個堂號又有若干分房獨立之戶，例如「六桂堂翁記」、「六桂堂汪記」、「三槐堂長房」、「三槐堂五房」等等堂號標示摺籤，以為專摺。如無堂號，則又有各種特用專字區別，或用「福記」、「喜記」、「壽記」、「字記」、「宙記」等等示別，但必出自於顧客自行選擇專戶，並長久使用。就我個人閱讀資料所知，盛宣懷自己一戶的私帳記注，不用堂號，是用「雨記」。這些作法的宗旨，全在於保障個人隱私，其性質與今日之密碼異曲同工。

有那些商家發行長期買賣來往帳摺？中國傳統商販並無一定限界，一般而言，自然有相當資本與豐足貨源者，為拉攏顧客，而發行長期賒欠之帳摺。一般商家結算帳摺的定規，一年之中，是定在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和冬至日之前的十來天，屆時必派專人到各客戶住宅收帳。一般社會習慣，也必是到期結清。此是社會共識。

至於在一般市井習慣，那些商家會發行帳摺？大致而言，有綢緞莊、布商、油坊、酒坊、醬園、醋坊、餅乾糖果店、雜貨店等。平時向這些商

店購物，只須帶摺前來，選妥貨品，立即算好市價記入帳摺，即可完成交易。而油坊、酒坊、醋坊，是定時送貨到家，再將日期貨價記入帳摺。

此一帳摺工具，往往只流通於大城市，而多不能逾越至其他城市，故而發行量有限。但絕對不會發生逃債賴帳之事。在銀錢來往上而言，只是小量銀錢開支，顧客有力清償，一年有數次結算，亦不至累積較大欠項，是以市井商賈，樂於廣結顧客，長期保持穩定收益。

這裡再進而探討一下水牌。平民社區中水牌的應用是不同工具，而和帳摺有相同功用。這裡指出庶民社會中小商販使用水牌的特色。可以分條開寫如次：

其一，水牌的使用廣行於貧窮小民居住地區。但其效用更遍及於城市任何角落，更及於僻鄉小村，帳摺所不能達之地。

其二，水牌不適用於較大商號，通常只有小雜貨店、小販貨攤、小糖果攤。是一種最零星、最窮促、最簡陋的除欠工具。每家商號的除欠網不會超過一條街巷、一個小村落。也就是關係網絡極小，資本負荷極低。除欠帳戶有窮有富，但俱必十分相熟識。

其三，水牌只是雜貨店所備的一塊白漆木板，其大小相當於學校上課黑板的四分之一左右。所有往來除欠帳戶，一概寫在水牌上面，並無一定次序，但每戶要佔一行或兩行，名下記載何日購何物錢若干。同樣是蘇州碼記帳。由於是白色漆板，故俱用黑色筆記帳。顧客清還舊欠，帳目用水布擦去，故稱之為水牌。

其四，如前所述，一般使用水牌者均為小商販，絕無大商號，故是最簡陋的除欠工具。實際水牌之制，民間使用更為普遍，比之帳摺，用處更廣。無論大城小村，到處可見。其生意最大者主要為雜貨店，其顧客不出一街一村。而小型者最多為香煙水旱煙攤子、糖果花生攤子，其顧客不出一巷一街。至於其他行業，若魚販、肉販、雞鴨販、菜販、各樣小吃攤子，是不用水牌，不作除欠的。

其五，水牌和帳摺的顧客少有同品。原因在於水牌顧客多屬貧窮細民；另一原因是水牌記帳天天懸掛壁上，來往客人俱可一目了然，稍有零錢可使者，多不願把名字掛在水牌上。不過小民名字也並非記其大名，而多數記其別名、外號。如水牌記帳陳麻子打酒半斤，二十文；二黑驢香油二斤、大鹽半斤、醋一斤，貳佰捌拾文；張二禿洋煙一包、洋火一盒，二十二文。此是一般寫法，更有混蟲、鐵蛋、羅鍋、癩子、大牙、大嘴、娃



子、鬍子、癩皮等名號。例如劉大牙是紙店掌櫃，何大嘴是地方拳師，水牌上是不可以寫出其姓氏的，這必須隱諱，以免顧客喪失顏面。小商販帳目清楚，絕不會弄錯人。水牌天天懸掛，名下一行，可逐項添寫。除非用水洗去，實是天天舉目可見。還錢之後即會當面擦拭乾淨。

其六，水牌之制對於小商販很重要，對於貧苦之人，特別是長工、短工，在消費上更見重要。這些人平時很難有現錢使用，而到收麥、收雜糧兩季，正是清還欠帳之時。還帳雖然仍歸於手中是否缺錢，卻降低在錢財足用之時一夜消解於賭局之中，為此更減少許多糾紛。

綜觀前代平民社會中的生意經營，在中國農業基礎上發展出一些交易手法，多數表現在全面財力拮据。商人亦難致巨富，然亦用盡心力，開拓銷路，自謀立足，亦有助於社群之融熙安和。而商販與客戶間之相互信任依賴，即在帳摺與水牌的工具上，見出其維繫長久的良善結果。

中華民國九十年六月三日

寫於臺北善刀書屋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43)

#### 水竹居主人日記(三)(四)

作者：張麗俊 (三) 463 頁 精裝 550 元 平裝 500 元  
 解讀：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 (四) 424 頁 精裝 500 元 平裝 450 元

《水竹居主人日記》是豐原下南坑人張麗俊所寫的日記，日記以工整楷書，詳載日本時期豐原的民生、社會種種，時間長達二十八年。藉由本書可閱讀到當時商社經營、人際悲歡、臺灣禮俗及張家的家族史等第一手資料，是研究二十世紀前半臺灣社會變遷重要的史料。(一)、(二)兩冊已於 2000 年 11 月出版。

# 抗戰時期救護總隊外籍醫護人員名單考證

張建偉\*

抗戰對於中國人來說，通常意味著一場民族存亡的聖戰。中國在被侵略的期間，曾獲得許多外國政府乃至民間友人的同情與援助。關於這個部分，目前的研究成果仍屬有限，這是因為許多史料仍有待發掘和釐清的緣故。本文即擬整理介紹抗戰時期救護總隊的外籍醫護人員名單，以提供研究者作為參考。

中國自古對於軍醫並不重視，這可能主要跟中醫的外科技術始終不發達有若干關聯。及近代西醫傳入中國以後，隨著新式軍隊的籌建，新式軍醫的建置雖有所萌芽，但與戰爭實際需要仍有很大距離，故其間少數民間組織如中國紅十字會乃能應時而起，有所貢獻。抗戰爆發以後，對於戰地醫護人員的需要激增，但由於當時中國合格醫護人員包括軍醫人數原本就不多，願意長期投入戰地醫療工作的人更是有限，部分有識之士如劉瑞恆、林可勝等人乃著手結合政府與民間資源，籌組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以建立新的戰地救護體系。

與此同時，也就是抗戰初期，也曾有部分外籍人士，來華參與戰地救護工作，例如民國 27 年初德國紅十字會派遣醫生和包紮專家共 4 人，攜帶 40 卡車，價值國幣約 50 萬元的醫療用品來華，協助中國紅十字會的救護工作，在工作將近 4 個月後才離華返國。<sup>1</sup>又如同年印度國大黨曾派出 5 人救護隊連同醫療物資 54 箱、救護車 1 輛至各戰區提供協助，但為期也不過數月，隨即轉往解放區工作。<sup>2</sup>就連國聯派出的防疫隊也只工作至民

---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博士，中央研究院博士後研究人員

<sup>1</sup> 其中一人正是當時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之子，〈會訊〉，《中國紅十字會月刊》，期 35（1938 年 5 月），頁 30-31。

<sup>2</sup> 這 5 人後來一直在解放區工作，但經歷略有不同，其中 3 人於 1939-1940 年返回印度，其餘諸人中，巴蘇華(Bejoy Kumar Basu)於 1940 年後轉向在前線拍照、為中共宣傳等工作，於 1943 年返國；柯棣華(Dwarkanath S. Kotnis)則娶了中國女子為妻，加入中國共產黨，於 1942 年在河北因積勞成疾病死。沈慶林，《中國抗戰時期的國際援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頁 279-280。

國 27 年左右，此後僅有少數人員仍持續留在中國工作。<sup>3</sup>其餘外籍傳教士或相關人士在抗戰期間來華從事救護工作的個案應仍有不少，但人數有限、事蹟難明，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實仍有待深入的探索。

在來華的外籍人士中，人數最多，工作時間最長，可能也是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要算是前述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中的外籍醫護人員了。這些外國友人因其部分成員特殊的經歷，而被稱做「西班牙大夫」。

原來在西班牙內戰(1936-1939)期間，這些醫護人員由於反對法西斯主義、同情共和政權、主張國際主義或者左傾的緣故，乃志願參與戰地救護工作。等到內戰結束，這些醫護人員被關押在法國境內的集中營，其後，於 1938 至 1939 年間，通過在倫敦的英國援華會安排，獲得國民政府同意核發簽證，乃分別由海路來華，經香港轉入內地，進入救護總隊工作。這些有西班牙內戰經驗的所謂西班牙大夫，大都是猶太人，大部分有專業醫學背景和戰地救護的工作經驗，可能也有特定的政治理念。不論如何，他們選擇中國戰場作為獻身的所在，忍受微薄的薪資和惡劣的物質環境，大部分人堅守工作崗位，直到抗戰勝利，少部分人甚至死在中國。

過去較少人注意到這批外籍醫護人員的存在，對於其確實人數也未有定論。大陸方面較早公佈的名單僅有 21 名，但根據綜合各方史料的考證顯示，截至 1941 年為止，救護總隊共有 32 名外籍醫護人員，詳如下表：

姓名	中文譯名	性別	年齡	國籍	學歷	職務	駐地	備註
Flato, Szmuel-Moysze	傅拉都	男	31	波蘭	University of Paris	衛生勤務指導員	貴陽	*
Kaneti, Ianto	甘揚道	男	31	保加利亞	University of Sofia	衛生勤務指導員	貴陽	*
Kriegel, Franz	柯理格	男	33	波蘭	University of Prague	衛生勤務指導員	貴陽	*
Baer, Herbert	貝爾	男	43	德國	University of Berlin	第 8 中隊長兼衛生勤務指導員	蒙自	*

<sup>3</sup> 張力，《國際合作在中國——國際聯盟角色的考察，1919-1946》（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頁 99-127。

Becker, Rolf	白樂夫	男	34	西班牙	University of Hamburg	第 11 中隊長兼衛生勤務指導員	老河口	*
Mamlok, Erick	孟樂克	男	28	德國	University of Basle	第 82 隊長	衡陽	
Dohan, Paul	杜翰	男	29	奧地利	University of Vienna	第 121 隊長	陝州	
Iancu, David	楊固	男	31	羅馬尼亞	University of Yassy	第 151 隊長	蒙自	*
Freudmann, Walter	富華德	男	30	奧地利	University of Vienna	第 171 隊長	田東	*
Volkine, Alexander	何樂經	男	34	俄國	University of Strasbourg	第 172 隊長	芷村	*
Marcus, Edith	馬綺迪	女	32	德國	University of Beograd	第 322 隊醫師	湘潭	*
Kransdorf, Jacob	柯讓道	男	37	羅馬尼亞	University of Bologna	第 383 隊長	樂昌	*
Kransdorf, Gisela	柯芝蘭	女	36	羅馬尼亞		本部服務員派 383 隊工作	樂昌	*
Taubenfligel, Wictor	陶維德	男	32	波蘭	University of Padova	第 432 隊長	建水	*
Kamienecka, Leon	甘理安	男	29	波蘭	University of Nancy	第 571 隊長	宜昌	*
Kamienecka, Maria	甘曼妮	女	28	波蘭	University of Nancy	本部檢驗技士派第三中隊工作	宜昌	*
Schoen, George	沈恩	男	29	匈牙利	University of Bologna	第 573 隊長	宜昌	*
Kent, Henryk	肯德	男	32	奧地利	University of Vienna	第 731 隊長	安鄉	*
Wantoch	王道	男	28	德國	University of Vienna	第一大隊部醫師	襄城	*
Jungermann, Wolf	戎格曼	男	32	波蘭	University of Beograd	衛生勤務視導員兼第七中隊長	曲江	*

Kisch, Frederik	紀瑞德	男	47	捷克	University of Prague	本部醫師 派 322 隊 工作	湘潭	*
Coutelle, Carl	顧泰爾	男	33	德國	University of Freiburg	本部醫師	貴陽	*
Courtney, Barara Guy	高田宜	女	30	英國	London School of Medicine for Woman	本部醫師	貴陽	
Wantoch, Susanne	王蘇珊	女	29	德國	Reagymnasim, Vienna	第一大隊部 醫務助理	襄城	
Sullivan, Michael	蘇利文	男	24	英國	Cambridge University		貴陽	
Mann, Wilhelm	孟威廉	男	23	德國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材料總庫 化驗員	貴陽	
Ayres, Karl G.	艾逸士	男	63	美國	Ohio Northern University	材料股藥 劑師	貴陽	
Staniforth, Joan	唐莉華	女	26	英國	London University	幹事室英 文秘書	貴陽	
Bryson, Arthur Frank	貝雅德	男	31	英國	Cambridge University	外科指導 員	吉安	
Hall, Katherine	何明清	女	45	紐西蘭	The Lady's College	護士		
Jenson, Fritz	嚴斐德	男	37	奧地利	University of Vienna			*
Lujie, Walter		男	50	德國	University of Freiburg			

備註：有\*號者為目前確認曾至西班牙戰地工作者。

資料來源：貴州省檔案館藏救護總隊檔案卷 2530；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中國紅十字會檔案卷 535；〈國際援華醫療隊名單〉，《貴陽文史資料》，輯 22，頁 36-37。

由這份名單可以得知救護總隊最多時共有 32 名外籍醫護人員，其中 7 名為女性，25 名男性；其中共有三對夫妻，分別是柯讓道與柯芝蘭、甘理安與甘曼妮、王道與王蘇珊。而柯芝蘭、王道、高田宜三人於抗戰勝利

前病逝於中國，<sup>4</sup>主要是因為從事防疫工作時遭到感染或積勞成疾而死。如前所述，他們大部分為猶太裔，依其所持護照統計，德國籍最多 8 人，波蘭 6 人，奧地利、英國均為 4 人，羅馬尼亞 3 人，保加利亞、捷克、匈牙利、俄國、西班牙、美國、紐西蘭等各 1 人。年齡分佈較為年輕，50 歲以上只有 2 人，40-59 歲 3 人，30-39 歲 17 人，20-29 歲 10 人。在學歷上幾乎全部都是大學醫科以上畢業，且大部分都有實際戰地救護工作經驗，從學經歷上看，堪稱菁英。而其中許多人都是親臨戰地第一線從事醫療救護工作，或者從事各種衛生勤務、醫療技術的實地演練與示範教學，在救護總隊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對於整個戰地救護工作提供了很大的貢獻。

這些外籍醫護人員在救護總隊的工作，到 1941 年時有了一些變化。當時，總隊長林可勝由於總會的猜忌與親共的傳言，而被迫去職，隨後林氏即前往遠征軍工作。原本林氏計畫將這些外籍醫護人員除了女性外，全數隨其遷往印度，但這項構想後來並未完全實現，雖知有部分人隨其前往，但大多數人似仍留在救護總隊工作，直至抗戰勝利為止。

這份名單人數與大陸方面所公佈的有很大的距離，部分原因可能是史料零散，蒐集不易。此外，大陸方面可能對於公佈其中親共甚至本身就會加入共黨的外籍醫護人員較感興趣。事實上，就本文所提出的名單可知，固然有西班牙內戰經驗者佔大多數，但不可諱言的是，部分人士自有其不同的背景。因此，把他們統稱為西班牙大夫或者國際援華醫療隊，不但在國籍上不符，在經歷上也不能涵蓋全數。

比如，表中的貝雅德便是在中國出生，出身於英國傳教士家庭，劍橋大學畢業，1935-1939 年間曾在倫敦、曼徹斯特等地醫院擔任駐院醫師，於 1939 年中經華中萬國紅十字會的介紹，進入救護總隊任職。又如孟威廉，德國籍，德國海德堡大學畢業，曾在漢堡等地實驗室工作，後於 1939 年經由德籍化學師蘭度雅(Landauer)的介紹，於 1 月 16 日進入救護總隊材料庫擔任化驗員。<sup>5</sup>此外如蘇利文、唐莉華、何明清、艾逸士等人，似均與西班牙戰爭沒有關聯。事實上，如果考量到林可勝與英美醫界的深厚淵源，就可以理解這批外籍醫師來源多元的由來了。

<sup>4</sup> 其中王道葬在重慶，高田宜葬在貴陽圖雲關，柯芝蘭則可能葬在昆明。

<sup>5</sup> 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藏，《中國紅十字會檔案》，頁 476-533。

從政治正確與否來決定敘述的重點，其實是相當無聊的事。固然，許多外籍醫師可能是在某些政治信仰的驅使下，遠渡重洋前來中國，協助中國抵抗侵略，但這並不代表其他的政治乃至宗教信仰就不會驅使另外一批人做出同樣的行為。抗戰爆發後，中國受到國際間廣泛的同情，可以從當時由各種管道湧入的外援得到證明。而救護總隊的外籍醫護人員，可說是抗戰時期中國所獲國際援助當中非常值得稱道的一部分，因為他們確是身體力行的加入了中國抗戰的行列。吾人儘可讚嘆其貫徹理想的真誠可貴，或其對中國的真摯友誼，卻無須取此去彼，畸輕畸重。更何況，除了救護總隊之外，還有不少外籍傳教士和個人，在抗戰時期中國的許多角落（包括解放區），為中國軍民奉獻青春心力乃至生命，這些人、這些事，如果我們能從人道主義的角度來加以觀察，豈不是更有意義嗎？

總之，抗戰時期外籍醫護人員是過去較為學界忽略的研究課題。本文所考證出的這份名單，僅僅是拋磚引玉，希望海內外學者或相關團體、個人可以因而對這個課題加以留心，並且發掘更多的新史料，甚至引發更多的討論。事實上，這裏面有許多問題仍待進一步深入的解釋，比如猶太裔醫護人員來華協助救護的背景、中外醫界菁英共事所衍生的文化歧異問題，或這些醫護人員在其本國的相關經歷、他們的中國經驗所產生的影響等等；希望這份名單的考證可以是一個好的開始。

---

本通訊歡迎世界各地學者，撰文介紹各該地區近代中國史研究情形、出版狀況、會議消息，及傑出學人之貢獻，以廣學術交流。

---

# 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近年來進行檔案 數位化工作概要

莊樹華\*

## 一、檔案數位化計畫簡介

近年來由於影像數位化技術之成熟，檔案的數位典藏已逐漸取代微縮影片，成為檔案典藏單位製作複本的主要方法。除了避免原件或因天然災害、或因過度使用而毀損，故需製作數位化複件外，檔案典藏單位更希望透過網路的傳輸及影像利用的權限控制，節省管理檔案的人力，並透過標準化的後設資料(Metadata)訂定，促進館際之間的聯合檢索或交流，也方便利用。此外，國家檔案法規定，凡屬政府機關永久保存的檔案，應移轉國家檔案局集中管理，屆時近史所檔案館所藏的政府檔案有可能必須移轉由國家檔案局保管。而在該局成立之初，應無足夠的人力、物力及時對重要的檔案進行數位化影像之製作。若在檔案移轉前，原藏單位能將重要檔案予以數位典藏，對學術界的利用及未來國家檔案局的運作均有重大幫助。

近史所檔案館自 1997 年即開始進行「戰後臺灣經濟發展檔案數位化」的工作，迄今完成或正在進行的計畫如下表：

近史所檔案館檔案數位化計畫表

計畫名稱	檔案內容	計畫執行單位	計畫時間	備註
戰後臺灣經濟發展 檔案數位化計畫	行政院經濟安定 委員會(1953-1958)	中研院近史所	86.6-86.9	已完成
	行政院美援運用 委員會(1948-1963)	中研院近史所	86.3-86.9	已完成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編審



	臺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1949-1953)	近史所、經濟所、臺灣省文獻會	86.6-86.8	已完成，檔案藏於臺灣省文獻會
	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1954-1968)	近史所、經濟所	86.6-86.8	已完成，資料藏於臺灣省議會圖書館
大陸時期實業部、經濟部商業司檔案數位化計畫	大陸時期商業司公司、會計人員、出國人員登記卷	近史所	87.7-90.12	進行中
李國鼎先生個人資料數位化計畫	李國鼎先生個人資料、照片、文物	近史所、經濟所、中央大學	86.9-91.6	進行中
臺灣總督府及相關機構公文類纂、專賣局檔案整理計畫	臺灣總督府及相關機構公文類纂、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公文類纂	近史所、經濟所、臺史所、社科所、臺灣省文獻會	86.7-91.12	進行中，檔案藏於臺灣省文獻會
近代外交經濟重要檔案數位典藏計畫	外交檔案、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檔案	近史所	90.1-95.12	進行中，為國家數位典藏計畫的一部分

茲將各計畫原委及進行概況簡述如下：

### (一) 戰後臺灣經濟發展檔案數位化計畫

1996年11月中央研究院為協助人文社會科學各所同仁之研究需要，促進院方瞭解且正視檔案資料之重要性，成立「檔案資料協調委員會」（以下簡稱協調會）。1997年協調會編列第一年經費，近史所除向協調會提出「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檔案數位化計畫外，另與經濟所合提整理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以下稱省文獻會）所藏「臺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檔案」，並製成數位化影像。生管會檔案於該年5月提早完成，多餘人力及經費轉往整理臺灣省議會圖書館所藏「外匯貿易審

議委員會會議記錄」，並製作成數位影像。此二批檔案再結合近史所館藏之經安會、美援會檔案作成「戰後臺灣經濟發展聯合檢索資料庫」。該資料庫自 1998 年起即於檔案館閱覽室開放使用，預計 2001 年年底推出網路版。

## （二）大陸時期實業部、經濟部商業司檔案數位化計畫

大陸時期實業部、經濟部商業司檔案包括了各公司行號及會計師、出國人員向實業部(1926-1937)、經濟部(1937-1948)商業司之登錄案卷。此批檔案少數原即典藏於檔案館實業部、經濟部檔案中，大部分則在民國 80 年由虎尾臺糖倉庫移轉到近史所，約計 100 餘萬頁。檔案館於民國 83 年僱請工讀生作初步整理，但由於檔案受四十年的霉蟲之侵，文件結塊、脫頁毀損不少，無法開放供學界研究，加以數量極為龐大，修補裱褙耗日費時，以檔案館的人力實無法在短期內完成此項工作。基於該批檔案的史料價值及與檔案館原典藏的實業部、經濟部商業司資料具有相連性，檔案館乃於 1998 年起分三年向協調會申請經費，製作成數位影像，迄今已完成 72 萬餘頁的影像檔案。

## （三）李國鼎先生個人資料數位化計畫

1997 年 9 月中央大學為成立「臺灣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向李國鼎先生徵得原度藏於臺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之李國鼎先生個人資料。中研院基於李先生為推動臺灣戰後經濟發展之重要決策者，建議將該資料製成數位影像，以配合生管會、經安會、美援會、外貿會等臺灣戰後經濟相關資料的利用，由經濟所、近史所檔案館與臺灣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共同合作整理。李國鼎先生獲知檔案館積極任事後，另將有關他個人推動臺灣科技工業之相關資料六十餘箱及其個人照片交由檔案館協助整理。2001 年 5 月李先生過世，其家屬亦將李先生私人文物委託檔案館典藏。因此，自 1997 年起，檔案館即陸續整理李先生相關資料，而影像製作之設備及技術支援則由中研院計算中心協助。目前該計畫內容如下：

### 1. 檔案影像資料庫的建立

李國鼎先生個人資料約計 2,000 宗，三萬多筆目錄，約 50 萬頁。檔案館逐筆登錄每一份文件之類別、時間、內容、文件性質，並由計算中心協助支援饋紙式掃描機，將影像作快速掃描。

## 2. 照片資料庫

除了私人文字檔案之外，李國鼎先生珍藏有照相簿 600 多冊，約一萬多張照片。照片經李先生追憶解說，再由檔案館同仁整理成照片說明。照片整理挑選後由計算中心支援掃描存檔，目前已完成 3,562 張影像檔，部分收錄於「李國鼎先生照片資料庫」，已於網路上開放。（網址為 <http://ktli.sinica.edu.tw>）

## 3. 財經大事記(1967-1972)

李先生自 1967 年至 1972 年，有關每週處理之重要事件，如舉辦新計畫、參加重要會議、接待國內外政要、工商考察團體人士，或會談訪問及其他重要施政措施等事項，均由秘書予以扼要登記。檔案館已將財經大事記 50 餘萬字全文輸入電腦，將結合相關照片開發檢索系統。

另外，李國鼎先生私人文物亦由計算中心多媒體中心協助拍攝，製成數位檔案。上述相關影像、全文資料將彙整在李國鼎個人網站中呈現。此網站已由近史所與計算中心加緊合作製作中，預定於 2002 年 1 月 28 日李國鼎先生 93 歲冥誕時推出。

## （四）臺灣總督府及相關機構公文類纂、專賣局公文類纂整理計畫

1997 年檔案館進行「臺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檔案整理計畫」，計畫比預期提早完成，省文獻會整理組組長周菊香女士希望剩餘的人力經費能再協助省文獻會整理其他檔案。協商結果，雙方均希望建立長期的檔案整理合作關係，並從省文獻會最重要且未整理之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檔案著手。1997 年 8 月 4 日協調會會議討論「聯合院內人文各所處與臺灣省文獻會合作整理專賣局檔案」，在檔案資料協調會下成立「日治時期檔案整理小組」，與省文獻會交涉合作事宜。1998 年 2 月 9 日，雙方簽訂「日據時期檔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整理利用學術合作協議書施行細則」，預計分五年完成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及專賣局公文類纂整理及數位化影像製作。

「日治時期檔案整理小組」由劉翠溶院士擔任召集人，小組成員由近史所、社科所、臺史所及中研院計算中心業務相關人員組成，負責檔案整理工作的督導及影像規格的訂定。整理小組除聘用三名助理於省文獻會進行檔案整理工作外，並由檔案館協助目錄的建檔及校對工作。至 2001 年

8 月底，總督府公文類纂已完成整理及掃描工作，共計完成影像製作 2,824,191 頁；專賣局檔案亦完成百分之九十的整理進度，共計完成 2,328,733 頁的影像檔案。

總督府公文類纂 1~6000 冊的目錄資料庫已於中研院首頁學術資源上開放利用，相關影像檔亦將於今年 12 月開放。

### （五）近代外交經濟重要檔案數位典藏計畫

2001 年國科會推動「國家典藏數位化計畫」，希望國內各典藏單位（2001 年參與的單位有中研院、臺大、故宮、國家圖書館、臺灣省文獻會、省立博物館、國立科學博物館），將其珍藏重要文物、檔案資料予以數位化，除可作為將來產業的加值利用外，在計畫的過程中，亦可建立相關技術的標準。近史所所提計畫為「近代外交經濟重要檔案數位典藏計畫」，預計五年內完成外交檔案及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檔案的數位典藏。

## 二、檔案數位化之規格

檔案館於 1997 年起即開始進行檔案數位化工作，當時影像製作技術多採用黑白或灰階規格，因此「戰後臺灣經濟發展檔案數位化計畫」的影像均採 300DPI 的黑白 TIFF 格式。

俟臺灣總督府及相關機構公文類纂、專賣局檔案整理計畫展開，為考慮檔案的珍貴性及其永久保存性，改以全彩 150 DPI 的 JPEG 格式製作儲存。由於國內學術機構尚未有大量檔案影像委外掃描之經驗，市場價格偏高，計算中心希望透過自訂的掃描規範及工作流程，協助廠商降低製作成本。首先必須確認檔案的規格為 A3 大小，工作流程上，規劃由一人操作多臺機器，代替以前一人只操作一臺機器，以節省等待存檔的時間。這種「一人多機」的作業模式，成為日後國內大量掃描的範例。因此，大陸時期商業司檔案數位化計畫及外交經濟重要檔案數位典藏計畫均採用此模式。唯受惠於儲存設備成本降低及網路傳輸速度提升，外交檔案影像掃描規格已調整為 200 DPI JPEG。

照片影像檔的製作，於掃描後同時以兩種規格儲存，一為保存用，以 400 DPI 的 TIFF 檔儲存，另為網路傳輸的 150 DPI JPEG 檔。至於快速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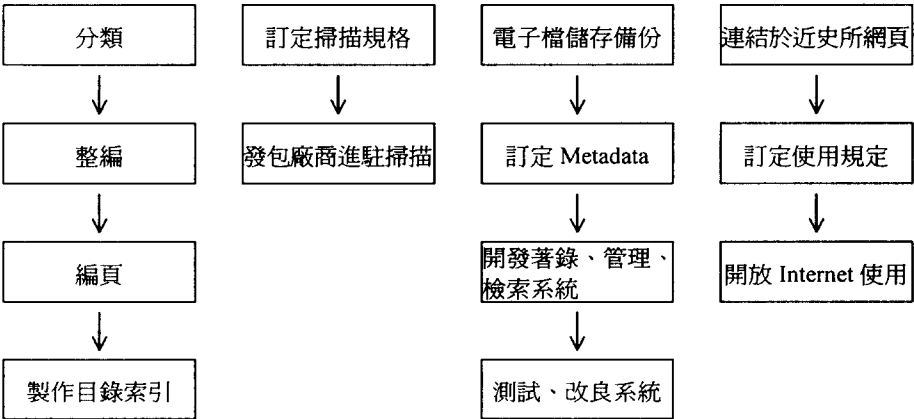
紙式掃描機的規格，則是採用 300 DPI 的黑白 TIFF 格式存檔。

以上所製作完成的數位化影像檔案除燒錄兩份光碟儲存外，並透過網路傳輸，轉存於計算中心的主記憶體(Main Storage Server)內。

### 三、檔案數位化製作過程

檔案數位化製作過程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檔案整編，由檔案館同仁自行處理；第二階段為影像掃描，若為平臺全彩影像則外包給廠商，若為饋紙式掃描則由工讀生配合檔案館同仁自製；第三部分為影像管理，包括電子檔儲存、Metadata 的製訂、檢索系統的開發，此部分由於涉及系統和設備，必須由計算中心協助。最後為開放利用，檔案館可根據不同的檔案類型設訂開放權限。整體作業流程如下：

1.檔案整理 → 2.影像掃描 → 3.管理系統 → 4.開放使用  
 ( 檔案館人員 )      ( 外包廠商 )      ( 計算中心 )



### 四、結語

檔案館近年來參與的數位化計畫，所完成的影像檔已高達 600 萬頁，約計需要 25Tera Byte 的儲存空間，如何解決如此龐大的影像資料在網路上傳輸的速度、安全的控管等，都是檔案數位典藏過程中還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此外，檔案數位典藏計畫除製作大批的數位影像外，還必須考慮

資料庫檢索的準確性，因此後設資料(Metadata)的分析十分重要；如何兼顧檔案本身的屬性而又能符合國際交換標準，是檔案數位典藏努力的方向。爲了使歷史檔案中人名、地名的別稱可以在資料庫中準確地查尋，要如何設計人名、地名權威檔，這些來自圖書資料管理的理念與挑戰，對檔案界與歷史學界或許十分陌生，但均是檔案數位典藏所必須面對的新課題。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1 年出版之名人日記

#### 王子壯日記(一)~(十)

5178 頁 平裝 3000 元

「王子壯日記」涵蓋時間爲民國十年至三十七年，有關北大學風、校園動態、政治牽動學術的案件，均有記載；抗戰前有關黨政問題，包括地方軍人異動，黨內蔣胡派系、山東黨務等，不論親自與聞或品評之辭，均是過去難能獲知的資料。抗戰八年完整的日記中，一個文人對抗日時期中央政治變遷、地方與中央關係、社會變化、物價波動、黨團糾紛、黨內派系糾葛、蔣宋關係的批評與認識、戰後接收與時局等，著墨極多，係研究抗戰時期黨政、社會、文化等問題的珍貴史料。



新書評介

## 評介近年海峽兩岸有關高等院校史的研究成果 ——以臺灣蘇雲峰與大陸黃延復對清華大學校史的研究為例

區志堅\*

—

晚清廢科舉、興學堂，民國期間大學相繼成立，學科知識的傳授朝向專業化發展，故研究中國現代學術史，自應多注意大學營造的校園文化與學術研究成果的關係。再者，群眾運動為中國現代史的一大特色，其組成元素之一是學生運動，因學生為黨派動員的對象，研究現代政治史，必須注意這個元素。故研究大學的體制、教員及校園文化，成為研究民國學術史及政治史的一個重要環節。

1949年後，海峽兩岸均有編修校史之舉，不論是校方自修，或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同一所大學進行深入研究，撰寫成書者，為數甚夥，其中尤以研究清華大學的成果，最為顯著。

海峽兩岸清華校方編撰的校史資料及著作有：朱育和主編《日軍鐵蹄下的清華園》（清華大學，1995）、清華大學校史編寫組《清華大學校史稿》（清華大學，1981）、《清華人物志》（清華大學，1983-1996）、《清華校友通訊》（新竹清華大學校友會，1962-95）、《清華英烈》（清華大學，1994）、《清華大學史料選編》（清華大學，1991-94）4卷6冊、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1937-1946》（北京大學，1996）及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編輯委員會編《國立西南聯大史料》（雲南人民，1986）有關清華部分；至於民間研究清華的作品，大陸方面

---

\*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語文教學中心導師、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博士

有：莊麗君主編《世紀清華》（光明日報，1998）、魯靜等編《清華舊影》（東方出版社，1998）、繆名春等編《老清華的故事》（江蘇文藝，1998）、葛兆光主編《走近清華》（四川人民，2000）及《學術薪火：三十年代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畢業論文選》（湖南教育，1998）、謝泳《教育在清華》（百花文藝，1999）、徐葆耕《釋古與清華學派》（清華大學，1998）及徐虹《清華四才子》（東北師範，1997）等，臺灣民間則編有《學府紀聞：國立清華大學》（臺北：南京出版社，1981）等書。惟大陸所編的校史，除《清華大學校史稿》外，多屬論文集、資料集或回憶錄形式的作品，有強烈的政治立場，注意縱向沿革敘述，偏重學生運動和抗戰時西南聯大時期，未能深入而廣泛地研究清華的校園文化。

與此不同者，則為兩岸學者私撰之清華校史。這一方面的代表人物，在大陸有黃延復，在臺灣為蘇雲峰。黃氏從學術風氣與校園文化的互動關係，進行專題研究。而蘇氏則從清華大學的體制、校長、教員及校園文化進行全面研究。

蘇氏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長期從事中國近代教育史的研究，特別關注清華校史，廣泛蒐集清華史料，從教育史角度重建清華大學校史，以彰顯其在中國近代高等教育中之特殊地位。先後出版了《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以下簡稱《學堂》），和《抗戰前的清華大學》（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以下簡稱《大學》）二書。由於《學堂》一書，前人已有書評，<sup>1</sup>故本文以《大學》一書為評介主要對象，不足之處，輔以《學堂》的內容。

黃延復早年畢業於清華，並留校任教，多年來研究清華校史及教育思想的工作，曾出版了許多著作，<sup>2</sup>最近又出版《二三十年代清華校園文化》

<sup>1</sup> 有關《學堂》的評介，見李國祁，〈評介《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25（1998年3月），頁181-192；呂文浩，〈評介《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通訊》，期26（1998年9月），頁144-156。

<sup>2</sup> 黃延復之著作計有：《梅貽琦思想研究》（山西教育，1995）、《清華園風物志》（清華大學，1996），與馬相武合著《梅貽琦與清華大學》（山西教育，1995）等，並主編《梅貽琦紀念集》（吉林文史，1995）、《梅貽琦教育論著選》（北京人民教育，1993）、《清華大學史料選編》（清華大學，1994）、《清華逸事》（遼寧教育，1998）。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以下簡稱《文化》），<sup>3</sup>也是本文所要比較的一本。黃氏希望《文化》一書，能說明「二三十年代的時期中，她（按：清華）曾當之無愧地創立過自己燦爛的校園文化」（頁599）。本文主要述介兩岸學者研究清華的獨特之處，故多談及二者之別，並評驚其得失，至於二者相同的地方則從略。

## 二

先略述蘇氏二書及黃氏《文化》一書的內容大要。《學堂》一書，共分十章，第一章介紹清華學堂籌設經過，第二章探討清華人事網絡與權力組織的變革，第三章分析校長人選、貢獻與繼承風波，第四章研究清華經費、校舍、設備，第五章討論中美教員的素質與差別待遇，第六章介紹清華學堂從人文教育發展至理工科的歷程，第七章分析學生素質與社會背景，第八、九章述及清華學生的衣食住行、衛生及課外活動，第十章介紹具有清華治學特色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大學》第一章為早期清華之回顧，第二章介紹北伐後羅家倫任清華校長的改革情況，第三章研究梅貽琦校長與清華的發展，第四章探討清華的辦學方針、學制與課程，第五章介紹大學經費、建築及教研設施，第六章談及教師品質及研究成果，第七章介紹校園生活並統計畢業生的年齡、籍貫，第八章論述清華學生運動，第九章綜述畢業生的成就與評估。

黃氏《文化》一書，除緒言外，第一章介紹歷任校長，第二章談及著名教師，第三、四章介紹清華學生的生活理念、學生社團及派別、師生的衣食住行、兩性文化與校園生活，第五章談及清華文學院的組織、架構，和所屬各系開辦課程的內容及研究部，第六章介紹二、三十年代清華文壇及其代表作家，第七章介紹並選載同時期清華師生舊體詩文的作品。二氏研究範圍主要集中在校園內，觀察師生生活、校園設備及課程，也注意到學校教育過程中，課堂內外影響教育發展的各種活動及因素。二氏不獨從

<sup>3</sup> 黃廷復於2001年，將《二三十年代清華校園文化》再版，改名為《水木清華——二三十年代清華校園文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新版刪去錢理群〈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大學文化叢書序〉一文，增錄約650多幅清華校園生活及師生著作的照片，但整體內容與舊版，並無太大差別。筆者撰寫本文時，未及得見《水木清華——二三十年代清華校園文化》，茲據前書為論述內容。

縱的方向介紹校史，也注意到不同時期的校園生活、行政架構、校長行事與學術成果的互動關係，立足於校院內部發展，結合校園外的時代政治、文化背景，進行考察。黃氏一書，更欲呈現文學創作和研究成果與校園發展的相互關係，正如作者所言：「在清華歷史上，撰寫此類作品，可能尙屬首次」（《文化》，頁 601）。

黃、蘇二氏所持的主要相同論點在：一、二人均介紹清華成立以前的背景。前人已指出，《學堂》提到昔日鮮為人知的交涉退款與籌備經過，與聖約翰大學、外交部及清華的三角關係。《文化》也略為述及退款與學堂成立的關係，恰可補足校方自編校史的不足之處。二、二書均從縱向分析，糾正了校方自編校史失於簡略和過度偏重學生運動之弊。《文化》第一章以清華歷任校長為中心，介紹自周詒春至梅貽琦任內的不同發展；《學堂》則從人事網絡、權力組織、校園設備、課程及學生生活的不同層面，介紹清華在歷任校長期間的不同情況。蘇氏《大學》一書以 1928 年為分水嶺，蓋自是年起，清華改名為國立清華大學，啟動了清華校園另一波建設、校政及校園文化的改變。三、在橫向方面，黃、蘇二氏均注意及校長的領導風格、行政管理、師資、校園設備、學生課外活動及師生衣食住行的生活面貌。

茲將蘇、黃二氏對清華論述的明顯分歧點，分別介紹如下：

一、蘇、黃二氏最大之差異，在論述學生運動方面。黃氏傾向肯定清華各時期的學生運動（或者說是「學潮」），如說清華學生驅逐張煜全校長，及抗拒新任校長羅忠誥到校接事，為「反映了清華學生對於北洋軍閥政府對清華實行的官僚統治的反抗」（頁 25）。黃書未提五四時期的清華學生運動，與國共兩黨在學生運動中的角色，只含糊地說：「從 20 年代中期起，清華學生會開始出現某些政治色彩及黨派色彩，對校事發表意見時，較多表現某種強迫姿態。」（《文化》，頁 184）他稱許清華學生會在 1925 年的「五卅運動」，及 1931 年的「九一八運動」中所起的積極作用，卻未提到發生於 1935 年的「一二九運動」，而此一運動卻受到大陸各大學校史的高度評價。因此，黃氏的立場，比官方的《清華大學校史稿》要保留和含蓄得多。

蘇氏則於《大學》第九章中，以相當長的篇幅探討「一二九運動」的性質及其正負面的作用。由於証據充足，頗有突破之處，為黃氏《文化》一書所不及。

蘇氏開宗明義就說：「從世界史的觀點，學生運動和政府經常處於對抗地位。所有的政府都不喜歡學生運動。一旦發生，皆用疏導、安撫方法處理，不得已則採鎮壓手段，迫使就範。壓制失敗，則事態勢必擴大，搖撼社會，甚至推翻政府。學生運動或發自某種理想情操，或為自身權益；或自動自發，或受其他個人或團體所煽動，或二者相加相乘。運動發生後，激情往往淹沒理性，以暴易暴，難以平息。弔詭的是，所有在野政黨多傾向利用學生的純淨和熱情，發動學潮，顛覆政府，一旦取得政權，則轉過頭來鎮壓學生運動。抱著崇高理想參加運動的學生，永遠是輸家。」（頁 185）

僅就「一二九運動」而論，該運動起因於日本之侵略華北，政府抵抗無力，激起國人不滿政府之情緒。清華地下黨員姚依林、蔣南翔等人，是在北平一家法國人書店裡看到陳紹禹於莫斯科發表的「八一宣言」，才發起此次運動。因此，這項運動並非由中共中央主導。運動持續年餘，初期採取激烈的罷課、罷考、串連示威遊行，以反對華北自治，要求停止內戰為號召，影響及於各大城市，使校園不安，社會動盪，政府左右為難。迄 1936 年春，劉少奇主持中共北方局後，才依據「抗日統一戰線」政策，糾正學生的偏激行動，要求恢復上課、尊重師長，然學生仍時有脫軌之舉，如不聽校長告誡，糾察隊以暴力控制校園，攪亂秩序、阻撓期考等。政府則對示威學生採阻止、隔離和以水龍驅散的方法，偶有衝突受傷者。北平軍警也曾二度進入清華校園逮捕地下黨份子，惟由於一無明確證據，二有校方營救，被捕學生幾乎全都獲釋，態度遠比內戰時期溫和。清華教授大都同情學生，但反對罷課遊行。梅校長一再告誡，時局多故，同學應謹守校規，努力讀書、培養實力，以備為國所用，不可荒廢學業。當清華「救國會」包圍教授會議場，要求免除學期考試，以便實施非常時期教育和生活，全體教授因此憤而辭職時，梅校長堅持嚴懲為首之十一人，並說出「不願接受清華之教育者，可以離去」的重話。由此可見梅校長和其他大學校長一樣，並不支持「一二九運動」。至於領導「一二九運動」者，多為富家子弟而非貧寒之士，這方面何炳棣有翔實的指證（頁 194）。

蘇氏還發現，「西安事變」與「一二九運動」的關係：一是何炳棣找到張學良捐助清華民族先鋒隊四百元的證據；二是「一二九運動」領導份子應邀到西安宣傳抗日救國活動，於「一二九運動」一周年時，舉行熱烈的慶祝活動。張學良當天晚上「心情十分衝動」，乃與楊虎城計議，三天後即發生兵諫事變（頁 236）。事變發生後，清華教授會發表宣言，指斥

張氏「假抗日的美名，召亡國之實禍，破壞統一，罪惡昭著。」（頁 237）在全國一致聲討下，各校學生會及「救國會」成爲眾矢之的。在張釋放蔣介石當天晚上，清華發生嚴重的左右二派衝突，校方於是決議解散「救國會」，並停止學生會活動，讓校園恢復平靜。就日後對畢業生的追蹤觀察而論，凡專心學業者，多有成就；而積極從事學運者，多數中途輟學、短命而死，少數倖存者在政治上也並不扮演重要角色。總之，「一二九運動」有助於促成「西安事變」，解除延安之危，但國家社會和高等教育亦爲之付出很高的代價。

二、蘇氏客觀地評價了美國對清華教育的影響，而黃氏則多從負面的角度評論美國對清華的影響，認爲美國退還庚子賠款，對清華及留美運動雖有助益，但是「退款辦學這一歷史背景，使早期的清華文化不可避免地具有兩重性格——或濃或淡的半殖民文化性格和強烈的愛國、自強性格」（頁 6）。黃氏認爲美國退款的目的，是以美國自身利益爲本。書中更指出清華的教育方針、制度、學術和領袖人才，也以美國價值觀爲標準。所有課程除了國學門外，均以英語爲媒介。美國教員也佔有特殊的地位，薪金和住宅都優於西學部的華籍教員；他們有時甚至利用美國公使館的權勢干涉校政及學生活動，由是激起華籍師生的不滿，因而有 1923 年的學生聯合抗議美國教師事件，這就是「清華控制與反控制的鬥爭」（頁 10）。黃氏談到聞一多的詩歌時，認爲他的特色是：「時評」與「文評」。前者主要便是批評當時校內「一切美國化」的傾向，鼓吹清華人努力去克服這種傾向（頁 420）。由此可見，黃氏批評美國文化價值的觀點不言而喻。

而蘇氏在《學堂》一書中指出，美國退還庚款，設立清華學堂的動機，固爲未來在華的商業利益，但對中國也有幫助。中國要現代化，當然需要學習美國。清華學堂爲留美準備學校，自然重視英語和美國文化的課程。高薪延聘美國教員，乃是清末以來厚聘洋員的政策所致（據新聞報導，目前北京清華大學正以年薪十萬美元延攬世界級科學家來清華執教）。美籍教員雖非盡屬學問淵博之士，也多能盡到教師本分，「對清華做出了重大的貢獻」。蘇氏又指出，晚清駐外公使梁誠及聖約翰大學畢業的顏惠慶等人，對清華也有重要的貢獻。梁誠交涉退款、派遣留學和創辦清華學堂，使此經費不致被挪用於其他用途。由於清華受外交部管轄，而當時在外交部和國務院擔任要職者，多爲聖約翰學生，故在政治上保障了清華人事的穩定與發展。同書第四章又指出，在全國教育面臨軍閥混戰及經費不足的

情況下，清華因得到董事會節制，而免於斷炊之憂。換言之，蘇氏認為美國對清華的關懷，和外交部對清華的管轄，都有正面作用。由是「不能不歸功於退款的中美合作性質」（頁 140）。

三、蘇、黃二氏對清華歷任校長的貢獻評價不同。黃氏書中第二章介紹了清華歷任校長周貽春、張煜全、曹雲祥、羅家倫、梅貽琦等人，惟以較多篇幅討論周貽春和梅貽琦。黃氏認為，周推動了愛國思想，並樹立德智體「三育並進」的教育特色；曹雲祥則使清華實現了改辦大學部及國學研究院的初衷。羅家倫的貢獻則在提高教師地位及中國課程的比重，改善學術研究機構及開放女禁，「壓低洋人在校的地位」（頁 41）。而蘇氏從建立學校行政架構及學術環境的互動關係引申，從校長維持校政及校園建設的角度，較深入地討論了羅家倫及梅貽琦應付困難的辦法及其貢獻。

《大學》第二章分析了羅、梅二氏辦學的不同態度。羅採激進的革命式方法，而梅則採溫和漸進的態度，二人都有所表現。羅氏的貢獻在：提前使清華成為分科大學；廢除董事會，使清華改歸教育部管轄；又成立健全的基金管理制度，鞏固清華經濟基礎；加強圖書儀器和校舍設備，擴大延聘國內外名師，提高學術水平；整頓原有學系，強化文理學院；擴大招生名額，同時招收女生。最後卻因政策激進，遭致清華校友會及少數學生反對，加上北平政局的轉變，終於被迫辭職。蘇氏持平地指出，羅氏「畢竟不是完人，他這時才三十四歲，年輕氣盛，好展才華，思想激進，好批評現狀，不講情面，在當時的社會文化條件下，必然會得罪他人。……在這種複雜的政治、文化、學術環境與利害衝突的情境下，任何類似羅家倫背景的人出任清華校長，難免都有同樣的下場！祇是羅氏較有格調罷了」（頁 52-53）。清華人多不知有羅校長，其實，羅氏扮演了上承清華自由講學傳統，下開梅氏改革的角色。黃氏《文化》一書，則未談及羅氏在學生運動中的角色及其所遇困難。

對於梅貽琦，黃氏主要強調梅氏的辦學理念，蘇氏則從校園穩定與發展方面探討。黃氏《文化》一書主要敘述梅氏重視通才教育、求新民、提倡學術自由及注意培養學生的道德情操。蘇氏《大學》一書中，除論述梅氏辦學理念外，亦介紹他增聘教授，鞏固教授治校制度，並以清華為例說明大學和政府的關係，並非如一些學者所言經常處於「矛盾與對抗」狀況，而是「存在著許多合作的事實」（頁 71）。梅氏尊重教授，自命為「王帽」（象徵元首），他確立評議會為校政的最高決策權力機關，教授會也

扮演制衡角色，讓「清華教授實質上享有其他國立大學未曾有的治校權力」。梅氏除繼續發展文、理、法三個學院外，也因應政府推動理工科的政策，設立工學院，充實機器儀器設備，提高科技教學和學術研究。尤其重要者，前人每認為梅氏支持清華學生領導的「一二九」學生運動，實則如前所述，梅氏始終反對學生運動，否則清華不可能成為戰前最佳學府。

四、黃氏特別注意文學創作與大學課程發展的互動關係，蘇氏則從大學整體發展及各科研究成果進行介紹；前者開拓了近代學術史研究的蹊徑，後者則兼及民國高等教育史與文化史的研究領域。由於二人研究取徑不同，因而產生不同的校史分期標準。錢理群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大學文化》叢書序〉（《文化》，頁 19）中，指出「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不同時期，大學文化起著不同的作用」，這正是黃氏一書的特色所在。《文化》中第五至七章，利用《國立清華大學學程大綱》中〈中國文學系的目的與課程的組織〉、〈中國文學系概況〉、〈中國文學消息〉及〈1936 年度中國文學系學程一覽〉等史料，介紹清華中國文學系開設的不同課程及任教學者，從中可見清華文學院教授新文學及國學知識的情況，而最重要者，則是培養外國語言與文學的知識，豐富學生古今中外文學的學養，同時也注意培訓學生的寫作能力，形成師生間一種「學與術並重」（頁 318）的治學方法。因為課程中列明學生雖以修讀中國文學系開辦的課程為主，但也要求他們修讀中外通史、算學、地質學、生物學等，使學生從通才教育中吸收基礎知識。文學研究所有聞一多、唐蘭、陳寅恪、楊樹達、趙萬里等知名學者執教，培育了不少人才。除了教員以外，清華學風的出現，也有賴學術團體及出版刊物。清華成立的中國文學會，出版《清華中國文學會月刊》、《語言與文學》、《清華文藝》等，成為師生發表研究成果及創作的園地。此外，中文系學生除了修讀本系的課程外，也必須修讀外國語文系、哲學系、歷史學系、社會學系的課程。從作者列舉的內容，可見清華文學院兼容古今中外學術文化的特色。最重要者，黃氏頗受「文以載道」觀點的影響，十分注意「愛國主義」及同情民間疾苦的作品。書中指出早期清華文壇最突出的一項成就是「戲劇」，據統計，從 1913 年至 1918 年，清華共演出新戲 59 齣，使清華成為「中國近代戲劇的發祥地」。但他僅舉出洪深的「貧民慘劇」和聞一多的「革命軍」（《文化》，頁 35）為例，而這二篇作品主要是反映現實，而無關愛情及抒發性靈之作。黃氏可能是從大陸「文藝為政治服務」的觀點，檢視清華文壇的發展方向。

此外，黃氏並未注意到吳宓自南京東南大學北上後，清華成爲其編輯《學衡》雜誌文稿的地方，《學衡》因而也是清華師生發表文藝創作及文學研究的園地。吳宓把西洋文學及哲學思想傳入清華，對開拓學生的開放心靈，「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當然也有貢獻，惟黃氏多未介紹。

《文化》一書第六、七章，將清華文學的發展分爲五期：「五四運動」以前爲守舊期，代表人物爲教師吳宓、洪深及其時之學生聞一多；五四以後爲新清華期，代表人物是已任教清華的聞一多、梁實秋、顧毓琇和謝文炳；第三期起於何時，黃氏並未標示清楚，只指出其代表人物有朱湘、孫銘傳、饒孟侃、陳銓、楊世恩；第四期之時間也未明白劃出，代表人物則爲柳無忌、張蔭麟、龍程芙等，其代表刊物爲《清華中國文學會刊》和《清華月刊文藝專號》；1935年至1937年爲第五期，是清華整體文壇發展的分水嶺，代表人物及組織爲李健吾、李惟遠、曹寶華、左聯及國防文學社。他認爲聞一多、梁實秋在此階段離校，出現了文壇蕭條的現象。然而，由於李健吾等清華作家的出現，使清華文壇復興，轉向左聯及國防文學。黃氏說：「隨著國內政治鬥爭的進一步激化和抗日救亡運動進一步興起，在全國文藝路線鬥爭的影響下，清華文壇發生了明顯的分化」（頁420），這就是清華的左聯及國防文學社出現的原因。黃氏更指出王瑤是這兩個組織的重要推動人物，「其堅實後盾當然是以清華地下黨爲核心的各個『先進的』或『革命的』政治組織」。由此可知，黃氏可能在大陸的「革命」觀念影響下，強調清華文壇中「革命」的力量，而未注意文藝創作的其他發展。此外，只據少數作家作爲分期標準，未免以偏概全。就此而言，若作者能多注意清華文學院開辦的課程、《清華週刊》中的文藝創作和歐美文學介紹，及其與校外文壇創作的關係，或許更能切合主題。

關於清華的研究風氣，《學堂》第六章介紹清華從人文科，發展至文、法、理、工科，及以西學爲重的課程變化情況。蘇氏介紹了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成立背景、籌備經過及學術制度的特色。國學研究院注重學生個人研究，要求導師常駐學院，常與學生討論學問，由此而營造出濃厚的學術研究氣氛。而黃氏雖談及陳寅恪等清華四大導師的研究成果，但因偏重文學創作與校園文化，不免忽略了清華從事學術研究的風尚。

五、在評估清華教育的成果時，蘇氏深入介紹了整體師生的研究成果，而黃氏只注意到專科研究領域。清華受庚子賠款資助，資源較其他大學豐厚，輸入的資本與產出的成果是否成正比，實爲衡量大學教育成敗的

一項重要標準。其時，國人曾有指斥清華奢侈無度、浪費資源的言論。《大學》第六章為反駁此種論調，詳細介紹了清華教師品質的提升，並認為教師的研究成果已達國際學術水準。作者花多年時間蒐集資料，編製1927-1949年間清華教師約七百餘人的名錄（未刊稿），並作出多項統計。在學歷方面，1927-1935年間就有八十四人在國外取得博士學位，八十五人在國內外取得碩士學位，一百四十九人取得學士學位。而他們於1927年時的年齡，多在32至52歲之間，可見清華為一所較有活力的學校。研究著述方面，據不完整的統計，全校至少有百分之三十七以上的教員從事專題研究，比其他大學為高。而其研究成果，都發表在國內外學術刊物之上。至於學術風氣，即使在「一二九運動」年餘間，多數學生平日多能用功讀書，假日圖書館也座無虛席。最後，作者於第九章利用整理出來的〈清華大學歷屆畢業生名錄，1929-1947〉（未刊稿）所收二千餘人的資料，追蹤統計各院系畢業生於1949年以後的地理和職業分佈，發現他們於兩岸三地和美國等地，不論是在學術、教育、國防、工業、交通和商業等方面，都有重大的貢獻，尤其是世界華人稱頌不已的「二彈一星」，主要便是由清華人領導。但黃氏僅集中討論了聞一多、朱自清及左翼文壇作家，而未留意到清華國學院導師的研究成果，及文學院畢業生如余冠英等在中國文學研究及創作上的地位，未免有以偏概全之憾。

兩位作者在論述清華的發展，重點有異，而各有所長，可以互相彌補。《學堂》第八、九章，介紹一般校史所忽視的圖書館設施、醫療疾病、門診及死亡、廚房衛廁、汙水處理的情形。《大學》第五章也介紹了各系及所屬圖書室，尤其是理工學院的實驗室儀器及工場的先進機器設備。這些「硬件」是大學理工科發展的重要條件。至於校園生活及行政管理的「軟件」問題，也都受到歷任校長的重視，由此而鑄造出嚴肅、健康而活潑的校園生活環境，使清華成為國內一流大學。《文化》一書，除詳實論述清華文學院課程及師生研究成果外，更在書中第三、四章，談及趙元任、朱自清、馮友蘭、楊振聲等知名教授的課餘生活，以及清華師生對兩性文化和婚姻的看法、教授的婚姻生活情況，特別是教授們的配偶，諸如趙元任夫人、梅貽琦夫人等人的生活。學生生活方面則談到「拖尸」、「鬥牛」、「票房」及唱戲等活動。這些雖為校園瑣事，卻可呈現校園生活有趣的一面。由於師生為校園文化的營造者，其生活狀況一般均較為嚴肅刻板，清華是否與其他大學不同，也是值得學者注意的研究領域。要之，蘇氏二書



可謂對清華校園生活的宏觀分析，黃氏一書則為對清華的微觀探索。

以上所論各書徵引史料極為繁博，不過，仍有若干最新成果，未及使用，茲臚列如下，供蘇、黃二氏參考。對於二、三十年代清華師生的科學研究成績方面，有黃氏與虞昊合著之《中國科學的基石——葉企孫和科學大師們》（復旦大學，2000）一書。該書利用前清華物理系系主任葉企孫的未刊日記、書稿等新資料編撰而成，應有高度的參考價值。關於通才教育與學術研究，有清華畢業生顧毓琇所著《一個家庭、兩個世界》（上海人民，2000）。對清華人文學科的發展，則有齊家瑩編《清華人文科年譜》（清華大學，1999）及徐葆耕著《紫色清華》（民族，2001）。近日常版收錄有關清華文學作品的資料集，則有張玲霞編《清華文學尋蹤》（清華大學，2001）及張國風編《清華學者論文學》（清華大學，2001）。至於敘述清華師生生活者，有宗璞等編《永遠的清華》（北京出版社，2000）一書，收錄教授們的子女回憶父親課餘活動的文章。個別教員的感情世界，則有沈衛威《吳宓傳》（東方出版社，2000）。

### 三

總之，蘇、黃二氏的清華校史著作，可謂研究清華大學校史及其校園文化史的雙璧。蘇氏的關照面較廣，論述嚴謹，前後連貫；黃氏則重點選擇，跳躍引述而富於詩情畫意。蘇氏長於統計分析，而黃氏偏向個別人物；蘇氏客觀理性，運筆活潑，黃氏主觀而富浪漫色彩；蘇氏肯定美國文化價值，黃氏則既肯定自由民主，卻又反對美國殖民主義教育；蘇氏之著作為謹嚴的史學論著，史料豐富，論點堅實，屢有創獲，為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史的重要典籍；而黃氏之書沾染濃厚的文學色彩，亦不失為今後研究中國現代文學與學院發展史的重要依據。

由於政治意識形態與保密觀念的阻梗，兩岸學界對高等院校的研究，目前仍多偏重於單一院校的個別探討，尚未注意到整體高等教育機構與民國學術邁向學術化、專業化、學院化之過程中的互動關係。今後若要開拓高等院校史的研究，非全面開放各大學的校史檔案不為功。此外，研究者也應進行口述歷史訪問，以補檔案文獻之不足。我們期待經由不同大學個案的研究，在二十一世紀內，重構一幅以高等教育為主體的近代中國社會文化史、學術史及政治史的真實圖景，開拓一個民國史研究的新領域。

# 十八世紀在近現代中國史的樞紐位置

胡明輝\*

*Saving the World: 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By William Row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William Rowe 剛出爐的新書 *Saving the World: 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於導論的第一句話，就劈頭指出了十八世紀在近現代中國史的樞紐位置。<sup>1</sup>這種對十八世紀之樞紐性的詮釋，主要來自於社會史的研究成果。Frederic Wakeman 早在三十年前即說，所謂盛清時代(1725-1775)內含的各種動力與機制，乃直接連繫到中華帝制系統在十九世紀之逐漸崩解的過程。<sup>2</sup>Rowe 在導論中也概述了盛清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現象：由於對嬰兒死亡率、疾病、以及營養不良的控制得當，使得農村人口急速增加；帝國疆界向西北大幅擴展並予以有效管理；帝國內部則大規模地開墾高原、河畔及海濱，單位面積的農業生產力也提高；商業活動及手工業越加密集，區域商業交易開始重疊並逐漸發展成全國市場；沿海與東南亞及歐洲的貿易穩定成長，並使得外交關係格外引人注目；農村識字人口逐漸增多，印刷出版比十七世紀更發達，江南地區戲曲藝苑勃興、書院廣置、經師文士對帝國的向心力漸漸鞏固。<sup>3</sup>對 William Rowe 而言，十八世紀東亞這個和平穩定的社會在十九世紀初扭轉成一個左支右絀、分崩離析的局面，是社會史學者們都已承認的

---

\*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博士候選人

<sup>1</sup> William Rowe, *Saving the World: 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

<sup>2</sup> Frederic Wakeman Jr., "High Ch'ing 1683-1839," *Modern East Asia: Essays in Interpretation*, edited by James B. Crowle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70, pp. 1-28.

<sup>3</sup> William Rowe, *Saving the World*, pp. 1-4; Philip Kuhn,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30-48.

結論。然而，扭轉時刻中之文化思想面向是不是也呈現了類似的「樞紐性」呢？針對這個大問題，Rowe 選擇了影響深遠的封疆大吏陳宏謀(1696-1771)作為他研究的切入點。

*Saving the World* 全書寫一個人與一個時代的錯綜交織。本文不準備對此五百餘頁的厚書作全面性系統介紹，只擬借花獻佛。「花」指作者書中治史的結構與側重點，以及對內容材料的討論手法在英語學界中的脈絡與意涵；「佛」則指漢語學界。再者，這朵花也可能只是筆者刻意摘取的重點而已。我以為，Rowe 於此傳記中不但描寫了個人對時代的觀察以及時代對個人的型塑，也同時提出了選擇陳宏謀作為傳主的原因。陳宏謀在十九世紀經世學者的造神運動中，成了一位經世先知。魏源(1794-1857)在1826年編《皇朝經世文編》時，陳宏謀的作品被收入五十三篇，僅次於顧炎武(1613-1682)，成為可供後人效法的模範官員。同時，陳宏謀作為一個在乾隆朝時對朝廷甚具影響力的官員及能幹的地方首長，對於二十一世紀今天的我們，是一位絕佳的十八世紀報導人(informant)。<sup>4</sup>多位美國社會史學者已使用過陳宏謀為官時留下的大量記錄。早一輩的著名學者，例如蕭公權和瞿同祖<sup>5</sup>；晚近的學者，例如 R. Bin Wong 研究救災，Peter Purdue 研究水利，Helen Dunstan 研究經濟政策，Alexander Woodside 研究教育政策，Susan Mann 和 Tani Barlow 研究女性史，再加上作者的親密戰友 Pierre-Etienne Will，全都仰賴陳宏謀的親切指點。<sup>6</sup>這些在在說明了陳宏謀

<sup>4</sup> William Rowe, *Saving the World*, pp. 4-10.

<sup>5</sup> Kung-ch'uan Hsiao,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0; Tung-tsu Ch'u,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sup>6</sup> R. Bin Wong, "Food Riots in the Qing Dynast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1.4(August 1982): 767-88; Peter C. Perdue, *Exhausting the Earth: State and Peasant in Hunan, 1500-185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Helen Dunstan, *Conflicting Counsels to Confuse the Age: A Documentary Study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Qing China, 1644-1840*,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96; Alexander Woodside, "Some mid-Qing Theorists of Popular Schools: Their Innovations, Inhibitions, and Attitudes Toward the Poor," *Modern China*, 9.1(January 1983): 3-35; Susan Mann, "The Education of Daughters in the Mid-Ch'ing Period,"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ited by Benjamin Elman and Alexander Woodsid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p. 19-49; Tani E. Barlow, "Theorizing Women: Funu, Guojia, Jiating(Chinese Women, Chinese State, Chinese Family)," *Body, Subject, and Power in China*, edited by Angela Zito and Tani Barlow,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p. 253-89;

如何緊密地扣住他的時代，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作者對於自己寫陳宏謀，尚有一層方法論上的辯護。作者坦承在構思 *Saving the World* 之初，由法國年鑑學派發起的「社會史革命」正方興未艾，為歷史上的「大人物」寫傳記的作法已被人唾棄。Rowe 雖然很欣賞年鑑學派的史觀，同時自己也完成了兩本都市史的專著，<sup>7</sup>卻寂寞地開始寫陳宏謀的傳記。即便如此，Rowe 強調年鑑學派中的著名史學家，例如 E. P. Thompson 和 C. Vann Woodward，也曾經投入寫傳記的工作。<sup>8</sup>弦外之音，不無事在人為之意。當 Rowe 即將完成陳宏謀的傳記時，結合思想史與社會史的「新文化史」已經大行其道。<sup>9</sup>Rowe 自己舉出的新文化史典範作是 Carlo Ginzburg 的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Ginzburg 藉著一個不識字的磨坊主人在法庭上的供辭，連結其他當時史料，膽大心細地重構出十六世紀下層社會的世界觀(cosmology)。<sup>10</sup>Rowe 認為這種「微觀史學」可以為他的陳宏謀傳在文化史的方法論上定位。史學界帶領風騷的學者也開始在史料的基礎上，重新思考歷史中的行動者(agent)如何在文化結構的制約下發展出一種集體或半自主的思路來。Rowe 本人對這種潮流的曖昧性既欣慰又焦慮。選擇陳宏謀作為研究對象，作者本來想要從社會史跨進思想史，以拉近這兩種史家的距離。在新文化史的風潮中，我猜想，Rowe 或許不願意被解讀成跟隨這種潮流的某種「後現代史學」吧。<sup>11</sup>

---

Pierre-Etienne Will, *Bureaucracy and Famin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translated by Elborg Forst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sup>7</sup> William Rowe,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and his *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98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sup>8</sup> E. P. Thompson, *William Morris: Romantic to Revolutionary*, New York: Pantheon, 1977; C. Vann Woodward, *Tom Watson: Agrarian Rebel*, New York: Macmillan, 1938.

<sup>9</sup> 以下兩本集子頗具代表性：*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Essays*,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Lynn Hu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and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Victoria E. Bonnell and Lynn Hunt, with an afterword by Hayden Whi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sup>10</sup> 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translated by John and Anne Tedeschi,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

<sup>11</sup> William Rowe 援引以下諸位「同一陣線」的史家：G William Bouwsma, John Pocock 和 Quentin Skinner。最近為維護史學任務而力斥後現代思潮的作品，請參閱 Joyce Appleby, Lynn Hunt, Margaret Jacob,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1994; Eric Hobsbawm, "The

*Saving the World* 全書分為三大部分，每部分各有四章。第一部分「作人」(Being a Man)，分別從宗族背景、為官歷程、天人關係及治學之道來描寫陳宏謀。<sup>12</sup>第二部分「生財」(Creating Prosperity)，分別從四個領域討論陳宏謀的經濟政策：(1)清政府對食糧的積累、管理、供給、與輸送的政策；(2)清政府如何參與市場的運作來達到養民的目的；(3)如何透過開墾、興水利、勸農、植桑養蠶、開礦等來提高基本農業生產力；(4)除了維持農民的基本生活，如何在一個巨大的農業帝國中累積「財富」的問題。<sup>13</sup>Rowe 在討論陳宏謀的經濟政策中，強調他認識到一個外在於清政府且具有獨立運作規律的「市場」。陳宏謀認為政府應該積極地介入這個市場，但傾向於保護其運作機制(pro-market intervention)。<sup>14</sup>第三部分「經世」(Ordering the World)，也是從四個角度來討論陳宏謀的政治觀：(1)如何界定種族、位階、身分、宗法、性別等倫理秩序；(2)清政府組織內的官僚體系以及縣級以下的制度與管理；(3)清政府組織之外的公共領域及基層社群(保甲及鄉約)；(4)對邊陲蠻夷、婦女及兒童的教化問題，和「禮」在教化及維持社會秩序上的重要性。<sup>15</sup>在討論陳宏謀的政治經濟觀點時，Rowe 經常刻意地或輕描淡寫地點出陳宏謀思想中那種呼之欲出的「近代風格」，並且屢次將陳宏謀與歐洲近代早期的思想家，如 Adam Smith 或 John Locke 等，在他們各自的脈絡裡「相提並論」。Rowe 對這位著重於經世、民生、教化的官員陳宏謀如此描寫，乃是在一個比較史學的視野裡，將陳宏謀與十九世紀的經世學者區分開來了。

主角陳宏謀在十九世紀被描述成一個經世先知，當然不是準確的，但也絕非空穴來風。十八世紀的陳宏謀和十九世紀建構出來的經世先知之間，難道毫無連續性嗎？這個問題馬上引出了下一個問題：十八世紀的陳宏謀是一位如何的陳宏謀，而這樣的陳宏謀又如何能啟發下兩代經世學者的關懷重點？Rowe 在結論中問得更直截了當：到底十八世紀的官員們(以

---

Sense of the Past," *On History*,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7, pp. 10-23. 左派陣營中對後現代思潮的批判，請參閱 Perry Anderson, *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ity*, New York: Verso, 1998; Terry Eagleton, *The Illusion of Postmodern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sup>12</sup> William Rowe, *Saving the World*, pp. 15-152.

<sup>13</sup> William Rowe, *Saving the World*, pp. 155-287.

<sup>14</sup> William Rowe, *Saving the World*, p. 216.

<sup>15</sup> William Rowe, *Saving the World*, pp. 291-445.

陳宏謀為例)心中認為他們自己在做些什麼?<sup>16</sup>陳宏謀及十八世紀的學者又如何看待他們自己那套學問呢? *Saving the World* 書中除了第一部分談陳宏謀思想的特色及整體性,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所討論的幾乎全是十九世紀經世學家所關心的議題。全書結構上的訊息,強烈地暗示著陳宏謀與經世學家的某種連續性。但是,陳宏謀稱自己的學問為「實學」而非「經世學」。我以為,貼上這個標籤之後,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將其帶入了另一個歷史向度。首先必需指出,自十七世紀以來,提倡實學成為整個東亞的跨文化學術運動(包括滿清王朝、朝鮮和日本)。在實學的大標籤下,涵括著五光十色的思想系譜。根本說來,實學是用來正面地界定某一學圈意欲凸顯的學術內涵。比如說,對強調道德內涵的人,有誠意正心之修養功夫的就是實學,沒有的就是空、虛;對強調有經文可考的人,考證精詳確切的就是實學,沒有的就是虛;對強調有用的人,有經世救世之主張的就是實學,沒有的就是空;對強調可反復測驗而得知自然規律的人,天文曆算就是實學,風水選擇就是虛妄。<sup>17</sup>虛虛實實之外,再加上各地域衍生的實學系譜所產生的各類特色,更增加了此問題的複雜性。陳宏謀出身於「半邊緣」的廣西桂林,很快地連結上北方質樸的「關學」系統,晚明呂坤(1536-1618)的思想代表了這個流派的精髓,也成為陳宏謀實學的根源。<sup>18</sup>我相信,William Rowe 這本書在文化思想史上的一大貢獻,就是清晰地描寫了一種十八世紀陳宏謀式的實學。

陳宏謀式的程朱實學,當然不是十八世紀形形色色之思潮中唯一的物種。舉例來說,在康熙時居高位的李光地(1642-1718)融合了梅文鼎(1633-1721)之數學、天文學(天文曆算)與顧炎武之訓詁學與音韻學(六書七音)而創立了一套李家的程朱實學,將之傳給其孫李清馥(?-?)。李清馥在雍乾時鄭重地整理、續補了其祖一部天文學的遺作《曆象本要》,並重新評估了「閩學」之歷史背景、社會狀況、學統、人脈等,寫成了一部反陽明學的《閩學淵源考》。<sup>19</sup>李家這種程朱實學的功能,在某一種程度

<sup>16</sup> William Rowe, *Saving the World*, p. 446.

<sup>17</sup> William Rowe, *Saving the World*, pp. 137-145; Minghui Hu, "Provenance in Contest: Searching for the Origins of Jesuit Astronom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forthcoming in December, 2001.

<sup>18</sup> William Rowe, *Saving the World*, pp. 126-137.

<sup>19</sup> Kojima Tsuyoshi 小島毅, 中國近世における禮の言説 (Ritual Discourse in 12th-16th Century

上補強了滿清王朝的正統意識形態。不管是李光地式的或是陳宏謀式的實學，都在協助建構當時的正統觀。只不過李式屬於「工具性」的，而陳式則屬於「社會性」的。另一方面，陳宏謀式的程朱實學經常在理學的大原則及措辭下，動手動腳地發展出一套套具體可行的方案來。Rowe 對此很感興趣，並歸納出陳宏謀式的實學之中三個互相拉鋸的主要面向：(1)陳宏謀強調簡單質樸的道德主義，卻具備了精緻複雜的政治手段及經濟政策；(2)陳宏謀強調清政府對社會的積極干預，卻又鼓勵地方社會自發性的自律；(3)陳宏謀強調每一個「民」的獨特價值、尊嚴及重要性，卻又不斷地將「民」之本分根植於人際網絡、族群與階層中。<sup>20</sup>

William Rowe 曾為《劍橋中國史》撰寫一章由明末清初到盛清之社會變遷史，其於中國社會史學的權威地位已被英語學界所公認。<sup>21</sup>陳宏謀的具體實踐，正是如 William Rowe 之類的社會史學家著墨最多之處，而且 Rowe 所討論有關市場運作、食糧發放或鄉黨社群背後的概念，也是大部分社會史學者極感興趣的議題。尤有甚者，以上陳宏謀思想中三個互相拉鋸的面向，都隱含有比較的意味。Rowe 經常將這些面向與西方的功利論式(utilitarianism)、自由主義式(liberalism)、及個人主義式(individualism)的思潮相比。陳宏謀的實學充滿著具體實踐與正統官方程朱理學之間拉鋸的張力，這些互相拉鋸的面向，說明了陳宏謀作為一個官府辦事人的思路與特色。

在 Rowe 的筆下，陳宏謀的實學思想顯得很重要。然而，翻開梁啟超、侯外廬、或錢穆的「三百年學術思想史」（三位作者的書名略有出入，但大旨相同），我們卻無法找到陳宏謀這一號人物。甚至像莊存與(1719-1788)、畢沅(1730-1797)、朱珪(1731-1807)、阮元(1764-1849)等人，也不過是這類思想史敘事中的「小角色」。然而，當我們仔細地審閱十八世紀的各種文獻後，很容易發現這些「小角色」才是真正翻雲覆雨，手握重權的人物。這些人物雖然在余英時所稱的「思想之內在理路」中並不出

---

China),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96, pp. 181-192; Minghui Hu, "Chapter Three: Measuring the Cosmos: A Construction of Celestial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osmopolitan Confucians (1664-1820)*, UCLA Ph.D. Dissertation, forthcoming in June 2002.

<sup>20</sup> William Rowe, *Saving the World*, pp. 450-455.

<sup>21</sup> William Rowe, "Social Stability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9, Early Ch'ing, edited by Willard Peter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色，但卻在思想文化蔚成風潮的關鍵時刻，扮演著無可替代之參與者與守護神的雙重角色，並提供所需的金錢物質與官方支援。<sup>22</sup>不過，陳宏謀也不是這類人物。陳宏謀是一位辦事一流的人物，但卻不是一位卓然自立的思想家。換言之，陳宏謀既不是江南的經師文士，也不是書院山長，更不是到處蓋書院、倡導「國朝實學」以變更科舉風氣的官員。那麼，研究陳宏謀的意義何在呢？

研究陳宏謀的意義，具體展現在理論與實踐的交會點上。作為歷史中實踐者的陳宏謀，如何在十八世紀清政府與社會結構的制約下，去打造這部國家機器，並解決社會問題呢？陳宏謀於此實踐中所產生的種種「思路」，才是這一類型史學研究的意義所在。Rowe 認為，陳宏謀這種在實踐中匯集出的行動思路具有典型性。陳宏謀無疑地是雍正及乾隆朝中的傑出官員，而且他的思路中所反映與隱含的，極有可能是主流官場中的「共同心聲」。十八世紀江南的經師文士及書院山長則極有可能不喜歡這種「共同心聲」，才轉而追求思想的純淨、圓融與深刻。<sup>23</sup>「主流」的三百年學術思想史大部分描寫獨特的思想家，而「非主流」的文化史則描寫大部分平凡的官僚或甚至下階層的人民。孰是主流、孰非主流的問題，有效地拓寬了傳統思想史的做法。

Rowe 這本書中最具爭議性的，莫過於作者始終無法忘情的比較史學。許多比較社會史學者都曾指出，中國和歐洲於十八世紀中期均發展出類似的社會文化模態。比如說，中國與歐洲的印刷文化及農民識字程度都有相當的成長；雙方都對兩性在社會中應扮演的角色有過深入的辯論；雙方的社會分工都漸趨複雜，而且社會階層之間自我認同的界限逐漸模糊，雙方在現實的社會階層流動機制(social mobility)裡，向上或向下的流動速度都逐漸變快。<sup>24</sup>Rowe 的比較史學觀其實是構築於以上的社會史研究成

<sup>22</sup> Benjamin Elman, *Classicism, Kinship, and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 1-35.

<sup>23</sup> Benjamin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88-137.

<sup>24</sup> William Rowe, *Saving the World*, p. 455. 參閱 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Wiley & Sons, 1962. Benjamin Elman 在其新作中，對此一機制(in terms of social mobility)提出了更全面有力的修正與說明(in terms of social reproduction)。請參閱 Benjamin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果。Rowe 認為，面對如此類似的社會文化模態，中國的官僚精英(official elite)與啓蒙時代的歐洲思想家如果沒有作出類似的回應，那才是文化史上相當奇特，應該大書特書之處。言下之意，對於陳宏謀的實學與同時代歐洲思想家的相似處，我們實在無需大驚小怪。

更有甚者，Rowe 還強調陳宏謀的實學充滿了「近代早期」(early modern)的思想風格，例如陳宏謀對商業活動一貫的支持，具有某種程度的「資產」(property)觀念，鼓勵區域經濟的貨幣化，以及肯定商人對「利益」(interests)的追求等。Rowe 這些有關中西經濟思想對比的討論，爭議的空間並不大，但 Rowe 對於清政府組織之外的公共領域的描寫，肯定是一個方興未艾的爭議性話題。<sup>25</sup>基本上，Rowe 將清政府組織之外，定義為一個以鄉為基本單位所構成的「天高皇帝遠」之社群(community)。對這種說法，史學家黃宗智和 Susan Naquin 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見。比如說，黃很小心地界定了縣官正式判案權力行使的範圍，以及宗族中非正式協調而縣官之權力無法觸及的領域，然後指出依兩者相互運作而存在的第三種可能性，黃稱之為「第三領域」(the third realm)。<sup>26</sup>Naquin 則乾脆拒絕在理論上予以命名，只在她的書中討論了北京廟宇在朝廷和宗族之外，提供了另一種結社活動的場合。<sup>27</sup>相形之下，Rowe 顯得更傾向於將歐洲與中國經驗中所謂的公共領域（國家機器之外的社群）作更直接的比較分析。這種作法相當引人入勝，當然也比較危險。

異文化之間的結構性比較，拓寬了我們了解歷史的縱深與視野。事實上，跨文化的比較，的確可以讓我們對陳宏謀的歷史位置有更深的體會。另一方面，我們若順著歷史的時間座標，仔細地搜尋各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則會帶我們回到陳宏謀的「樞紐性」。這個「樞紐性」至少有兩層意義。第一層意義指的是陳宏謀之活躍期（雍正及乾隆初年），即清政府最

---

Press, 2000.

<sup>25</sup> William Rowe, *Saving the World*, pp. 377-405.

<sup>26</sup> Philip Huang, "Between Informal Mediation and Formal Adjudication: The Third Realm of Qing Justice," *Civil Justice in China: Representation and Practice in the Q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10-137.

<sup>27</sup> Susan Naquin, *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 xxxi. Chapter 14 "Religious Association," pp. 499-554, Chapter 15 "Temples and Private Purposes," pp. 565-612 和 Chapter 16 "Temples and Public Purposes," pp. 622-671 都有詳實的描寫。

能有效因應社會變動之時期。Rowe 認為，大約在 1770 年代左右（陳宏謀於 1771 謝世），清政府的官僚系統已經無法掌握當時人口激增與社會變遷加速的局面。研究陳宏謀的政治、經濟思想所能表現出的，就在於這穩定繁榮的社會扭轉到左支右絀、分崩離析的關鍵時刻中，清政府在政策面的強烈對比。

第二層意義則在於陳宏謀的遺產。就思想文化的面向而言，大約在 1770 至 1820 之間，李光地家的官方「閩學」在漢學家們的口誅筆伐之下，已經慢慢地銷聲匿跡；而另一方面，漢學家們則在勞師動眾的《四庫全書》編纂過程中聲勢壯盛。<sup>28</sup>桐城派文人則始終對漢學不以為然。他們對「文」的書寫，展開了各式各樣的反省。<sup>29</sup>在 1820 年代前後，清官僚系統的左支右絀已經十分明顯，道光皇帝便經常為財政所苦。<sup>30</sup>這個時候從桐城文人中出現了一批經世學者，專門攻擊十八世紀盛行於江南的漢學。其中火力最強的就是 Rowe 在書中經常提起的魏源。<sup>31</sup>他嘗言：

然近日治漢學者，專務記醜，屏斥躬行，即論洙泗淵源，亦只云定、哀間儒者之學如是。……其意欲託尊《論語》以排思、孟，甚至訓「一貫」為「壹行」，以訓詁為生安之學，而以踐履為困勉之學。<sup>32</sup>

如此一來，一個世紀的江南漢學，在魏源的眼中，成了為抵制宋學的「記醜」活動。魏源接下來的話中所作的批評，則是衝著漢學家的守護神阮元而發。魏源譏諷阮元在詁經精舍作學問，是一種為了逃避社會責任而埋首故紙堆的做法。更令魏源氣憤的是，阮元居然讓最重要的「躬行踐履」在其學術中敬陪末座。魏源在 1826 年編纂《皇朝經世文編》時，也因此和

<sup>28</sup> R. Kent Guy,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ien-lung Er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Benjamin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sup>29</sup> Theodore Hutters, "From Writing to Literature: The Development of Late Qing Theories of Pros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7.1 (June 1987): 51-96.

<sup>30</sup> 林滿紅，〈明清的朝代危機與世界經濟蕭條——十九世紀的經驗〉，《新史學》，卷 1 期 4(1990)，頁 128-130。

<sup>31</sup> William Rowe, *Saving the World*, p. 455; Philip Kuhn, "Ideas behind China's Modern Stat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5.2 (Dec., 1995): 295-337.

<sup>32</sup> 魏源，《古微堂外集》，卷一，〈論語孟子類編序〉；轉引自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再版二刷），頁 588。

阮元稍早所編的《皇清經解》大唱對臺戲。<sup>33</sup>魏源就是在這個節骨眼上，反擊阮元，從而大力標榜陳宏謀為十八世紀中一位具有真知灼見的「有為之士」。在魏源筆下，陳宏謀不但是十八世紀的中流砥柱，也是十九世紀經世學的開路先鋒。陳宏謀思想遺產在一般所謂的「漢宋」鬥爭中，也就顯得十分關鍵。

對於從十七世紀的朝代輪替到十九世紀末的急遽世變，史家們已投入大量的時間與精力，去探討變動中的近代中國。十八世紀在「社會」與「文化」這兩方面，都展示著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味道。西方學界大致認為，這種變動，並非只是有清一朝的興衰，而是整個中華帝國發展到最後，一種強弩之末的氣象。在此氣象之中，孕育著近代中國的胚胎。從中英鴉片戰爭到太平天國，近代中國正式登場。研究十八世紀中國的史家們，近年來也不斷地為我們勾勒出這種由「強弩之末」到「近代中國」的輪廓。Rowe 本人可謂其中翹楚。在 *Saving the World* 這本書中，Rowe 由小見大，徵引了大量十八世紀中國研究的文獻，不但為社會史學者所使用的材料，提供了一個歷史當事人的統一視野，而且對十八世紀在近現代中國史之「社會」及「文化」的樞紐位置，及時作了一個重要的補白。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76)

#### 一個經濟小兵的故事：顧應昌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劉素芬·莊樹華 紀錄：向明珠·陳怡如 215 頁 平裝 250 元

顧應昌先生 1918 年出生，祖籍江蘇省嘉定縣。上海聖約翰大學會計系畢業，美國伊利諾大學會計學碩士、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曾任職華盛頓聯合國遠東委員會中國代表團，並曾任教密西根州立大學、密西根大學等。1968 年榮獲中央研究院院士。先生於 1960-1970 年代擔任臺灣經濟顧問，1980 年代參與大陸經濟改革，對於海峽兩岸經濟發展卓有貢獻。

<sup>33</sup> Benjamin Elman, "The Relevance of Sung Learning in the Late Ch'ing: Wei Yuan and the Huang-ch'ao ching-shih wen-pien," *Late Imperial China*, 9.2 (December 1988): 56-85.

# 評介王汎森撰《傅斯年：史學與政治之間的一生》

潘光哲\*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By Wang Fan-sen  
王汎森.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在近代以降的中國歷史舞臺上，若干聲名顯著的「鉅型知識分子」，載浮載沈於人世之間，他們走過的人生道路與刻鏤的思想軌跡，在在蘊括著足可深化後人認識時代變易趨向的內容。好比關於「五四」世代風雲人物的述說，便蔚為大觀。然而，並不是每一位「五四之子」都享有被刻鏤在歷史記憶世界的榮光。例如，從彼時起就是頭角崢嶸的弄潮兒，絕對應該名列在這張名單之上的傅斯年(1896-1950)，始終缺乏一部述說詳縝、論證清晰的全傳，便毋寧是樁憾事。畢竟，傅斯年雖然僅只享有短短的 55 年中壽，他的生命歷程卻是波瀾壯闊，難能信筆草略勾勒。

傅斯年嘗夫子自道曰，自己的職業「非官非學」。<sup>1</sup>確實，他的身分，相當複雜而多樣，好比在 1938 年 7 月這個時間點上，他既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所長，又是中央研究院（代理）總幹事，還身兼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一句話，與他的生命旅途相關的領域廣泛至極。更何況，早從「五四」時代身為秀異群倫的知識青年起，直到「歸骨於田橫之島」的 1950 年，傅斯年和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學術／政治世界的脈動，更都有著密切的牽涉。意欲精確描摹與分疏傅斯年這多重身分的生命史和相關的思想／學術／政治軌跡，所要開展的「知識探險」活動，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sup>1</sup> 傅斯年，〈《性命古訓辨證》序〉，收入：《傅斯年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冊 2，頁 161（總頁 493）；本文自署繫年為 1938 年 7 月。

實在漫無邊際。是以，王汎森（以下簡稱作者）的《傅斯年：史學與政治之間的一生》（以下簡稱本書），在詳密的史料基礎上，務求精確重建傅斯年的生命軌跡，並且細膩描摹他與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多樣互動關係，正是彌補了既存闕憾的力作，也啓示我們如何藉由知識分子的生命史個案研究，從而對於歷史複雜多樣的面向，有著更形深入的思考和理解。

## 一

整體而言，本書採取撰述與重建歷史人物之生平與思想的標準寫作格式，基本上依據時間序列來述論傅斯年的生命與思想道路。

從時代背景觀察，傅斯年呱呱墜地的 1896 年，正是中國方甫遭受「甲午」屈辱的歲月，他就是在此後一連串「救亡」和「啓蒙」行動和思想趨勢裡成長的（導論）。以下數章，分別述說：傅斯年在 1920 年赴英留學之前的青年歲月，他在「新文化運動」裡嶄露頭角的具體行動與思想（第 1 章）。在海外「游學」，漂泊於英、德之間長達六年半的傅斯年，大部分時間都以自然科學為專業。不過，回到中國的他，卻成就了史語所的新學術團隊，為二十世紀中國的學術別開新天地。這段轉折與史語所的學術業績，是第 2 章的述說中心。傅斯年個人的學術貢獻，則是第 3 章、第 4 章這兩章的焦點，分別討論傅斯年關於中國古史研究的影響所在，並且既從清代考證學的學術脈絡，也從「新文化運動」以降的思想氣候裡，解析其《性命古訓辨證》的成就和意義。然而，傅斯年和史語所的新學術團隊能夠專心治學的時光實在不長，1930 年代以降，日本向中國節節進逼的燄火，讓傅斯年（及其同儕）不得不沉重地思考「書生何以報國」的問題。思想、學術與現實之間的多重糾結，更在在不能迴避，挑戰重重，傅斯年有《東北史綱》之作，專駁日本人「滿蒙在歷史上非中國領土」論，便是具體的例證之一（第 5 章）。待得中日戰爭全面爆發，直到生命的終點，在世潮的激烈變動裡，傅斯年非但捲入政治漩渦——例如，他公開立論，呼籲國民黨政府應該「徹底肅清孔、宋二家侵蝕國家的勢力」，被視為「清流」；然而，毛澤東卻也點名批判他是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控制的知識分子之一——他個人的思想趨向也有變易——傅斯年不再是「反傳統」的青青子衿，他對中國傳統有了新的體會與理解，《孟子》成爲臺大「新鮮人」的必修教材，他希望學生讀了《孟子》之後「覺得人

有高于禽獸的價值，尤其是讀書人應該有自尊心」<sup>2</sup>——簡言之，「五四青年」的生命晚期，是第6章的敘論主題。在全書終章部分，作者提醒我們，「愛國赤忱」(patriotism)固然是傅斯年的生命歷程裡最重要的終極動力。不過，傅斯年對於中國的熱愛與期望的行動和表現，卻往往不免顯現出「一團矛盾」的緊張態勢。似乎，在作者筆下，這是「五四青年的挫敗」的反映，但又何嘗不是理想中國的挫敗呢！

### 三

正因為傅斯年的生命與思想的軌跡多樣而複雜，如何精確重建，詳縝描摹，在在考驗著研究者的智慧和心力。洋洋七巨帙的《傅斯年全集》固然是最基本的資料，然而，猶如傅斯年於〈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所揭櫫的「法則」之一：「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所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便退步」，研究傅斯年，亦復如是。以往若干關於傅斯年與史語所史學成果的討論，大都還停留在依據《傅斯年全集》這套書進行描述的層域，<sup>3</sup>對比之下，本書則是實踐傅斯年這條「法則」的具體表徵，獲致的成果，自是格外豐碩。

例如，針對未收入《傅斯年全集》的公開著述（特別是青年時期的），作者進行了佚文重集的工程，豐富了我們對於傅斯年在「五四」時代的意念所趨的認知。在「新文化運動」裡，傅斯年是站在「新潮」浪頭上馭浪而行的新青年。然而，對理想中國有著多重想望的他，如何實踐這些期待，在中國的現實裡找不到答案，他嚮往從西方那兒找到「真學問」，可以解決他心懸繫之的「大問題」。決定啓程赴英留學的傅斯年，卻從國文系轉向研究心理學，因為他認為，「心理學為心理的、社會的科學之根源」。他還宣稱自己在研究心理學之前，「去研究動物學、生理學、數學」；他不抱定必然要取得學位的想法，「如此迂遠，成功上實在講不定」，反而勇敢地自我鼓勵道：「我寧可弄成一個大沒結果，也不苟且就於一個假結

<sup>2</sup> 傅斯年，〈致諸同學第二封信〉，原刊：《臺灣大學校刊》，期92（1950年11月6日），收入《傅斯年全集》，冊6，頁296（總頁2292）。

<sup>3</sup> 例如，蔣俊，《中國史學近代化歷程》（濟南：齊魯書社，1995），關於傅斯年史學理念的描述，基本材料未逾《傅斯年全集》之範圍（頁124-136）；其他單篇論文的情況，不詳舉例。

果」。傅斯年的這段自剖，經由作者的挖掘，終於重見青天（頁 56）。<sup>4</sup>

作者並不以佚文重徵為滿足，更羅掘俱窮式地尋訪、徵引各種未刊資料，從而詳縝地勾勒出傅斯年的生命／思想道路，調查傅斯年在倫敦大學的就學讀書紀錄（頁 57），即是例證之一。不過，目前仍收藏於史語所的「傅斯年檔案」則是本書最為重要的史料基礎，仰仗著其中蘊涵的大量素材，不論是傅斯年個人的生命史，抑或是史語所的發展歷程，作者的描繪，精密絕倫，確實令讀者嘆為觀止。

就傅斯年生命史的私人領域而論，他結束了由家庭安排的婚姻，另與俞大綵締結良緣，這樣的行為，普見於當時知識分子之間。但是，前一段婚姻的結束，卻讓傅斯年扛負了一筆債務（頁 72-73）。傅斯年深切關懷現實，對孔、宋家族的抨擊，尤是不遺餘力，公眾咸曉，世有「傅大炮」之稱。然而，他在私密場合裡如何費盡心思，要求蔣介石撤掉孔祥熙的職務，抑或收集可以揭發孔祥熙「化公為私」的貪瀆舞弊罪狀，就得有賴於作者依據「傅斯年檔案」裡的文件，使之撥雲見日了（頁 167-170）。又如，胡適發表於 1934 年的〈說儒〉，引發學界相當的爭論，<sup>5</sup>作者從「傅斯年檔案」裡找到了胡適向傅斯年致意的親筆短簡，得以更清楚地論證，〈說儒〉的撰成實際上是受傅斯年〈周東封與殷遺民〉的啟發（頁 122）。傅斯年的社會關係網絡，為史語所的發展提供了資源，也幫助了在戰爭期間陷於困頓的學人——如傅斯年將梁思成、思永兄弟「危苦之情，上聞介公（即蔣介石）」——作者靈活地徵引「傅斯年檔案」，讓這些史實方始大白於天下（頁 92）。又如本書附有傅斯年的兩篇文件遺稿英譯本，也是作者從「傅斯年檔案」裡挖掘出來的；一篇是反映傅斯年史學方法論意旨與顧頡剛大異其趣的〈戲論〉，另一篇則是 1946 年傅斯年出席政治協商會議席間與陳布雷討論蔣介石政治性格的筆談紀錄（頁 205-207），都是彌足珍貴的資料。<sup>6</sup>

<sup>4</sup> 傅斯年，〈留英紀行〉，《晨報》，1920 年 8 月 6 日~7 日，7 版；按，本文未收入《傅斯年全集》。

<sup>5</sup> 相關研究，例如：鄧廣銘，〈胡著〈說儒〉與郭著〈駁說儒〉平議〉，收入：劉青峰（編），《胡適與現代中國文化轉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頁 387-395；不過，鄧廣銘並未言及傅斯年對胡適〈說儒〉的啟示。

<sup>6</sup> 這兩份文稿又見：王汎森、杜正勝（合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臺北：傅斯年先生百齡紀念籌備會，1995），頁 86-87, 135。

傅斯年在 1930 年代以後中國學術建制裡的地位，相當重要；他與當時知識分子往還的社會關係網絡，也相當多樣。藉由作者的示範，可以想見，「傅斯年檔案」蘊藏的內容，無疑是建構、研析中國現代學術史／知識分子群體不可或缺的基本素材。

#### 四

對於某位在二十世紀中國史上有獨特地位的知識分子（不論是其思想歷程或是其人際關係），抑或是對提供知識分子發表言論的期刊、雜誌裡涵括的某個課題（例如「民主」、「婦女解放」）的言論，只要越能進行精細的個案探討，一個個的個案積累起來，越能幫助我們做好勾勒做為社會群體的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之生命旅程與思惟趨向的全貌的準備工作。<sup>7</sup>本書以豐富的史料基礎精確解析傅斯年的生命史，並且動態地展現了他的思想道路，自然是知識分子個案研究的卓越成果。

身為「五四之子」，傅斯年對於中國傳統的認識與理解，自然和時代思想趨向相互呼應。然而，作者成功地論證了，在「五四之子」的內心深處，卻是「一團矛盾」，他們既擔憂既存的那些價值系統實在有誤於中國之未來，可是要掙脫舊習慣的束縛，筆直地朝向理想大道上前進，其間之艱苦，有甚於所能想像者（頁 48-53）。即如「五四」時期的傅斯年進行自我思想解剖所透露的苦悶：

我們自己以為是有新思想的人，別人也說我們有新思想。我以為慚愧得很。我們生理上，心理上，馱著二、三千年的歷史——為遺傳性的緣故——又在「中國化」的灰色水裡，浸了二十多年，現在住著的，又是神堂，天天必得和廟祝周旋揖讓：所以就境界上和習慣上講去，我們只可說是知道新思想可貴的人，並不是徹底的把新思想代替了舊思想的人。我不曾見過一個能把新思想完全代替了舊思想的人。……<sup>8</sup>

<sup>7</sup> 筆者的這些思考，另見：潘光哲，〈就在半夢半醒之間：評倪邦文，《自由者尋夢——“現代評論派”綜論》〉，《臺灣歷史學會通訊》，期 6（1998 年 3 月）；惟其是否有當，自必待學界先進批駁教正。

<sup>8</sup> 傅斯年，〈中國狗和中國人〉，原刊：《新青年》，卷 6 號 6（1919 年 11 月 1 日），收入《傅斯年全集》，冊 5，頁 48（總頁 1598）。



在傅斯年此後的生命道路上，這樣的苦悶與緊張，始終不絕如縷。史語所的研究課題和成果，在「國難」當頭的時分，不能滿足以歷史型塑「國族認同」（或其他政治、社會目標）的世俗要求，可是傅斯年自己卻動筆寫《東北史綱》，這部書還因準備不足等原因，既與史語所的嚴謹學風大相逕庭，又普受史界同行批判（頁 149-152）。他在 1942 年又有此自我省思：

我本以不滿於政治社會，又看不出好路線來之故，而思遁入學問，偏又不能忘此生民，於是在此門裡門外跑去跑來，至於咆哮，出也出不遠，進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無成也。……<sup>9</sup>

在「學問」與「生民」之間徘徊，做為「書生」的傅斯年，此後的學術成果確實乏善可陳（頁 165-166）。本書的示範性成果，正提醒了我們對於知識分子的思想軌跡與內心世界，應當要有更細膩精緻的理解。

## 五

藉著知識分子的生命史個案研究，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與思索時代的變化趨向和軌跡。然而，以個體為主角的研討取向，則也可能顯現出「見樹不見林」的闕憾。作者雖然沒有設計特別的寫作策略來描述傅斯年的生命／思想歷程，卻靈巧地採取「對比」的書寫筆法進行析論，「立體化」地展現了傅斯年生命個體／活動的意義。

舉例而言，傅斯年身受「五四」若干共同理想趨向的浸染，像自由、平等、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等等理念，也都是他的思考課題。作者清楚展現了傅斯年對於個體自由和經濟平等之間的選擇，如何隨世局而流轉，凸顯出知識分子個體思想變遷的動態歷程（頁 189-190）。在作者筆下，傅斯年成就了史語所這個新學術團隊，既是出現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中國思想／文化舞臺上的追求「學術社會」(an academic society)的理想（頁 3-5）的具體實踐（頁 69-70），伴隨著這個理念而來的則是「學術（史學）專業化」的努力，在在意味著現代意義的研究取向和學術規範（例如，進行歷史課題的「專題研究」，而不是提出歷史通則／規律）的問世（頁 79-81）。就這樣的學術史意義而言，無怪乎作者會提示道，我們最好不要拘泥於這

<sup>9</sup> 〈傅斯年致胡適函〉，「傅斯年檔案」，檔號 1：1676（本函繫年為 1942 年 2 月 6 日）；又見：傅樂成，〈傅孟真先生年譜〉，收入《傅斯年全集》，冊 7，頁 304（總頁 2648）。

樣的思惟：傅斯年領導下的史語所成就的業績，究竟可以和那一個西方史學流派（例如，德國的「蘭克學派」〔Rankean school of Historiography〕）等同並觀（頁 63〔註 45〕）？——當然，這並不表示不需要從宏觀的比較史學史角度來理解傅斯年／史語所的成果和意義，作者就屢屢取「蘭克學派」（或蘭克本人）的史學方法或表現，進行對比（例如，重視史料的共相〔頁 90〕；「蘭克學派」與政治的互動〔頁 144〕；不詳舉例）。

就傅斯年個人的學術業績而言，作者將傅斯年研析中國古史的創獲（如〈夷夏東西說〉等著述），視為「中國文明的多元起源」理論觀點的一環，並且與有著類似觀點的同代學者（如蒙文通、徐旭生），也與後繼學者（如張光直）的研治成果，進行對比，以凸顯傅斯年的貢獻與闕漏（第 4 章；不詳舉頁碼）。傅斯年說過：

此後中國上古史之康衢，要以發掘遺物，參以經典，而重建其最足傳信之上古歷史也。<sup>10</sup>

作者也提示我們，理解傅斯年的如是認知，不要忽略了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先導之功（頁 101-102）。<sup>11</sup>學術薪火，相傳綿延，積聚映照，吹散中國文明的歷史謎霧，也顯現出燦爛的新象。本書細緻而獨到的「對比」功夫，深具值得學界後進細心體會揣摩的示範意義。

## 六

作者奉「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為重建傅斯年生命史的實踐原則，深化了我們的理解，確實使本書成為「傅斯年研究」的里程碑，也是研究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這個社會群體時必需參照的作品。本書如果能有漢譯本的問世，必然更能為漢語學界提供進一步的助益。

<sup>10</sup> 傅斯年，〈中國上古史與考古學〉，「傅斯年檔案」，檔號 I：807；按，本文撰稿具體時間不詳，以文內言及「今侯家莊，猶有商王宮殿，其墓亦在焉」，當係指殷墟第 10 至 12 次發掘（1934 年 10 月至 1935 年 12 月間）之成果（見：石璋如，〈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年表〉（楊梅：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2），頁 18-20；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墟的發現與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頁 11-12），是以當在 1935 年以後。

<sup>11</sup> 作者另有專門研討傅斯年與王國維學術關係的論著，文末選附刊自傅斯年藏書裡輯錄所得關於王國維學術的眉批，彌足珍貴；見：王汎森，〈王國維與傅斯年——以〈殷周制度論〉與〈夷夏東西說〉為主的討論〉，收入：《紀念王國維先生誕辰 120 周年學術論文集》（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頁 10-31。

不過，本書不是「傅斯年百科全書」，或許難能要求面面俱全。例如，作者表示本書的主題之一是傅斯年組織與領導下的學術社群(the academic community)——包括了史語所、北大和臺大(頁7)——可惜，本書除了對於傅斯年身為代理北大校長的做為，有相當篇幅的述說之外(頁174-179)，其餘涉及北大的部分，述論略有不足。畢竟，傅斯年在1929年兼任北京大學教授後，育天下英才，取「拔尖主義」，為史語所補充新血輪；從1939年起，他還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所務實際上由鄭天挺負責<sup>12</sup>——他在北大的影響，非僅止於代理校長的一段而已。本書卻僅只言及傅斯年任教北大，提出「專題研究」的取向，影響了他的學生輩(頁80)。顯然，傅斯年與北大的多重關係，是個可以持續研析的題目。

本書立足於詳密的史料基礎，細膩描摹傅斯年的生命史，可能正因為史源文獻繁多，不免略有誤失。例如，本書言及顧頡剛致函胡適，勸說若欲「作政治活動」，「最好加入國民黨」；這封信的出處當是《胡適來往書信選》<sup>13</sup>，本書則註以“ibid”，亦即同前註57，而使出處成為《傅斯年全集》了(頁66〔註58〕)。又如，傅斯年本人自視《性命古訓辨證》為其代表作之一，<sup>14</sup>問世未幾，便引起學界的迴響，<sup>15</sup>甚至如左派史家趙紀彬也有所回應，然本書徵引時卻誤註出處。<sup>16</sup>瑕不掩瑜，這些小誤失，並不妨礙專業研究者從本書裡得到的知識樂趣與思考啓發。

<sup>12</sup> 鄭天挺，〈鄭天挺自傳〉，收入：《鄭天挺學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頁390-391；另參見：任繼愈，〈回憶鄭毅生先生幾件事〉，《鄭天挺學記》，頁41-42；另，「傅斯年檔案」收藏有鄭天挺信函多封，涉及北大文科研究所所務者甚眾，可見傅並非掛名備職而已，不詳述。

<sup>13</sup> 顧頡剛，〈顧頡剛致胡適(1927年2月2日)〉，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香港：中華書局，1983)，上冊，頁424-429。

<sup>14</sup> 1948年進行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選舉時，傅斯年作為院士候選人，自評《性命古訓辨證》：「以語言學之立點解決哲學史之問題，是為本卷之特點，在中國尚為初創」；見：王汎森、杜正勝(合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頁154。

<sup>15</sup> 對於《性命古訓辨證》的批評，始終不斷，徐復觀在1960年代初期刊行《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7版〕；書〈序〉自署繫年為1962年)，批評甚厲，即是一例。不過，本書並未討論徐復觀的批評意見。

<sup>16</sup> 趙紀彬，〈讀《性命古訓辨證》〉，《趙紀彬文集》(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第2集，頁7-14；本書誤註出處為《趙紀彬文集》第1集(頁126〔註1〕；參考書目部分亦誤(頁230))。

像傅斯年這種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史上有獨特地位的知識分子，他的生命／思想歷程抑或是人際關係，總會有訴說不完的故事。然而，未來模塑傅斯年形象的風潮，即便千層堆雪，本書的研究業績，必然是它們必需仰仗的起點。

###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 第九期

論 著

279 頁

平裝 300 元

胡 纓：歷史書寫與新女性形象的初立：從梁啟超〈記江西康女士〉一文談起

呂芳上：法理與私情：五四時期羅素、勃拉克相偕來華引發婚姻問題的討論(1920-1921)

周慧玲：「性感野貓」之革命造型：創作、行銷、電影女演員與中國現代性的想像(1933-1935)

游鑑明：千山我獨行？廿世紀前半期中國有關女性獨身的言論

學術討論

Rebecca E. Karl 著；呂妙芬、許慧琦譯；楊芳燕校訂：中國的歷史與性別

俞彥娟：從婦女史和性別史的爭議談美國婦女史研究之發展

研究動態

令狐萍：美國華裔婦女的研究及其方法論

書 評

蔣竹山：評介 *Sex, 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連玲玲：婦女運動與運動婦女：評介《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

# Liberalism, History, and the Chinese Tradition

Peter Zarrow\*

*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 The May Fourth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 By Q. Edward Wang 王晴佳.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

Historians live in the present and yet read in, read about, and write of the past. By the 1910s, as is well known, Chinese intellectuals were forthrightly considering the question of how much of the Chinese past—if any!—was worth preserving and to what end. Some of these intellectuals became full-time professional historians while others pursued historical research some of the time and others discussed historical questions only in the context of their presentist interests.

We later historians have come to refer “May Fourth” as shorthand for the self-conscious “Enlightenment” or “Renaissance” movement of certain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the late 1910s and the 1920s. Since the student protests of 4 May 1919 and subsequent demonstrations, strikes, and boycotts in various Chinese cities were political rather than cultural in nature, the apotheosis of “May Fourth” is an interesting and important issue in its own right.<sup>1</sup> My own view is that we can more precisely discuss new intellectual trends in terms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hat started a little earlier, say in 1915. Nonetheless, Edward Wang is in good company in labeling the entire phenomenon “May Fourth”, and I do not mean to nitpick. *Inventing China*

---

\*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高級講師

<sup>1</sup> “May Fourth” in this sense is well discussed in Tse-tung Chow,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and Vera Schwarcz,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Through History* is a study of how new approaches to Chinese history-writing was part of the larger May Fourth movement (cultural *and* political) through the 1920s and how it was shaped by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ism of the 1930s.

Wang distinguishes roughly between three groups of historians: the traditionalists, the Marxists, and the liberals, and his book focuses solely on the liberals. That is to say, it is a careful study, particularly of Hu Shi 胡適, Fu Sinian 傅斯年, Gu Jiegang 顧頡剛, He Bingsong 何炳松, and others. Of course, there are only foggy boundaries between liberalism and traditionalism on the one hand (Wang discusses Chen Yinke 陳寅恪, who, it seems to me, might be put into either category) and liberalism and Marxism on the other (what historian could entirely avoid discussion of class struggle?). The “liberal school” of historians, then, appears to have been “liberal” for Wang first in the larger political commitments of the individual scholars and second in their approach to history. The two qualities were related. As a public intellectual, Hu Shi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cause of liberalism as such, but others as well stood for an attempt to combine respect for constituted authority, such as it was, with free and critical thinking and—in Hu’s case—with “experimentalism”, by which he meant the careful testing of hypotheses through evidence. Such liberal commitments were sorely tested in the 1930s. Nonetheless, their approach to history included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sources, on which all historical judgments were to be based. History-writing, in the liberal approach, was to avoid larger philosophical issues and premises, focusing on such questions as the evidence could answer.

As well, Wang emphasizes that the “liberal” historians attempted to combine a certain appreciation for parts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 with Western notions to create a truly Chinese form of modernity. The advantage of Wang’s approach lies in his thorough analysis of a particular group of historians that might be defined as a school—though more could be said about what constitutes a historical school. Furthermore, in this case the approach might well describe the “traditionalists” also, and even Marxists found certain aspects of a heavily redefined popular Chinese tradition useful; only the

emphasis differed. A stronger disadvantage is that although the book is something of an overview, focusing on two decades but commenting on Chinese history-writing over the entire twentieth century, it has nothing to say about the other schools nor even much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liberals and the other two groups. Of course, it is not fair to judge Wang on the basis of the book he never intended to write, but given that the liberals' "liberalism" lies in their relations to traditionalism and Marxism, its precisely role in history-writing remains rather hazy.

If "critical consciousness" lies at the root of both liberalism and a certain approach to history, Wang actually has less to say about this than the specific historiographical ideas that began to dominate the Chinese academy in the 1920s and, then, the great pressures that forced something close to their dissolution in the following decade. The heart of the book, then, is a history of two decades of ideas about history-writing. It is divided into three main thematic sections: scientific history, the search for equivalences i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nd the impact of the national crisis of the 1930s. Of course, there is a certain amount of overlap: scientific history could be nationalistic (or not), as especially was the search for equivalences.

For Wang, the liberals' accomplishments were not only to link history to the nation and help China's re-creation through the forging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but also to turn history into scientific discipline in its own right. Scientific history meant a reliable, verifiable account of past events, with no attempts to link the past to moral lessons or larger significance. Wang emphasizes that "their attempt to understand the past from a present perspective has turned Chinese historiography from a passive act of preservation into an active pursuit of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or a continuum of knowledge that constantly updates information of the past with new outlooks and new meanings" (p. 26). That is to say, they turned history into a constantly changing dialog between now (us) and past (them). As well, their radical critique of tradition was combined with the creative discovery of traditions that could be used in—or were necessary for—national history.

Wang does not directly analyze whether science and nationalism were mutually contradictory in this context, but he does imply that in the effort to do history inspired by both, historians such as Hu Shi, He Bingsong, Fu Sinian, Luo Jialun 羅家倫, Yao Congwu 姚從吾, and Gu Jiegong, as well as Chen Yinke, found themselves making new use of tradition. If some of them appeared iconoclastic in their reexaminations of old verities, their search for origins brought them back to ways in which tradition might be made useful. The question Wang does not directly confront, however, is this: the very attempt to find traces of science in ancient philosophy, begun by Hu Shi, implied that the past was still living—or else why bother with such an investigation?—yet how vibrant could this history be since this attempt was prompted by standards and ideals that came from outside it?

Wang does refer us to Joseph Levenson, and in a larger sense Levenson's ghost hangs over this entire book. Levenson asked, how did China's new intellectuals (in this case, historians and others writing about history since the late Qing) deal with China's past?<sup>2</sup> The old sense that in history and the classics lay moral patterns, even cosmic patterns, the lessons of good government, and in some sense meaning itself—this seemed irrecoverable by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us, according to Levenson, was value (desired modernity, in today's terms), separated out from the past, which became merely a reservoir of sentimental attachment (or sometimes disinterested scientific curiosity: the stuff of museums). Many scholars have disputed Levenson's overly stark dichotomy, though it should (once again) be pointed out that it was a dichotomy that presumably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Levenson's own Jewish heritage—and also one that might be ascribed to history in modern times universally. European or Western alienation from the past is hardly unknown.<sup>3</sup> Nevertheless, critics of Levenson have also pointed

---

<sup>2</sup> 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esp. vol. 3.

<sup>3</sup> Part of this alienation in the West takes the form of sentimental pseudo-engagement with the past: popular “medieval” or “Renaissance weekends” where for a fee people can dress up in fancy costume



to the impossibility of drawing clear lines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given the numerous conscious and unconscious continuities that mark all our lives, whether we will them or not. Indeed, perhaps history can never be a source of meaning, though it may contribute to identity (identities).

To come back to Wang's analysis, he concludes that Levenson's thesis ultimately fails because it oversimplified the dichotomy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hich in fact both the traditionalist and the liberal historians in a sense transcended. In other words, they found that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can supplement each other, especially in the writing of national history, where appropriation of the past is viewed as a matter of course" (p. 7).<sup>4</sup> Nonetheless, parallel dualisms tend to mark much of this book: tradition/modernity; China/West; content/method; Chinese history/Western models. Generalizing about the May Fourth historians, Wang concludes that their world exhibited two "dimensions": methodologically transnational and cross-cultural (that is, scientific history based largely on models from the West and Japan) but ideologically nationalistic (that is, research and writing that could contribute to national salvation). This led to a "dilemma" (p. 21): imitation versus identity—and we are back to Levenson.<sup>5</sup> On the one hand, "imitation" of Western historical methodology (and I would add: standards not only of research and writing but also of historical *results* such as modernity). On the other hand, "identity" that needed to come from the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The "traditionalist" historians such as those associated with *Critical Review* (*Xueheng* 學衡) tried to deal with dilemma by emphasizing, even glorifying

---

and play with swords and lances, or (in the United States) well organized recreations of Civil War battles. Touring recreated historical sites is also big tourist business—as in Britain's "Great Houses"; Spain's Toledo, and Williamsburg, Sturbridge, and a number of Indian reservations in the US. The museum industry is also tied to nostalgia, which is a specific form of alienation from the past.

<sup>4</sup> Wang here usefully cites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sup>5</sup> Wang uses terms developed by Partha Chatterjee, but the problematique is Levensonian. See Chatterjee's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A Derivative Discourse* (London: Zed Books, 1986).

a carefully selected past culture. This approach was not necessarily successful, but at least superficially liberals had a harder time, when challenged, to prove their Chinese-ness. They appeared too scornful of tradition that is identity—too cosmopolitan, too skeptical, and too critical—to avoid charges of imitation. However, Wang shows that the liberals hardly ignored the past, and were in fact engaged in a project roughly similar, if not so romanticized, as the traditionalists. They did not ignore the past but sought its “true” nature, isolating useful features. Thus Hu Shi’s investigations into early science and the history of the novel. Thus the archeological breakthroughs under Fu Sinian’s direction in 1930s that began the reconstruction of a real antiquity after Gu Jiegang’s destruction of the mythical antiquity.

Yet conversely, Wang seems to accept that Levenson was right to point to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value” (cosmopolitan but Western-derived science) and “history” (or attachment to tradition). Wang merely insists that May Fourth intellectuals “tried” to transcend the problem by sinicizing science. For example, the emphasis on scientific history based on source criticism could be easily traced to the Qing evidential studies movement. Thus Wang declares—contra Levenson—that historians’ goals included reforming the Chinese tradition, concluding that “Chinese modernity was not sought in a borrowed culture but embedded deeply in a remodeled Chinese tradition” (p. 103). In this way, Wang complicates Prasenjit Duara’s emphasis on the appeal of linear history to Chinese nationalists on account of its promise of progress as well as its picture of the roots of identity. In fact, “Chinese historians often presented a discurs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in which the past—the inferior end according to the linear historical discourse—often assumed a worthwhile position comparable to that of the present” (p. 11). Perhaps contemporary doubts about progress sensitizes us to this possibility, though I would add that the appeal of various types of “golden age” thinking was not necessarily contradictory to linear history.

## Modern—scientific—historiography

The question of what is truly modern about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s, in my opinion, worth further investigation. But clearly, beginning with Liang Qichao 梁啓超, Chinese historians defined themselves through their very modernity. Wang briefly makes the point that in the tradi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knowledge, history (*shi*) was auxiliary to the classics (*jing*) (p. 10), but I am not entirely convinced that this view is precisely correct. Certainly, historical studies were not as important as classical studies, and indeed history was often used to give context to (and explain) the classics. Nonetheless, it was a discipline in its own right (one of the four treasuries, just after the classics), and a discipline with its own heritage (from Sima Qian 司馬遷 through the dynastic histories, Sima Guang 司馬光, Zhang Xuecheng 章學誠, and so forth). In any case, it remains to be proved that history “as an autonomous discipline of modern scholarship” was necessarily tied to the project of “national history” as some have argued. It is true, in the case of Western Europe during the reshaping of universities and the reclassification of knowledge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at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 occurred through academic departments largely (though scarcely completely) devoted to national histories. It is also true that in the case of Chin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 project of national history dominated historiography. However, the linear and r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associated with the earlier Enlightenment tended to take up universal questions, while the later Romantic movement emphasize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but not necessarily linearity. In the case of China, the issue cannot be resolved unti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ffects of the evidential studies movement (*kaozhengxue* 考證學) of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y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new historiography of the late Qing on the other is clearer.<sup>6</sup> For philological—but also in a sense

<sup>6</sup> See 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and his *Classicism, Politics,*

historical—investigations were already beginning to threaten the status of the classics.

The ongoing centrality of textual questions to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history, which Wang well shows throughout his book, suggests that key feature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were emerging *before* Liang Qichao picked up his brush to condemn the tradition. As well,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many if not most of the leading history-writers who dominated the 1920s and 1930s were not, or not entirely, professional historians. They tended to be either public intellectuals who wrote sometimes on history, like Hu Shi (or Liang Qichao), or scholars with an unusually broad intellectual background, whether in the classics like Qian Mu 錢穆 or in the sciences like Fu Sinian.

Be that as it may, Wang is certainly right that by the late Qing a few intellectuals were attempting to construct a new “historical metanarrative” that would create the 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state by reinterpreting the past. Whatever could be told, could be told as the story of China. Did “barbarians” “invade” “China”? Then what mattered in the long run was not the quality of their rule but how heroic Chinese resisted their barbarism, or how their barbarism was transformed into Chinese civilization, or perhaps how they contributed to a new mix of Chinese culture. But even in the latter case, what mattered was the Chinese story. This is clear enough, but exactly what was new about it and exactly what is a *metanarrative*? Wang does not fully show how “China” came to be both the subject and object of various narrative strategies, if that is what he means; instead, he seems to imply that this metanarrative was less a framework of historical narrative than a type of consciousness. We are told less about *how* the new historians narrativized China than *that* they did so. Still, this is interesting enough, and Wang makes

---

*and Kinship: The Ch'ang-chou School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and also Liang Qichao, *Zhongguo jinsanbainian xueshushi*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last three centuries)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36); and his *Intellectual Trends in the Ch'ing Period*, trans. Immanuel C.Y. Hsu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by describing the various roles played by the different “liberal” historians in this process.

What might be called the pre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hen, begins with the awakening of Gong Zizhen 龔自珍, Wei Yuan 魏源, and the other late Qing reformers to the larger world. Using missionary accounts and translations of Western histories, they attempted to find lessons for China. The emphasis on lessons was perhaps a rather traditional approach to history-writing (though examples can certainly be found from the West), and their methodology was largely traditional as well. Wang Tao 王韜 was more adventurous, and his writings on recently concluded events in Europe show a self-conscious attempt to use various history-writing strategies, such as chronicle and biography as well as narrative.

Yet it was only with Liang Qichao's seminal essay on “New Historiography” (*Xin shixue*, 1902) that national history was linked to evolutionism (that is, for Liang, scientific history). Following Xiaobing Tang 唐小兵,<sup>7</sup> Edward Wang sees the key factor lying behind Liang's insights to be his global consciousness, that is, China's place as but one nation (and a backwards one) in the larger world. Wang finds that Liang's historical vision encompassed both space (the new world) and time (an appreciation of historical change, the importance therefore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causes, and also a sense of anachronism or the pastness of the past). This was revolutionary since traditional histories, emphasizing lessons from the past, had therefore equated the past with the present, deny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emporal differences. As well, Liang gave a new role to the historian. Here, Wang in effect accepts Liang's own self-evaluation: modern historians are creative problem-solvers while traditional historians simply annotated records that their predecessors had already selected. Unfortunately, Wang says little about the influence of Japanese historians on Liang at this time, though it seems to have been profound.

---

<sup>7</sup> Xiaobing Tang, *Global Space and the Nationalist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he Historical Thinking of Liang Qichao*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One might also ask if Liang still was seeking lessons in history and if this reflected the remnants of a traditional approach or was somehow linked to his new consciousness. Liang's evolutionism, it seems to me, was as much a prescription for China as a scientific description. As a historical law, evolutionism could be applied to China—for Liang—only with difficulty, for he was troubled by China's apparent "failure" to evolve since the Qin dynasty of the third century BC. Liang could cite various reasons, including a lack of competition,<sup>8</sup> and, as Wang points out, Liang blamed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itself for contributing to China's backwardness. The traditional historians had neglected the nation and supported despotism. It might be noted that Liang sometimes blamed despotism for China's lack of progress, but of course it is precisely this despotism that needed historical explanation.

With an understanding of Liang as their precursor, Wang strongly emphasizes the self-proclaimed scientific approaches to history of Hu Shi, He Bingsong, Fu Sinian, and Yao Congwu. As is well known, Hu promoted Deweyan pragmatism, in particular "experimentalism" as the essence of the scientific method: bold hypotheses tested through careful experiment or evidence. Hu's first major research project was the search for scientific thought in Chinese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indeed, a rather traditionalistic concern, although given an iconoclastic edge by his emphasis on source verification. Hu also found direct intellectual ancestors in the Qing scholars of the evidential studies school (*kaozhengxue*).<sup>9</sup> Wang points to Hu's own

---

<sup>8</sup> In social Darwinian terms, there would be no motive to progress without competition; in addition to the "New Historiography", see Liang Qichao, "Shaonian Zhongguo shuo 少年中國說," *Yinbinshi heji wenji* 飲冰室合集: 文集(Beijing: Zhonhua shuju, 1996), 5:7-12; and "Yao Shun wei Zhongguo zhongyang junquan lanshangkao 堯舜爲中國中央君權濫觴考," *ibid.*, 6:22-27.

<sup>9</sup> Wang seems to me to misinterpret one famous passage where Hu is discussing the evidential studies movement. That he believed it had scientific aspects I agree; however,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originally in English) is actually quite critical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 "Galileo, Kepler, Boyle, Harvey, and Newton worked with the objects of nature, with stars, balls, inclining planes, telescopes, microscopes, prisms, chemicals, numbers and astronomical tables. And their Chinese contemporaries worked with books, words, and documentary evidence. The latter created three hundred years of scientific book learning, the former created a new science and a new world" (cited p. 61). In other

self-evaluation as the founder of the modern study of Chinese philosophy, since for Hu,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or for that mat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scientific culture, entailed a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 This methodological progress was displayed in source criticism, a tradition found both in Chinese and Western learning to which Hu had nearly equal exposures” (p. 59). The larger point here, however, worth further exploration, is the transi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epistemologies and categories of knowledge to new ones. Not merely Hu’s methodology, but his very sense of a discipline was new: philosophy had replaced the classics (*jing*). Hu’s own classical education was second-rate by the standards of the day, and he had to prove himself once he had accepted a professorship at Beijing University. Nonetheless, his emphasis on linear development and source criticism won him important followers.

In the short run, Hu’s acceptance by his students, particularly Fu Sinian, whose classical knowledge was legendary, and Gu Jiegang, was key. As Wang points out, students at the time had still received childhood training in the classics, which gave any project to reappraise the classics personal significance to a great many people. However,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Hu and his followers were precisely engaged in “integrating modern and traditional scholarship” (p. 75) so much as rethink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radition—which required a knowledge of tradition but a knowledge that in my view led to alienation as much as integration.

Fu Sinian’s early work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periodization, looking for the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s as opposed to mere dynastic cycles; he tried to trace the dynamic of Chinese history i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Han and foreign cultures and the shaping of Han Chinese culture. Yet as Wang describes it, there is what I would call a remarkably traditional quality to Fu’s work that is even anachronistic by today’s standards. For he conveniently pegs various dynasties as foreign or Han, and relates “Han

---

words, however admirable and genuine was the scientific approach to the humanistic learning during the Qing, it was not comparable to the European achievement.

culture” accordingly. Contrary to Wang’s view, this appears to me as something less than a “multi-ethnic approach” (p. 79), even if Fu acknowledged the foreigners’ contributions.<sup>10</sup> For it is the foreigners’ contributions to China that matter, not, say, “Han” contributions to the cultures of their neighbors. If Fu has transcended some of the assimilationist/sinification dichotomy, his attention remained focused on some essential national quality that makes Chinese history. Nonetheless, as Wang points out, Fu’s political radicalism and his reassessment of tradition certainly did not mean he wished to dismiss the past as standard view of “May Fourth” might suggest.<sup>11</sup> It is interesting that Fu sought to pursue scientific studies in Europe, before returning to China and history, but it was German historiography and philology that he brought back, not expertise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In Wang’s succinct assessment: “As his scientific fervor gradually cooled down, Fu became convinced that the very basis of modern historical scholarship was its source criticism, as exemplified by the works of the Rankean school and some Chinese historians, especially Qing evidential scholars” (p. 88).

In the long run, perhaps Gu Jiegang’s famous “critique of ancient history”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work done by Fu, who turned increasingly to academic administration. Gu was led beyond mere skepticism, with Hu Shi’s encouragement, to the study of exactly how the legends, texts, and folklore of ancient China came into existence. And as for the archaic period itself, if the archeological digs organized by Fu and others reestablished some of the historicity of the Shang and perhaps even the Xia dynasties, this was done on the basis of bronze age civilization, not sage-kings utopias.

---

<sup>10</sup> For more detail, see Fansen Wang,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sup>11</sup> In terms of Fu’s biography, Wang is mistaken in claiming that Fu was among those who broke into Cao Rulin’s house and set it on fire during the 4 May 1919 demonstrations (p. 82); Fu’s brother was involved, but Fu himself tried to maintain an orderly demonstration. Cf. Chow Tse-tung, *May Fourth Movement*, pp. 110-111.



In sum, by the 1920s, “scientific history” was clearly associated with careful argument and solid evidence, particularly source criticism. It was firmly non-antiquarian and in that sense oriented toward the present. However, Wang says little about how Chinese historians synthesized what seems to be a dominant Rankeanism (the ground for Ranke ironically prepared by the Hu Shi version of Dewey) and American “new historians” such as James H. Robinson and Charles Beard, translated by He Bingsong, who criticized Ranke’s “positivism” and his emphasis on political history over the social sciences.

### Nationalism and history-writing

As mentioned above, and as Wang and others have pointed out, China’s liberals, including the liberal historians, were vulnerable to charges of weakness in their loyalty to the nation. They appeared too happy to denigrate Chinese ways and exalt foreign ones. It was perhaps Hu Shi who met such charges most forthrightly and sensibly.<sup>12</sup> But Wang emphasizes that the “liberals” were moving to recognize not merely the existence but the value of tradition. Again following the lines pioneered by Levenson, he is interested in attempts to find equival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y. As is well known, Liang Qichao, actively disillusioned with the West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 offered new critique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commended Chinese morality. Wang shows how Liang significantly revised his earlier assess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 now praising the Historiographical Office (*bianshiguan*), de-emphasizing and finally denying the very idea of progress, and seeking to take his research into areas that would demonstrate the contributions of China to world civilization.

It is debatable whether Liang was ever truly a liberal; in another context the issue should be further explored. Part of the elasticity of Wang’s

---

<sup>12</sup> See Jerome B. Grieder,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7-193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esp. pp. 124-125, 160-169, 285-289.

classification of twentieth-century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lies in Liang's obvious traditionalism. But here we need not become bogged down in the semantics of labels: broadly speaking, it is undeniable that Liang began as a critic of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and later found merit in it. Wang is himself critical of Liang's rosy picture of the Historiographical Office, which in fact was under political control and produced little first-rate history over the centuries. On the other hand, Wang credits Liang with influencing Chinese historians to make greater use of material sources such as bronze inscriptions and the oracle bones. Wang Guowei 王國維 and Luo Zhenyu 羅振玉 may have pioneered such approaches, but according to Wang, Liang popularized them. I would also emphasize that the task of delineating China's "contributions" to world civilization, if done with a sense of the constant interactions between cultural cores, was scarcely mere nativism but a precursor of today's world history. However, Wang does not clearly tell us how Liang reconciled what would seem to be two contradictory positions. On the one hand, abandoning his belief in progress and the entire notion of scientific history (since historical events are singular and do not lend themselves to generalization), Liang came to understand that past eras have to be understood and appreciated on their own terms. Yet he still seem interested in showing where China was equivalent or superior to the West, a project that necessarily involves comparisons.

The example of He Bingsong perhaps more clearly demonstrates the liberal historians' impulse to find equivalences. Following Naito Konan's "rediscovery" of Zhang Xuecheng, for example, He could claim this Qing figure as a "modern" historian. For, according to He, Zhang used footnotes, engaged in source criticism, possessed a notion of progress, analyzed how institutions met the particular needs of different periods, and even called for the study of recent events. As Wang suggests, this may tell us more about He than Zhang.<sup>13</sup>

---

<sup>13</sup> In terms of the thematic organization of the book, this chapter on "equivalences and differences" is the least successful. Nonetheless, it has useful observations on the careers of Fu Sinian and of Luo Jialun,

But finding worth in specific aspects of Chinese history — or “tradition”—was still qualitatively different from writing patriotic history as such. The Japanese take-over of Manchuria in 1931 and the lengthy and desperate full-scale war from 1937 to 1945 put the liberals in a difficult position. “Traditional” historians did well, Wang pointing to Feng Youlan’s 馮友蘭 work on Confucianism and Qian Mu’s overview of Chinese history. Wang provides an extensive discussion of the position of liberalism, particularly through the example of Hu Shi, in the 1930s, that digresses from historiographical issues. This offers some useful information, but fails to explicitly draw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larger liberal concerns and new historiographical trends. Overall, Wang treats the work produced during this period critically yet sympathetically. I wonder, however, if some of the intellectual compromises made during this period set the stage for the explicit politicization of Chinese history-writ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and Taiwan during the subsequent Cold War.

Some scholars joined the Guomindang government. First Luo Jialun, then Fu Sinian, who asked, “What can a scholar do to save the nation?” He Bingsong, with his own Guomindang contacts, instigated a debate with Cai Yuanpei 蔡元培 and Hu Shi over “China-based culture” in 1935. The latter argued that if a culture were viable, it did not need artificial support; whereas if it were not viable, artificial preservation would be unsuccessful. Meanwhile, Fu Sinian began a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to counter directly Japanese historians’ views of Asia. Fu argued that Manchuria had long been under Chinese rule: his use of a wide range of sources nonetheless led only to an unconvincing exercise of nationalist intention over scientific history. Perhaps more convincing were various histories of Han heroes who had resisted foreign onslaughts through the ages.

More sophisticated perhaps was the self-proclaimed use of the *ti-yong* 體/用 (substance/function) dichotomy by Chen Yinke, as seen in his treatment of the assimilation of Buddhism in the Tang, though Wang has less to say

about Chen's exact contributions to historical knowledge and methodology. Wang also cites the work of Yao Congwu into 1950s, a scholarship that emphasized the centrality of Han culture, its triumph over the barbarian, even in the event of "barbarian" conquest of China. Yao attributed "sinicization" to Confucianism, which appealed to invaders with China's sophisticated political systems. Yao'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Jin, Yuan, and Qing dynasties certainly appear one-sided from today's point of view; still, Wang adds: "Yao's Han ethnocentrism...clashed with Gu Jiegang's and early Fu Sinian's belief in a multi-ethnic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However, his study of the sinicization question in Chinese history was indeed interesting. While it was clearly shaped by China's (including Taiwan's)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1950s and the 1960s, it helped characterize the pursuit of these historians in experimenting with scientific history: to construct a past by sinicizing outside influences in order to make it more agreeable and responsive to the task of nation-building and, during World War II, nation-defending in China" (p. 189). A problem with this analysis, however, is that it may confuse sinification with integration. Although the exact border will remain hazy, the former refers essentially to becoming Chinese (with little cultural change) while the latter refers to a process that results in a new synthesis. For example, if the final product is indeed "Chinese Buddhism", as Chen Yinke argued, we still cannot conclude that Buddhism simply "became" Chinese but rather that neither Chinese nor Buddhism was the same as before.

In an epilogue, Wang emphasizes the ongoing 'conservativization' of former members of the liberal school. In Taiwan, "May Fourth" becomes associated with communism and many scholars were attracted to the New Confucianism movement. Even Hu Shi was criticized, and strict censorship erased the scholarship of Gu Jiegang, who had remained on the mainland; the prohibition on Marxism and Marxist-influenced work deprived Taiwanese historians of some of the knowledge gained by earlier generations and distanced them from the great strides made in social history in the West. Nonetheless, Wang oversimplifies to charge that significant change occurred only after 1988 when martial law was lifted: in fact, old intellectual

shibboleths had been eroding for some time, especially through contacts with scholars who had received their basic education in Taiwan but had gone on to do graduate work and then found jobs in the West. Taiwanese historians nonetheless tended to maintain the tradition of source criticism, Fu Sinian-style positivism (p. 201), and narrow monographic work. To this list, I would might add the politicization of especially modern history, as convincingly demonstrated by the overseas scholar Winston Hsieh 謝文孫, for example.<sup>14</sup> Of course, it should go without saying that Cold War politics affected history-writing and academic politic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the US, not just China.<sup>15</sup>

The fate of scholars who remained on the Mainland was nothing less than tragic. Wang, who himself received his university and initial graduate education in China, albeit in the post-Cultural Revolution period, attributes the ultimate failure of the communist project to Mao's emphasis on destruction and the notion of creation *de novo*. Instead of somehow building on the past, the communists in effect pretended it did not exist. Wang's observations here obviously take us beyond the narrow field of historiography, but they also return us to the central theme of his work: the initial attempts of the liberal historians to integrate the useful aspect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with the viable one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attempts which seem to have been overtaken by events outside of their control.

Indeed, *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 ends on an inconclusive note,

---

<sup>14</sup> Hsieh's analysis of 1911 historiography still resonates: see Winston Hsieh, *Chinese Historiography o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5).

<sup>15</sup> For a succinct analyses on Cold War sinology, see Robert Marks, "The State of the China Field, or the China Field and the State," *Modern China*, 11.4 (October 1985), pp. 461-509; also Judith B. Farquhar and James Hevia, "Culture and Postwar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of China," *Positions*, 1.2 (1993), pp. 486-525; Mark Selden, ed., "Asia, Asian Studies,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A Symposium,"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9.1 (Jan-Mar 1997), pp. 3-60. See also: Bruce Cummings, "Postscript: Response to My Friends and Critics," *BCAS*, 29.2 (April-June 1997), pp. 56-60; Tani Barlow, "Colonialism's Career in Postwar China Studies," *Positions*, 1.1 (Spring 1993), pp. 224-267. For a somewhat different point of view, see 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leaving open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liberal historians' legacy is still viable or may as well not have happened. Of course, we have the students of the students (of the students) of Hu Shi, Fu Sinian, and so forth who partake of a certain intellectual pedigree. Yet in spite of certainly parallels between May Fourth concerns and post-Mao, post-Chiang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s in China and Taiwan,<sup>16</sup> it is far from clear that any stable definition of China has yet been invented in modern times. Some scholars see themselves as carrying on the May Fourth modernization project to reform Chinese culture, which requires an understanding of its past, yet much historical research remains, so far as I can see, excessively wedded to descriptive forms that rest on a foundation, if any, of positivism. The collapse of Marxism on the Mainland has left not simply an ideological vacuum in society but an analytical vacuum in the scholarly world.

### Are historians necessarily traditionalists?

If I understand him correctly, Wang argues that even the “liberal” historians—much less the traditionalists—sought to make use of and had great respect for at least specific aspects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 For example, Hu Shi was not trying to throw out tradition but “reorganize” and “recreate” it as part of a larger nationalistic project of renewing China. Why else would Hu spend so much time investigating the past? This also applies to Gu Jiegang. In this sens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iberals and traditionalists was perhaps more political than historiographical, and more a matter of degree than kind. It could also be argued, though Wang does not, that the Marxist historians, though following a specific Western historical *methodology*, themselves found (created?) a usable Chinese past in the same way as the liberals and traditionalists, only the *content* (a proud heritage of

---

<sup>16</sup> As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intellectual context is fundamentally changed, these are superficial parallels in my view; nonetheless, interest in issues like civil society, individualism, the burden of tradition, and so forth, are quite striking.

class struggle, for the Marxists) differing. However, there is a fundamental problem with these terms of analysis. Historians by the nature of their craft talk about the past. Surely no one who believes that *thinking* about the past is a worthless activity would become a historian. It would seem to follow that the past—at least in the sense of the stuff that historians think about—cannot be worthless to them. Indeed, one might ask in a larger sense if any professional historian *can* believe the past to be worthless and meaningless. It seems intrinsic to any historical project (traditional or modern) to ascribe value of some sort to the past. Yet, does it follow that historians necessarily believe that the past is a reservoir of living traditions that can be used to improve the present? Analytically, the key to this problem lies in distinguishing between appreciations for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past in their own terms on the one hand, and a belief in the truth and vitality of tradition(s) on the other. In other words, Wang sometimes slips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he takes an interest in the past as evidence of belief in its value. Hu Shi's investigations into ancient Chinese science, or even his studies of late imperial novels, could hardly bring these objects out of the museum into contemporary life, but they could at least build the museum for contemporaries to visit: as Hu himself surely knew. In my view, historians are not necessarily traditionalists, though they are seldom jejune defamers of tradition either.

In the Chinese case, however, as Wang makes clear, the contingent factor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coming on top on an ongoing sense of national crisis, created unbearable pressures on those intellectuals who wanted to view history dispassionately and critically. A major strength of this book lies in the connections Wang draws among historiographical concerns, larger intellectual tendencies—particularly the push-pull of iconoclasm (or cosmopolitanism) and traditionalism, and political factors. As Wang recounts the career of Fu Sinian: “If in his study of history he was indebted to traditional learning, in his political involvement he was influenced by the mandarin tradition [to participate in public affairs, to join the government] as well as nationalism” (p. 180).

Wang's monograph also offers something of an overview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 project definitely needed in the English-language literature. However, as an overview, it inevitably neglects certain problems. Wang's discussion of the origins and use of new ideas by Chinese historians is excellent, but his analytical framework is underdeveloped. For example, there are many references to positivism, but the notion is never clearly defined; similarly neo-Kantianism and historicism remain labels rather than a means of understanding what Chinese historians were trying to do.<sup>17</sup> Questions are sometimes raised — as about the “humanism” of Confucianism (p. 184)—but left begged.

This is an ambitious book that can be usefully read with Arif Dirlik's older *Revolution and History* on the Marxist historians.<sup>18</sup> Wang indeed illustrates a process of “integrating modern and traditional scholarship” (p. 75), although (if I may return to Levenson) I suspect Wang underestimates the degree of alienation from the past that affected many. If we search not for *iconoclasm*, which turned out to be a very unstable and probably an inherently paradoxical phenomenon, but for alienation, the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looks much more complicated. This is a form of consciousness scarcely unique to China but that seems to emerge whenever traditional verities become widely doubted. Wang offers important new ways of thinking through history about this historical problem.

---

<sup>17</sup> This is a problem because it leaves some of the analysis either superficial or simply opaque; for example, Wang attributes He Bingsong's praise of Sima Guang to his rejection of positivism (p. 117). I for one need to have the logic of this connection explained.

<sup>18</sup> Arif Dirlik, *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大事紀要

##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 (2001.3-2001.9)

李怡燁\*輯

2001.03.19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化思想史研究室「明清的社會與生活」研究群九十年第二次討論會，邀請歐洲研究院院士 Porf. Augustin Berque 主講：“Logic of place and the form of cities”。

03.23 由中央研究院東北亞區域研究主辦、財團法人日本交流協會贊助之「戰後東北亞國際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假近史所檔案館舉行兩天，邀請國內外學者共發表論文十三篇。

03.27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學術研討會，由研究助理張隆志先生主講：〈後藤新平的臺灣論：一個言論史與生涯史的考察〉。

04.06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社會經濟史研究群討論會，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員、中研院民族所訪問學人曾少聰先生主講：〈移民社會與族群關係：臺灣與菲律賓的比較〉。

04.10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化思想史研究室「明清的社會與生活」研究群九十年第三次討論會，邀請柏克萊加州大學博士、中研院文哲所訪問學人曾佩琳女士(Ms. Paola Zamperini)主講：〈割斷的連結：西方婦女論著中對中國婦女的異質／異國描繪〉(Ties That Cut: Alter/Native Portrayals of Chinese Women in Western Women's Writings)。

04.13 由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中心主辦「世界宗教：傳統與現代性」學術研討會，假南華大學藐姑射會館國際會議廳舉行兩天，邀請國內外學者共發表論文二十四篇。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

04.20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學術演講，邀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教授吳介民先生主講：〈集體所有制的出路？中國農村土地制度的變化趨勢〉。

04.24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學術研討會，由政治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該處訪問學員范燕秋女士主講：〈日本帝國發展與殖民地臺灣的人種衛生(1895-1945)——有關研究概念與初步考察〉。

04.24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地理資訊工作室學術演講，邀請北京大學中古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孝聰先生主講：〈從地圖上解構北京市的歷史與空間結構〉。

04.26 由世界海外華人研究學會與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主辦、中央研究院等五單位協辦、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與財團法人世華聯合商業銀行文化慈善基金會贊助之「第四屆世界海外華人」國際學術研討會(The 4<sup>th</sup> International Chinese Overseas Conference)，假中研院學術活動中心舉行三天，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進行專題演講與發表論文（一〇六篇）。

04.28 由臺灣宗教學會主辦之「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學術討論會」，假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舉行兩天，會議議程分為會員大會、議題討論、宗教學術討論、學生論文發表（四篇）。

04.30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化思想史研究室「明清的社會與生活」研究群九十年第四次討論會，邀請淡江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邱仲麟先生主講：〈人口增長、森林砍伐與明代北京的燃料問題〉。

05.03 由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主辦、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與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協辦之「2001年臺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危機之後：二十一世紀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科一館與日月潭哲園名流會館舉行兩天，邀請國內外學者進行專題演講與發表論文（五十三篇）。

05.03 由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主辦、揚州大學人文學院合辦、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贊助之「清代揚州學派學術研討會」，假中研院學術活動中心舉行兩天，邀請兩岸學者共發表論文二十三篇。

05.03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臺灣海洋史研究聚會，邀請曹永和、張彬村先生主講：〈海洋史的世界史視野〉。

05.04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學術演講，由研究員蕭新煌先生主

講：〈臺灣的文化全球化與地方化〉。

05.1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研究員魏秀梅女士主講：〈郭崑燾——湘軍的幕後人物〉。

05.10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與思想組學術研討會，由研究員李常井先生主講：〈生態女性主義論西方文化傳統中的女性與自然〉。

05.17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化思想史研究室「明清的社會與生活」研究群九十年年度第五次討論會，邀請美國耶魯大學藝術史系博士候選人賴毓芝女士主講：〈再現邊疆：任伯年的邊塞畫與十九世紀末上海城市生活〉(Remapping Borders: Ren Bonian's Frontier Paintings and Urban Shanghai Life in the Late 19<sup>th</sup> Century)。

05.17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與思想組學術研討會，由兼任研究員賴澤涵先生(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主講：〈廣州革命政府的教育政策與各級教育之發展，1917-1925年〉。

05.21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九十年年度第九次學術講論會，由研究員何漢威先生主講：〈清末民初廣東政商、密使劉學詢生平事蹟鉤沉〉。

05.2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該所博士後研究人員張建偉先生主講：〈抗戰時期戰地救護體系的建構及其運作——以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為中心的探討〉。

05.24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與思想組學術研討會，由副研究員朱德蘭女士主講：〈1950-70年代臺灣白色恐怖之研究——崔小萍事件〉。

05.25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族群研究工作坊第一次讀書討論會，由助理研究員王道還先生主講：〈族群問題的自然史背景〉。

05.26 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暨歷史學系主辦、中正文教基金會贊助之「朱雲影教授逝世六周年紀念學術演講會」，假國立臺灣師大校本部舉行，主講人與講題如下：王爾敏，〈百年來的史學風氣與史學方法〉；王關仕，〈經學與古史——以「史」字為例〉；李恩涵，〈近年西方學者對於東南亞史的研究〉。

05.26 由生產、閱讀、與教育翻譯工作坊主辦，國科會、清華大學歷史所與新竹市青草湖社區大學贊助之「檢視當今臺灣的翻譯工業與翻譯

文化」研討會，假臺灣大學思亮館舉行一天半，邀請學者專家進行專題討論與論文發表（七篇）。

05.26 由財團法人北港朝天宮主辦、臺灣宗教學會承辦、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協辦之「媽祖信仰與現代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zo Cult and Modern Society)，假北港朝天宮會議室舉行三天，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進行專題演講與論文發表（二十二篇）。

05.31 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思想史組主辦之「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1600 迄今」學術研討會（一），假該所檔案館舉行兩天，邀請國內外學者共發表論文八篇。

05.31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座談會，由該處博士候選人廖肇亨先生主講：〈明末清初叢林詩論初探〉。

05.31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法律史研究室特約演講，邀請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林端先生主講：〈中西法律文化的對比——韋伯與滋賀秀三的比較〉。

05.31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與思想組學術研討會，由助研究員劉序楓先生主講：〈清代遭風漂臺之外國難船事件研究——以琉球、日本、朝鮮難民的處理事例為中心〉。

05.31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臺灣海洋史研究聚會，邀請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林滿紅女士主講：〈臺灣與香港的競合關係〉。

06.01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學術演講，由助研究員范雲先生主講：“How Social Movement Matters: In Practice, In Theory”。

06.04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座談會，邀請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袁行霈先生主講：〈關於文學史的幾個問題〉。

06.05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化思想史研究室「明清的社會與生活」研究群九十年第六次討論會，由文哲所博士候選人廖肇亨先生主講：〈禪宗的戲劇觀——以明清為中心〉。

06.07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座談會，邀請 Prof. John C. Raines(Professor of Religion, Temple University)主講：“Culture, Hegemony and Resistance”。

06.07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社會研究組學術研討會，由副研究員覃怡輝先生主講：〈李彌部隊退入緬甸所引起的國際控訴

事件)。

06.08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學術演講——「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新書討論會，主講人爲柯志明教授（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林開世教授（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張隆志教授（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林國明教授（臺灣大學社會系）。

06.11 由東海大學歷史學系主辦之「第三屆劉崇鉉學術講座」，爲期兩天，邀請中央研究院院士夏伯嘉先生進行演講：〈從天儒合一到東西分岐——歐洲中國觀的演變〉與座談：〈我的治學經驗〉。

06.11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專題演講，由該處特約訪問學人、揚州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員車錫倫先生主講：〈中國寶卷研究的世紀回顧〉。

06.12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學術研討會，邀請澳洲雪梨大學中國研究系(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教授 Professor Helen Dunstan 主講：“Qianlong 13 Revisited: Markets, Memorials, and Raison d’Etat in Mid-Eighteenth-Century China”。

06.13 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與新史學雜誌社主辦之「新史學講座」，邀請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紐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夏伯嘉先生主講：〈從天儒合一到東西分岐——歐洲中國觀的演變〉。

06.1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明清文化研究群」學術討論會，邀請東海大學歷史系主任丘爲君教授主講：〈知識論述在近代中國的誕生——梁啓超的戴震研究〉。

06.1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助研究員楊久誼女士主講：“Ruffians on Water in the Lake Tai Area, 1840’s-1860’s: A Critical Re-Examination”。

06.14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與思想組學術研討會，由研究員劉石吉先生主講：〈殖民城市與通商口岸：中國與亞洲的經驗〉。

06.14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社會研究組學術研討會，邀請曾毅教授（美國 Duke 大學人口研究中心、德國 Max Plank 大學人口研究所及北京大學人口學研究所）主講：“The Oldest Old in Mainland China: Challenges and Policy Considerations”與蔡昉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學研究所所長）主講：〈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學研究所簡介〉。

06.15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會第十四次聚會，假該院學術活動中心舉行，邀請 Professor Katherine Carlitz (Visiting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主講：“Mixed Messages in Late Ming Texts for Women”（晚明女性文本中之眾聲喧嘩）。

06.15 由國立故宮博物院主辦之「清代檔案與臺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假該院演講廳舉行兩天，邀請學者進行專題演講與發表論文（十一篇）。

06.20 中央研究院東北亞區域研究分支計畫研究成果報告討論會，假中研院近史所舉行，邀請學者共發表論文十二篇。

06.20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情、欲與禮教」研究工作坊講演，邀請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郭玉雯女士主講：〈紅樓夢中的情欲與禮教〉。

06.27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化思想史研究室「明清的社會與生活」研究群九十年第七次討論會，由文哲所博士後學者何乏筆先生 (Mr. Fabian Heubel)主講：〈從性史到修養史——初探傅柯《性史》第二卷的理論結構〉。

06.28 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委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主辦之「國科會臺灣史專題研究計畫成果發表研討會」，假中研院學術活動中心舉行兩天。

06.2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助研究員余敏玲女士主講：〈蘇聯英雄保爾·柯察金到中國〉。

06.28 漢學研究中心學術討論會，假國家圖書館舉行，邀請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沙培德先生主講：〈中國現代歷史學的緣起〉。

06.29 由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會主辦、中國近代史學會與漢學研究中心協辦、財團法人純智文教基金會贊助之「欲掩彌彰：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私』與『情』」學術研討會會前會，假中研院近史所舉行。

07.02 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外交史組主辦、中央研究院東北亞區域研究協辦之學術演講，邀請日本筑波大學哲學思想學系教授佐藤貢悅先生主講：〈儒教倫理在當代東亞世界〉。

07.03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學術研討會，邀請美國 Rowan University 歷史系教授王晴佳先生主講：“Why Enlightenment? — The Postmodern/Postcolonial Critique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07.0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明清文化研究群」學術討論會，

邀請馮兆基教授(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主講：〈張君勳的新儒家政治思想〉。

07.05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臺灣海洋史研究聚會，邀請澳洲國立大學博士候選人(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 Asian Studies,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戴杰銘先生主講：〈臺澳海洋史研究的聚焦性〉。

07.1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明清文化研究群」學術討論會，邀請王晴佳教授(Department of History, Rowan University)主講：〈白璧德與陳寅恪——學術訓練、興趣與風格〉。

07.19 由教育部顧問室指導、高雄醫學大學兩性研究中心主辦、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與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協辦之「性別、醫療與社會」學術研討會，假該校濟世大樓舉行兩天，邀請學者共發表論文十四篇。

07.23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學術討論會，由副研究員胡曉真女士主講：〈秘密花園：論清代女性彈詞小說中的幽閉空間與心靈活動〉。

07.2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邀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教授王德威先生主講：“Impersonating China”。

07.26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臺灣海洋史研究聚會，邀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系客座教授蘇明陽先生主講：〈鄭和下西洋寶船之研究〉。

08.0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明清文化研究群」學術討論會，邀請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系教授蘇精先生主講：〈中西書目與圖書分類法的發展與比較〉。

08.13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學術討論會，由副研究員王瓊玲女士主講：〈私情化公——明清劇作家之自我敘寫與其戲劇展演〉。

08.14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學術研討會，邀請美國西北大學醫學院分子藥理學(Department of Molecular Pharmacology and Biological Chemistr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吳照雄先生主講：“Molecular Analysis of Taiwanese Holó Words: Homology to Old Norse”。

08.15 由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辦、中華民國史蹟研究中心及日本交

流協會臺北事務所協辦之「第三屆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學術研討會，假該會史蹟源流館舉行兩天，邀請中日學者專家共發表論文十三篇，並邀請日本中京大學社科所教授檜山幸夫先生作專題演講：〈臺灣總督府文書的世界〉。

08.20 由漢學研究中心主辦、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會與中國近代史學會協辦、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贊助之「欲掩彌彰——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私』與『情』」國際學術研討會，假國家圖書館舉行三天，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進行專題演講與論文發表（二十五篇）。

08.22 由國共兩黨關係史和海峽兩岸關係史課題組等六單位主辦之「紀念辛亥革命 90 周年——孫中山的國家統一思想與實踐」學術研討會，假武漢匯申大酒店舉行三天，邀請兩岸學者專家發表論文。

08.23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學術研討會，邀請日本宮崎女子短期大學教授黑木國泰先生主講：〈17 世紀、18 世紀環中國海地域システムの變容と鄭氏臺灣——漂流、漂著船關係史料を中心に〉。

08.23 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與財團法人純智文教基金會贊助之「近代中國的婦女、國家與社會(1600-1950)」國際學術研討會(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Women, Nation and Society in Modern China, 1600-1950")，假中研院學術活動中心舉行三天，會議分十大主題，邀請國內外學者共發表論文三十二篇。

08.3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邀請臺灣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楊芳燕女士主講：〈劉師培的反現代主義〉。

09.04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學術研討會，邀請澳洲國立大學博士候選人戴杰銘先生主講：〈臺灣「南部」意象之創造：以高雄為例〉。

09.05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法律組學術研討會，由副研究員劉孔中先生主講：〈著作人格權之比較研究〉。

09.06 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思想史組主辦、純智文教基金會贊助之「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1600 迄今」學術研討會（二），假該所檔案館舉行兩天，邀請國內外學者共發表論文八篇。

09.0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外華人研究群座談會，邀請馬來西亞星洲日報社論主筆林金樹先生主講：〈馬來西亞華人眼中的臺灣與中



國大陸)。

09.07 由南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主辦、中華佛學研究所等十一單位協辦之「二十一世紀佛學的研究：傳統與現代」第十二屆佛學論文發表會，假該校藐姑射會館國際會議廳與成均館會議廳舉行兩天，邀請學者專家發表論文二十四篇。

09.10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九十年度第十一次學術講論會，由副研究員柯嘉豪先生主講：〈佛教在中國橋樑史上所扮演的角色〉。

09.1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副研究員張壽安女士主講：〈從「親親尊尊」看清儒二判政治身分與血緣身分——以「皇位過繼」為中心〉。

09.1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外交史組與胡適研究群學術演講，由助研究員潘光哲先生主講：〈胡適與傅斯年〉。

09.19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與計算中心合辦之學術演講會，邀請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所長劉紀遠教授主講：〈資源環境時間數據基礎與地理、歷史科學方法論的創新〉。

09.20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社會研究組學術研討會，由研究員楊文山先生主講：“Regional Variation of Marriage Patterns in Taiwan: 1886-1945”。

09.2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明清文化研究群」中國的物質與文化讀書會，假該院學術活動中心舉行，邀請 Dr. Joseph Mcdermott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主講：“Books: The Problem of Access and its Possible Significance”。

09.21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學術演講，由研究員謝國雄先生主講：〈物、事頭、與「倩」：茶鄉的「工資」經驗〉。

09.24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九十年度第十二次學術講論會，由研究員顏娟英女士主講：〈雙城記——1927年臺灣美術展覽會與1929年上海第一次全國美術展覽會的比較研究〉。

09.25 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指導，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中國時報主辦之第一屆兩岸遠景論壇「新世紀·新發展·新願景——亞太情勢與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假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舉行兩天，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進行專題演說、發表論文(十三篇)與圓桌論壇。

09.26 由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與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主辦之「九二一震災與社會文化重建」研討會，假該院民族所舉行兩天，邀請學者專家發表論文二十三篇。

09.26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法律組學術研討會，由研究員陳新民先生主講：〈新加坡法治的幾點觀察〉。

09.2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研究員張啓雄先生主講：〈1952年赫爾辛基國際奧運會中國代表權之爭——名分秩序論觀點的分析〉。

09.27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與思想組學術研討會，由副研究員錢永祥先生主講：〈用演化論陳述自由主義妥當嗎？——對哈耶克的一點反思〉。

09.28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學術演講，由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學員沈秀華與陳家倫分別主講：“Crossing the Taiwan Strait: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the Global Economy”與〈新時代運動的社會學意涵及其在臺灣的發展〉。

09.29 由中國近代史學會主辦、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贊助之「近代中國的改革與革命——紀念辛亥革命九十年」學術座談會，假中研院近代史所舉行，邀請國內學者發表論文六篇。

09.29 由國立臺灣博物館主辦、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與高雄縣自然史教育館承辦之「大高雄地區歷史與文化」學術研討會，假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舉行兩天，邀請國內學者專家進行專題演講、報告與發表論文（九篇）。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三十五期

論 文	272 頁	平裝 250 元
金觀濤：從「群」到「社會」、「社會主義」——中國近代公共領域變遷的思想史研究		
劉青峰：張東蓀是何意義的「唯心主義者」？——張東蓀的「唯心主義者」標籤及其自評析論		
張朋園：國民黨控制下的國會選舉(1947-1948)		
呂妙芬：明代吉安府的陽明講會活動		



## 來函

口述史是歷史學者進行歷史重建的依據之一；把當事人的經歷、見聞做成紀錄，尤為現代史研究者不可或缺的珍貴材料。本所自 1959 年開始進行口述歷史訪談計畫以來，訪問人數已近千人，先後出版專書七十六種、發行口述史期刊十期，對中外學界之近現代史研究，頗有助益。惟口述史一如文字檔案，只是歷史書寫的素材，不無侷限，也都有可能經過主觀選擇、修飾，甚或與史實相出入。因此，如有他種說法、材料可資比對、參證，由不同側面勾勒歷史的真實，殆為研究者所樂見。本期刊出陳長文律師、李念祖律師的來函，對《溫哈熊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專書之 66）有所辨正，即本此意。

## 陳長文律師致李遠哲院長函

李院長遠哲先生賜鑒：

貴院近代史研究所為了解歷史真相，推動出版口述歷史叢書，保存歷史資料，令人感佩。惟如口述歷史叢書總序文所言，「應訪者記憶難免有所疏誤，或有涉及價值判斷、個人恩怨、政治立場，而記錄或語意不清」，甚至亦可能與事實有嚴重出入，恐為口述歷史出版工作上的一大課題。近閱貴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行之口述歷史叢書六六——《溫哈熊先生訪問紀錄》，品評歷史人物，極多受訪者個人主觀價值判斷，或屬見仁見智，惟內中提及本人部分（頁二五三-四），失真之處，甚為明顯。既涉歷史，即應辨明真相。本人擔任律師，主持理律法律事務所，溫先生書中語及聯勤總司令部與海軍總司令部均為事務所客戶。實則本人自前總長劉和謙上將於海軍副總司令任內獲聘協助辦理海軍潛艦建造購案法律事務以還，迄今十餘年間，於歷任總司令領導下參與海軍二代艦等重大建軍計畫之採購法律事務，也於各軍種歷任總司令持續從事現代化建軍期間，受託協助自法律面

規劃空軍、陸軍及中科院等單位之防空系統、二代戰機、飛彈及先進軍用裝備等重大購案，並參與從事國際契約談判。此間本人因就特定採購案件提供專業服務，多次獲頒獎章，並於義務受聘國防部法律總顧問期間，積極協助規劃於軍中培養涉外法律事務專才之制度，曾蒙國家頒發雲麾勳章，淺淺棉薄而受肯定，本人至感榮耀。聯勤總部方面，則曾協助處理若干國際性訴訟案件；並曾於我國法院防禦外商之訴訟得直，此應為溫先生卸任後之事，恐非溫先生所知。本所提供法律服務，依據同業標準收取公費，為高為低，涉及主觀評價，惟費率與數字，則屬客觀事實，本人及事務所任何同仁，從來未以每小時一千美金談話費收取或計算公費。以今日之標準言，此一數字亦遠逾任何律師同道之行情，遑論十年以前之狀況。溫先生書中第二五四頁所載，與事實出入太大，令人難以承當。當年本人及本所同仁共同辦案，確曾在訴訟之初，詢問當事人有無和解之意，律師勸告當事人考慮和解、息訴止爭，本為天職，溫先生謂本人一見美國人興訟即要建議和解，恐為一種主觀錯覺。該案為商品製造人責任訴訟，涉及軍品製造良窳，本人對當事人產品極有信心，惟在美國訴訟之證據開示程序(discovery proceedings)之下，積極赴美應訴，則必須在公開之審判程序中以軍品製造程序及方法示人，是否有軍事機密及政策之考慮，為當事人宜加注意之問題。溫先生若不健忘，當知此為本人當年提醒是否考慮和解之重點。其實本案在美訴訟近三年，我方防禦均以從事「法庭不便利」之程序抗辯為主，避免對方以揭露軍事機密作為要脅，嗣後對方不耐久訟勞費，雙方和解結案，此不僅事先徵得溫先生（時任聯勤總司令）同意，和解金額也遠較訴訟前國防部所核定者為低。溫先生之記憶與事實出入如此之大，或只係其性格使然。溫先生書中二六九頁提及「人都有一個很大的弱點，就是喜歡講別人的壞話」，本人很是同意，只是溫先生責人責己，標準似乎不一，所述者涉及本人及事務所之信譽；榮譽所在，律師與將軍並無不同。而長文率然函陳所以，攪擾清聽者，乃因

貴院所屬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口述歷史，必以求真為職志。而選擇適當人物，出版其片面口述之主觀記憶、臧否人物，如何避免讀者偏聽，以符求真之旨？近代史研究所專業治史，必有因應之道。長文濫竽法律事務，才德淺薄，不足列名史乘，然竟幸受歷史人物品評，一方面誠應以聞過則喜自惕，一方面亦盼能獲得歷史公道。惟不諳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口述歷史之

專業程序，用敢具函相詢，肅佇  
賜教，以匡迷惑。如本書尚在發行當中，不知可否以此小箋附於書內作為  
勘誤之用。長文不勝惶恐。崑此敬頌  
時祺

後學

陳長文律師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元月十二日

## 李念祖律師致溫哈熊將軍函

溫將軍哈熊先生大鑒：

睽違 芝顏，倏已數載。晚當年參與辦理點四五口徑手槍訴訟案，幾度親炙 教益，歷歷猶在目前。晚近拜讀中研院近史所出版 先生之口述歷史，始知當年一樁公案，經 先生現身說法，已入史乘。史者，首尚信實，所以禾稗有別也。 先生述及該案和解緣由，是因陳長文律師鑒於對方為美國人之故，又說「他每小時收取的談話費約要一千美金」。……「我們自己的司法部門（當時法務部長是施啟揚），看到這種情形，竟以國事困難而立刻和解了事，賠了十萬美元，讓人家敲了竹槓，我心裡真是難過極了」，實與事實出入極大。晚廁足其間，一一知之。按，理律提供法律服務，依據同業標準收取公費，為高為低，涉及主觀評價，惟費率與數字，則屬客觀事實，本所任何同仁，包括主持律師陳長文先生在內，從來未以每小時一千美金談話費收取或計算公費。以今日之標準言，此一數字亦遠逾任何律師同道之行情，遑論十年以前之狀況。當年本所接受聯勤總部之委任辦理點四五手槍在美訴訟案，確曾在訴訟之初，詢問當事人有無和解之意，律師勸告當事人考慮和解、息訟止爭，本為天職。該案為商品製造人責任訴訟，涉及軍品製造良窳，我人對當事人產品極有信心，惟在美國訴訟之證據開示程序(discovery proceedings)之下，積極赴美應訴，則必須

在公開之審判程序中以軍品製造程序及方法示人，是否有軍事機密及政策之考慮，為當事人宜加注意之問題。先生若不健忘，應可回憶此為本所當年提醒是否考慮和解之重點。其實本案在美訴訟近三年，我方防禦均以從事「法庭不便利」之程序抗辯為主，避免對方以揭露軍事機密作為要脅，嗣後對方不耐久訟勞費，雙方和解結案，此不僅事先徵得先生同意，和解金額也遠較訴訟前國防部所核定者為低，而三年間對方所花費之律師費用，亦恐非此項和解金額所能彌補者，「敲竹槓」或不若「蝕把米」貼切耳！先生之記憶，顯有舛誤。晚深敬先生為前輩長者，信乎君子口述歷史，必以失真為憾，用敢具函敬陳種切，先生想不以為忤慢。蓋晚忝為理律法律事務所一員，深知名譽所在，將軍與律師，並無二致。先生德高望重，生時述往，萬方矚目，惟事涉他人信用名譽，先生之歷史地位，與諸歷史之信實，則先生疾其誤謬而謀加補正，亦忠於讀者之道也。日月有食，更而人仰，君子決之，晚豈敢置喙？崑此奉聞，即請大安

晚

李念祖 律師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元月十二日

###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稿約

- (1)本通訊蒐集近代中國史研究之各項資料，俾供研究參考，園地公開，歡迎各界惠賜未出版之稿件，中、英文不拘。
- (2)本通訊為半年刊，每年三、九月各出刊一期，一、七月底截稿。
- (3)來稿除特約者外，以不超過五千字為宜，請以 Word 文書處理軟體打字後，併同 3.5 吋磁碟片送交本所通訊編輯委員會。
- (4)來稿請署真實姓名、服務機關及職稱、詳細地址和聯絡電話。
- (5)本通訊編輯委員會對於來稿文字有酌改之權。
- (6)採用之稿件，致贈作者當期通訊五份。
- (7)來稿請寄臺北市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收。



劉崇鉉

開拓西洋史教學的劉崇鉉教授



劉崇鉉教授伉儷

## 本期要目

「漫畫中的歷史·歷史中的漫畫」學術座談會報導

「現代中國史學與歷史思想研討會」會議報導

「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一六〇〇迄今」會議報導

「清代檔案與臺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紀要

從婦女看歷史：「近代中國的婦女、國家與社會(1600-1950)」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

「秩序問題」與明清江南社會

學人簡介——劉崇鋳

藝術史與文化史的交界：關於視覺文化研究

「中國的物質與文化」研究計畫簡介

帳摺與水牌——傳統商販擴大信用之拓銷工具

抗戰時期救護總隊外籍醫護人員名單考證

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近年來進行檔案數位化工作概要

新書評介四篇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2001.3-2001.9)

來函二封

